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0 年 07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浏览最新信息可登陆豆瓣“独立阅读”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孙骁骥、扬克

轮值编辑：扬 克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贾 葭（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燕舞（北京）、灵子（北京）

翻译：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画界元老吴冠中，又一位民国造就的人物撒手西去。尽管就史论史，民国远非一个美好的时代，但两相对比，人们不禁抚昔叹今。至少民国给我们留下那么些精彩的人事、那么些斐然的文物，所以贾樟柯导演的《海上传奇》一上映，故事里还是杜月笙，还是费穆，还是上官云珠，还是潘迪华，此后横亘六十年，既然当年的传奇王洪文讲不得，几乎就一片空白。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就说，如今海派文化还有什么呢？

上海无疑是中国缩影，这个时代的中国竟然没什么能留下来。这个时代说它悲惨太沉重，说它荒诞太深刻，似乎最好的形容就是滑稽。难怪曾有人质疑，《海上传奇》里为什么没有余秋雨、周立波？拜托，他们要进传奇，得等后世史家再写滑稽列传。

滑稽无处不在，号称严肃的学术界也如此。著名学者汪晖的抄袭公案在这个月愈演愈烈，竟然成了国际事件，引得八九十号国际著名学者前来围观。中国的国际地位果真提升了，但愿这一次不会最终又成为国际丑闻。

面对这个滑稽的时代一切都不能期望太高，所以《海上传奇》的最后一位主角韩寒在本月推出延宕已久的《独唱团》备受瞩目。这是这个时代仅存的一点颜面了。

“独立阅读”也在这个滑稽的时代走过了三年，本期特将以往过刊编者按与目录整理于后，作为三年的一个记录，并备读者检索。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4
经 济：苏小和	4
写 作：朱 白	6
写 作：朱航满	8
思 想：成 庆	9
文 史：王晓渔	12
童 书：燕 舞	14
电 影：言 一	16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19
扬 克：德国书市近览	19
刘 柠：出版视野中的“日本热”第三波	22
书 评	24
孙传钊：纵欲乎？禁欲乎？	24
朱 白：实验一种更通俗的文体	26
王晓渔：地下写作者的精神探险	27
罗四鸽：“素人”教授洪子诚的“怯懦”	28
逝者·吴冠中	30
刘 柠：横站于东西方夹缝间的艺术家	30
成 庆：美术界的鲁迅	32
访 谈	33
灵 子：知识分子要对这个社会的犬儒负责任——余世存访谈	33
严 飞：香港独立出版，挣扎之下的理想主义——袁兆昌访谈	40
附录	48
“独立阅读”2007年07月——2010年6月编者按及目录	49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Y 经济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当然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正沿着权利和权力的冲突不断展开。杨继绳、张维迎、秋风均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出版了结实的著作。

这几年,我一直喜欢杨继绳先生的作品,这本《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武汉出版社,2010年3月),是一本难得的能够在内地出版的好书。喜欢杨先生的读者,可以顺着这本书,去找他更好的书来读。不过,据说某部门已经发文,不准各地新华书店和读书媒体将这本书列入到图书排行榜之中。只是这样的举措,不但阻止不了好书的流行,反而会加重读者的好奇心,为此我应该恭喜杨继绳先生。

纯粹经济学著作,我最近读得仔细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国内真正推崇市场经济理论的读书人,都把张维迎看成是中国经济学第一人。这本书在这样的维度,的确已经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问题基本说清楚了。的确,张维迎先生这几年越来越坚守市场的思维,不过我们也看到,他似乎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孤独,在朝在野,似乎都没有几个人还有耐心听他的陈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越来越财大气粗,老张的式微,其实也在情理之中,由此我甚至觉得他有些像当年的米塞斯。有一次饭局,他的确也感叹,米塞斯的孤独,其实一直是真正的经济学的孤独,但历史会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秋风兄是我的为学兄长,多年来他一直沿着市场和伦理的维度在发现,在思考。这本《政府的本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分工的逻辑前提下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度观察。不过,最近一年以来,秋风兄更加偏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追寻,从朱熹,到张君勱,从孔子,到孙中山,秋风似乎意识到经济学不能整全解释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再沿着一种福利与道德的路径,朝历史走去。

需要说明的是,我最近读得更加仔细的书,却是所谓的革命史。很长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在生理性地排斥与革命有关的一切图书和影视作品。记得3年前,我在书店看到苏联人罗伊·梅德韦杰夫的煌煌巨著《让历史来审判》(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心里知道这是不错的资料,也是一份历史学人巨大的勇气,但就是不愿意掏钱买。我害怕书里呈现的血淋淋的革命细节,害怕这些细节在书里复活,我们又要跌入那种万劫不复的恐惧之中。

所以,当我看见杨奎松先生所著《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副标题竟然是“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时,第一反应是别看。事实上,我非常相信杨先生的学术底蕴,相信他内心深处隐含的价值判断,但还是担心这样的阅读,让我平静的生活不幸染上一种杀戮的气息。

好在书终于看完了,绕开革命,说几句书话吧。

整体意义上,我几乎完全认同杨奎松先生的观点: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中国的影响。必须说明,此种观点民间亦有之,所谓中共之所以得以建国,一是俄国人帮忙,二是日本人帮倒忙。没有苏联人支持,中共的确无从起步;没有日本人入侵中国8年,中共没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杨奎松将这样的观点史料化、体系化,终于让我们整全地了解了这一段恢弘的历史真相。

中国近百年的国家形态,的确是全球政治格局下的一个偶然现象。沿着杨奎松先生的分析框架,我提出的问题是: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格局,究竟在那些层面偶然推动了毛泽东主导的共产主义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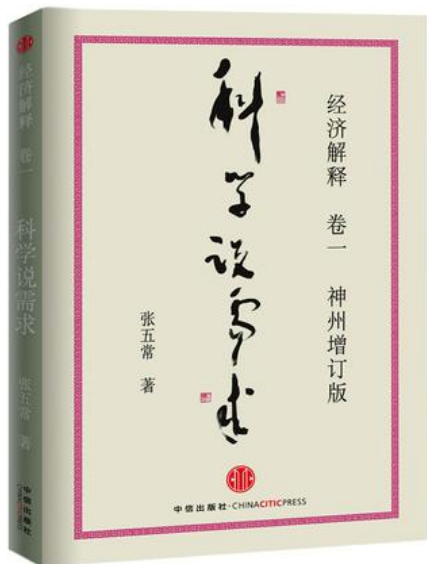
这其实涉及到更加开阔的历史现象,从思想的勃兴到经济的变迁,似乎各种力量在逼近偶然,或者说是必然。我的意思



是想说，相比那些具体的政治力量的博弈，也许我们站在思想和经济的层面看问题，看得更透彻。

凯恩斯在他的杰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不论是福是祸，带来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用这句话来回顾蔓延人类社会百年的社会主义史，竟然有毛骨悚然之感。

这里必须提到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前者的经济学前提在于假定人类市场生产资料的不稀缺，假定人是可量化的、静态的人，作为一种个体，不存在其不确定性，因此推导出一个人人按需分配的整全福利社会，从而抹杀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忽略了市场的边际收益递增或者递减，因此《资本论》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人的基本属性，背离了市场的自由演进原则。而后者，那本亢奋的《共产党宣言》，开头就承认，她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最近读张五常的新书《经济解释》（中信出版社，2010年6月），老先生就讲，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伟大的《国富论》，今天的读者依然奉为经济学的经典，奉为所有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和政府无法绕行的学术门槛。张老先生认为这就是一本著作的读者寿命，而在经济学领域，读者寿命长生不死的著作，只有这一本《国富论》。张五常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读者寿命是11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读者寿命是75年，老先生说自己的书如果从2000年算起，2075年的时候还有人会拿出来读，那就了不起了。

老张真是宅心仁厚啊。《资本论》110年，恰好是社会主义革命蔓延世界的110年。我想说的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首要动力，仍然如凯恩斯所言，来源于思想的影响力，而且是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力。这究竟是福是祸，每个热爱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而现实的局面是，自从二战结束之后，欧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一直把抵制共产计划经济思潮当成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而苏联的共产计划体制在1989年宣告彻底失败，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事实上也是沿着市场经济的路径开始走出共产计划经济的阴影，从而在30年之后赢得了一些看上去不错的经济成就。

那么，既然作为思想资源的《资本论》与经济有关，就应该再说说这100年来人类社会经济的变迁。

历史有时候非常具有偶然性的吊诡！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全球应声者众的时候，1929年，整个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美国股市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20世纪30年代出现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超过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至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看到，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人相信苏联人找到了真理，人们以为一个乌有的美好社会即将出现，连英国人罗素、法国人罗曼·罗兰、中国人胡适之也曾经短时期内认同这样的局面。

所谓潮起潮落，随波逐流，中国新一轮改朝换代刚好赶上了这次经济起伏的周期，毛泽东的成功，就是以共产计划经济的名义，将中国人聚拢。这正是他的核心经济思考：无论是1949年之前的革命行为，还是1949年之后的建设行为，他不会有第二项选择，共产计划是惟一的方法论。

这是一次中国人无法跳脱的计划经济魔咒。好在市场经济有着固有的规律，60年之后，全世界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思潮。只是这样的60年，人类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的经济图景和国家图景因此化为乌有。而在中国，人们几乎是在一种很不情愿的背景下，才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我们的市场经济叫做“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以上算是我对杨奎松先生《中间地带的革命》的一点延展性阅读吧。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作为一个人文情结有些过重的读者，事实上我对基于朝代更替、帝王将相、政治权谋的历史叙事，并不感兴趣，我更加关注在大历史动荡之下个体的命运、文化的命运。所以，我对许倬云先生《万古江河》中的那种文化叙事，就非常兴奋，或者，我从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中抽出大量篇幅来叙述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的人生境遇之中，能体会到一种人性的穿透力。至于我最尊重的余英时先生，他的学生王汎森就说，余英时先生的“自由主义信仰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有着无可妥协的尊重”。所以我们看到，余英时先生决不仅仅宏大叙事，他的历史研究

总是深入到个体的命运之内，他对陈寅恪、胡适之、朱熹、钱宾四等个体的关照，才是我的阅读视野里最伟大的历史诗篇。毕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题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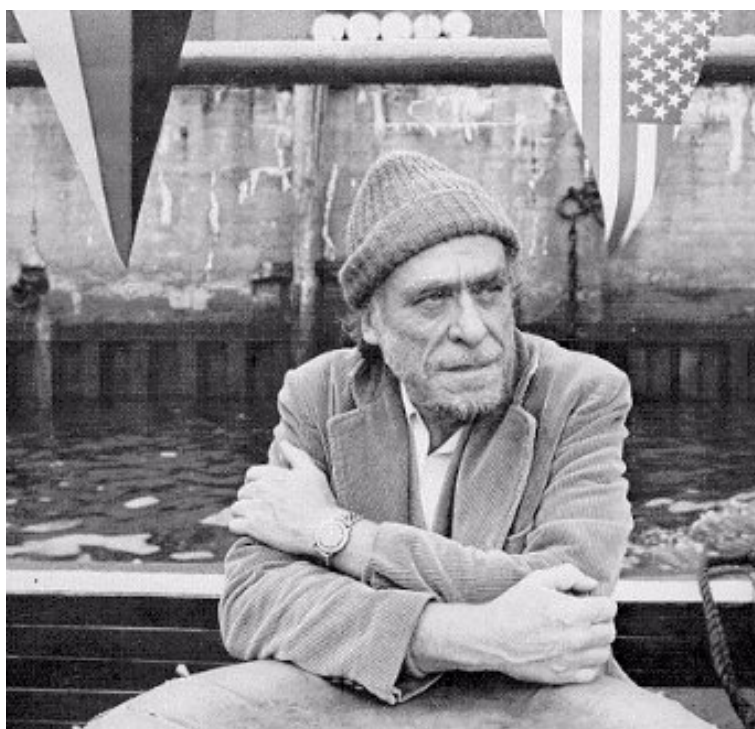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这个月最热门的关键词是“世界杯”，看媒体你就知道了，不仅是电视报纸上的节目和栏目要套上一件世界杯的外衣，就连那些时事评论员、读书节目主持人都要去聊足球话题。不是说足球话题不能随便聊，而是这个世界总是那么万能型人才，会让人觉得奇怪。我想起之前我说过的一个观点，不是每个评论家都能对世界万物有观点的。为了稿费、出场费强迫自己去挤出所谓的观点，这不至于可耻，但有点可悲。这不是鲁迅时代，多少大家都有点可悲、可怜，那些自以为这个时代最清醒和独特的文人，混到死，也混不过郭敬明。

每到世界杯期间，大家就会慨叹我们自己的足球，这就跟每到奥斯卡颁奖典礼期间我们自卑华语电影和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我们臭骂不争气的华语文学一样，其实这也是一种虚妄，凭什么中国人就要处处都强呢——以后世界杯时，我们就使劲鼓吹乒乓球，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们就玩命地聊《红楼梦》、《鲁迅全集》，然后再陈列一下历史上被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那些大师作品……

跟如今已经被滥俗媒体疯狂用作标题的卡佛比起来，另一位美国作家布考斯基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尽管他早就被唤作“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写实作家之一”、“地下诗人桂冠”，可我们一贯的冷漠一直在刻意忽略着这位“这个地球上最酷的小说家和诗人”。好消息是一直以独立出版重要当代作家的“坏蛋出版”机构，已经翻译并出版了布考斯基的一本诗集**《弹醉琴如击鼓直到手指滴血》**（黄复雄 译，坏蛋出版计划，2010年5月）。这当然是这位作家的第一本简体字版的作品，希望不是最后一部，因为布考斯基的小说也同样让人期待。我知道民间已经有人在翻译布考斯基的小说作品，跟之前台湾出过的几本比起来，据说布氏也有不那么黄的作品，期待他那些符合现有出版规则的作品早点被我们的有识之士看上，迅速多出版一些他的作品以嗜读者。如果迄今你还



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请搜索一下，或者找几部布考斯基小说改编的电影看看，《勤杂多面手》、《杯酒人生》都是不错的入门作品。布考斯基的迷人是打开书的第一页就扑面而来的那种，多余的介绍和评价都不需要。

尼克·霍恩比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畅销书作家，作为一个英国老混子，他在自己精通的流行音乐世界竟然写就出了那么多打动人心的流行作品，要知道，不是每个尼克·霍恩比的读者都对他所陈列的那些音乐感兴趣，他懂得制造环境、营造氛围，让他的读者很容易地就进入他所描绘的那种“青年潮流”气氛之中。那些典故般的引用，只不过是巧妙地将流行元素嫁接到了自己的生动作品中。《赤裸的朱丽叶》（牛二平 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7月）仍然是讲述音乐、爱情，以及年轻人孤独的故事，跟霍恩比以往的作品一样充满了幽默，这是英国成年人式的幽默，非常轻巧，但也并非不值一提。不过故事中如此痴迷的两个人最后还能找到对方，开心生活，这比较理想主义，至少在中国此时无法实现，我们的爱情背景是房子和年薪，而不是音乐或者梦想。

以前我只知道两个跟澳大利亚有关的作家，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到澳大利亚隐居的库切，再一个就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彼得·凯里。他的获布克奖作品**《凯利帮真史》**（李尧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让人见识一个英雄的诞

生过程：一个正史中的小偷、强盗、杀人犯、造反者，如何变成传奇中的至孝的儿子、好丈夫、慈爱父、可靠的朋友，彼得·凯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迷人的传奇故事。《杰克·迈格斯》（彭青龙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6月）是作为“澳大利亚最有才华和最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的彼得·凯里的重要作品，殖民文化渗入其作品的字里行间，还有不可回避的新旧文化冲突，都是这部作品所要展示的。这也是作为“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之一的作品，此次上海译文出了几本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的作品，还包括《三呼圣灵》（《辛德勒名单》原著作者托马斯·基尼利 著，周小进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6月）、《浅滩》（蒂姆·温顿 著，黄源深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7月）、《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著，周小进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6月），主题包罗万象，不少都跟当下有关，比如环保，是关注外国文学的读者应当收入的一套作品。

不知道其他“独立阅读”观察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越是你真正喜欢的一个东西，就越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和句子来推荐。杨黎的新诗集《五个红苹果》（坏蛋出版计划，2010年5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很想好好叫卖一番，最好



能帮助这“全球限量 500 本”卖脱销了，但其实，这很难，因为好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包括我们很多有阅读习惯的读者，或者知道但无法真的对其产生兴趣。《五个红苹果》是杨黎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包括作者 2000 年 2 月到 2004 年 8 月期间的众多作品。杨黎最近正以诗歌朗诵为由头前往全国各地，目的除了跟各地诗友交流，当然也包括卖书。我不知道这种独立出版对于杨黎来说，在收入上占有多大比重，但知道，这已经是一种悲哀。杨黎的名字在主流和所谓合法出版那里是被健忘性忽视的、划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印证了一种发展阶段下的不公和时代的轻浮。我以为这种逼迫作家要主动去行动的事端，既充分表达了当代中国对文学的漠视，读书是那种花脑筋的事情，跟看大片、看肥皂剧比起来它太奢侈了；也能反映一种好东西在我们这里是多么容易被忽视，人们眼里只有韩寒（出个破杂志不管多大岁数的人都跟着瞎起劲，你知道那是青春美文吗？你知道自己早就不是那些青春小酸文的目标读者了吗？），只有职场里的杜拉拉，而不能接受一个多元文学环境的存在。

从杨黎那里往下数，可能再数一两代诗人的名字会数到一位叫巫昂的女诗人。跟杨黎不一样，从记者到诗人、作家，再到职业专栏作家，再到电影工作者，然后是国外生活者、情感专栏作家，出版的作品从诗集、小说集到随笔集，现在这部是长篇小说集，巫昂的作品从来不缺少出版机会。据我所知，很多当年靠短篇小说、诗歌扬名的作家，一旦准备写长篇小说，都需狠狠下一番决心，这就是说，对于很多写过并且写得好的作家来说，写长篇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字数和篇幅上的体例变化是表面的，过程中的内心动荡也许是一种自我“颠覆”。但看巫昂的这部长篇处女作《星期一是礼拜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6月），你还真发现不了一点为难的表情，我以为，这不是通过长期准备或者凝思苦想来解决的，而是靠一个人的聪明劲来摆平的。巫昂用自己的聪明劲儿轻车熟路地写着那些荒诞不经的小故事，那么多甚至需要加注解的典故，是她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积累，恰到好处地让语言显得更洋气，因为这让我想到前面介绍的那位尼克·霍恩比。

现在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时代，但也说不上是一个多么不好的时代，也就是说，她们摆在一起都差不多，没有一个时代是足够糟糕的。说了一句这么蹩脚的话，是因为我在看布努艾尔的一本谈话录《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布努艾尔 等著，何凡 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想到的这个。如果布努艾尔生在此时，难说他会很得意，说不定是那种在大众领域默默无闻的怪人，要么就是靠给世界品牌拍拍广告以便养活自己的大导演（文德斯那种高级一点的，可以给拍拍宝马，而中国的贾樟柯差点儿，那就给国内的楼盘啊、画家啊、世博啊拍拍纪录片）。布努艾尔说过一句，“或者如果不搞电影，我倒也挺愿意当个作家”，记得作家韩东说过一句相反的，“或者如果不写小说，我可能去拍拍电影”，这至少可以说明电影和文学是两种离得非常近的艺术，或者说他们之间的种族基因存在比较相像的部分。我喜欢这本谈话录，不是因为布努艾尔在里面多么袒露心扉或者自爆八卦，而是他那种叙事，他在描述一个场景时的用词，真的像是在写一部看着令人绝望的小说。

图 1 为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126.com)

近来偶然在网上看到 2009 年“中国最美的书”的评奖结果,不仅有些暗自得意,因为去年我在“独立阅读”上谈到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骥才著作《散花》,因为设计优雅别致,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书与人的联系在设计中获得了高度统一,令人赞叹不已,并夸口此书若由我推荐参加“中国最美的书”的评奖,一定投上自己一票。让我没想到的是,2009 年中国最美的书的最终评选结果中,便有这一册著作,我后来注意到其设计者就是著名的装帧设计家张志伟先生。张先生前是本地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美编室主任,并曾成立守望者艺术设计工作室,他所设计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刘占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 月)被评为 2004 年“中国最美的书”,又获 2004 年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金奖,另有《东瀛美文之旅》也被评为 2003 年“中国最美的书”,可惜我先前并不知道张先生的大名,由此才想到,难怪一度河北教育出版社能够涌现出如此众多形质皆佳的著作。如今,张先生已是中央民族大学装潢设计系的教授,并在京城成立了新的工作室,这里真应为他庆贺,也为自己曾与张先生同处一城而失之交臂感到遗憾。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也算一个“好色之徒”,尽管我并非赞同或欣赏所有被评为所谓“最美的书”的创作,但这种举措我却是大大的双手支持,也是在去年的那期阅读报告中,我非常赞赏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刘运来为作家何频先生所设计的《看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年 3 月),此书获得 2008 年中国最美的书的荣誉称号,后来我才发现河南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出版过不少十分优雅的著作,而设计者大多也都是刘运来先生,诸如铁凝的散文集《回到欢乐》,贾平凹的散文集《静水深流》,张承志的散文集《犛子的耳朵》,等等,而由他设计的一册《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因为构思巧妙独到,更获得了 2009 年中国图书最佳装帧设计奖,这些美好的著述都为我的书房增添了许多魅力与生机。也是因为去年的那期阅读报告,我有幸得到了何频先生赠送的一册毛边本《看草》,据说毛边本原为何频先生自留赠送的私货,可见十分珍贵;更难得的是,我由何频先生而结识了刘运来先生,并相谈甚欢,感觉到刘先生不但对艺术设计颇有感觉,而且人文修养十分了得,对于书籍的设计制作也充满了热情,更为幸运的是,我的随笔文集《书与画像》也将由刘运来先生亲自操刀,对我来说,这自然将是一次十分美好的期待与收获。



我与美丽的书结缘,由此看来,也算是颇有因缘的。2008 年我发表在南京凤凰读书台饭店所主办的读书刊物《开卷》上的一篇文章《小识林文月》,被收入该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凤凰台上:〈开卷〉百期精选》,此书收入《开卷》杂志创刊以来精选的百余篇文章,大多为名家宿儒的文字,我的文字能够忝列其中,真是不胜忐忑,而后来此书又获得了 2008 年中国最美的书的荣誉称号,让我真感到有些惊喜交集了。此书的设计者为南京速泰熙先生,此前我几乎每期可以收到由南京的董宁文先生寄来的《开卷》杂志,也由速泰熙先生设计,朴素、优雅、简洁,每每都有爱不释手的感受。后来看到速泰熙的简介,得知他曾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曾操刀设计过在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当代作家文库”、“名人自传文丛”等系列丛书,其中作家苏童对于他的文集能由速泰熙先生设计,感到非常满意,并在一篇文章写到:“《苏童文集》的封面设计风格相信已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轰动。我最欣赏的是它能以简单而精致,从容而傲慢的姿态‘跳’出来。封面上大片空白给予人引而不发的快感。这套丛书出版以来我不知已经听了多少赞扬。”由此看来,一个出版社若是遇到一个优秀的美术编辑,与一个优秀的文字编辑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在如今信息泛滥的时代,则显得更为关键;同样,一个作者遇到一个优秀的文字编辑,是他的幸运,若能够再遇到一位优秀的美术编辑,那几乎就是奢侈了。

时下学者和作家的著述,我最倾心的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丹青作品系列,其中我特别注意到陈丹青的著作《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多余的素材》、《纽约琐记》(修订版)等,均由蔡立国先生设计。陈丹青是画家,对于艺术有敏感的嗅觉,而蔡立国的设计则仿佛为陈丹青找到了那种纯净、高傲与优雅的姿态。我收藏有陈丹青分别由山东画报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两册《多余的素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 月),购买后一册修订本,一方面对于陈丹青文字的喜爱,但更为重要的是后者优雅而高傲的气息吸引了我,这是我因为设计而收藏多个版本的个案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蔡立国原为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现在京城发展,难怪近期不少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的好书均出自于蔡立

国的手笔。前些日子与刘运来先生聊天，谈起蔡立国与陆智昌，我强调自己更欣赏前者一些，认为潜力更大，刘运来以为蔡更本土一些，而陆则更为国际化一些。倒是近来重新由广西师范大学再版的陈丹青著作《外国音乐在外国》，由我所不熟识的美术编辑马志方设计，整个风格有一种高贵、柔软与优雅的气息，简洁而不失厚重，相比原来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陈丹青音乐笔记》，这册《外国音乐在外国》更有一种古典的含蓄与精致，与此书所谈西方音乐的气质十分契合，而其中大量与音乐有关的优美插图显然是典型的陈丹青风格。令我惊叹的是陈丹青著作中的照片，在选取上均是十分用心，既可以让读者赏心悦目，与文字相得益彰，又不会越俎代庖，将文字的想象空间全部毁掉，而后者可是时下许多图文书出版的一个致命之处。据说每有著作要出版，陈丹青都会亲自在工作室甚至是印刷厂里坐阵监督，不厌其烦的修改、订正、完善，并与编辑和工人不断地进行沟通、探讨、争论甚至是周旋，由此才确保了自己著述的品质，可以说，这些带有典型“陈氏风格”的著作，应该是作者与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

可以说，有艺术感的作家和学者会特别强调自己著述的设计，与优秀的设计艺术家也常常会心灵相吸。我甚至认为，那些从来不注意自己著述外表的作家，他们的文字一定也是粗糙的，甚至是根本不值一顾的，因为缺乏细腻、优雅的审美要求的人，



怎能肯定他能够在书写时拥有一颗万千波澜而雍容大气的内心世界。由此，我便能够理解许多作家和学者的著述，几乎每一部都堪称经典，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是俱佳的艺术品。以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由张志伟设计的冯骥才著作《散花》，后来我注意到冯骥才的其他著作几乎部部都很精彩，其中有数册便是由南京速泰熙先生所设计，诸如他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灰空间》、专著《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他的文集《冯骥才名篇文库》，等等。也难怪，在文章中冯骥才曾有这样的感慨：“一个书籍装帧家决不只是为书包装，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独立和尊贵的艺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把装帧艺术视为神圣，锲而不舍地追求，永无间断地再创造，并且和任何严肃艺术的本质一样：用美来升华生命。”

图2 为速泰熙设计的南京地铁三山街站壁画

THOUGHT 思想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对于关注当下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读者而言，将国外政治思想的译介作为一面国内思潮的反光镜，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对国外政治思想的引介，不仅存在一条学院知识传承积累的线索，还有一条回应时代问题的脉络。抓住后者，或许可以迅速地了解到，国内各家政治立场与思想流派的渊源何在。出于此目的，我尽可能将近年（主要是2009年底、2010年初）出版的图书作一个整体介绍，当然，由于资料收集与精力关系，所介绍的图书讯息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还请读者谅解。

首先想从几本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介绍开始,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的《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月)终于被翻译出版,这本1960年初版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又在2004年推出了增补版,足足增加了7章内容。论政治立场,沃林算是典型的激进民主派,在这本长篇巨著里,以“政治”这一概念为核心,呈现出了一幅极富哲学思辨性的政治思想史画卷。并且在增补的内容里,他还对今天的美国政治作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判断,认为今日美国已经是一种“颠倒的极权主义”,从而也意味着沃林的思想史研究以一种对当代政治的诊断而最终完成。值得提及的是,沃林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思想史家,毋宁说,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实践感的政治理论家,他对思想史的溯源,都是为了指向当下的“激进民主”实践,因此他不会纠缠于思想史的细节上,而是会将思想史研究看作是他的当代政治理论建构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思想史研究必须与他的“激进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方能有客观中允的理解。

另一本需要重点推荐的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五卷本《秩序与历史》中的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其中的另外一卷《城邦的世界》业已于2008年先行推出。沃格林的思想博大精深,且又加上他善于制造新词,导致其著作常招人指责,认为晦涩难懂。不过好在他的《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8月)已经翻译出版,这本由其学生桑多兹采访整理的口述传记,清晰地展示出沃格林的思想之路,也为我们把握其思想源流提供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读物。另外沃格林早年的政治观念史系列中的《中世纪(至阿奎那)》、《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革命与新科学》也已经陆续出版,虽然这套政治观念史系列是沃格林的转型尝试之作,但是对于了解他如何扭转其思想史的思考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沃格林思想的引介如今已初具形态,笔者手中也恰好正在翻译一本介绍沃格林历史哲学的著作,翻译过程中也深感沃格林思想之庞杂与晦涩。这里首先强调的一点是,要理解沃格林,首先或许要暂时搁置当代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说,沃格林并不是一位政治实践者,而是一位“诊断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政治科学家”(不过值得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沃格林口中的“科学”,是一种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而非现代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基本假设的“科学主义”),也就是观察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是如何想象政治、实践政治的。尽管他在纳粹时期对其种族理论有过犀利的批判,但是今天看来,毋宁说是沃格林的“政治分析”触碰到

“种族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源所在。从根本上来说,他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他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封闭了超越性问题,最终会带来一种政治上的“迷狂”或“沉沦”。从这个意义上讲,沃格林的思想既非现代意义上的标准专业化学术,也不能成为当代思想战的意识形态利器,而只是一种“观察者”的理论工具。

相比而言,与沃格林齐名的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引介已有时日,不可尽数。刘小枫主编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也陆续有一系列的译介著作推出,如《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赵卫国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11月)等,都是该系列中值得注意的著作。其中,由迈尔负责主编的施特劳斯讲演论文集里涉及到斯特劳斯如何处理其犹太人与哲学家身份之间的宗教-哲学冲突,那么犹太教的启示和古希腊理性之间,到底要如何斟酌取舍,值得我们思考。而对于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学界争论向来甚多,《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编入一组分析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对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以注意。

有意思的是,虽然施特劳斯的论著在不断地引进,国内对于施特劳斯的专业研究却仍然十分缺乏,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时间相对短促,无法形成细致的专业化研究,但或许则是因为国内思想界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引入,更强调的是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意义,或者说,是带来一种理解中国当下思想



的不同视角与立场。

对于中国思想界而言,伊赛亚·伯林已经十分熟悉,但是对于他的那位同辈同族——英国著名保守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却知之不详,虽然后者已有一些著作被翻译进来,但是与伯林的盛名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国内对其思想的介绍与关注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早年张汝伦先生翻译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节选本是奥克肖特的经典之作,可惜也一直没有看到对此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析。奥克肖特本是哲学出身,政治哲学算是半路出家,这也使得他对政治的观察,常常来自于对人性的观察。比如他的《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张铭、姚仁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7月)里面所提到的这两种极端政治观念形态以及他们在现实政治中的反映,都让他超脱了狭隘的意识形态论辩,具有深入政治的“意识”。相比伯林,奥克肖特的“哲学思辨气味”更为浓厚,在超越意识形态的方面也更为彻底。另外一本《论历史及其他论文》(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7月)则是奥克肖特关于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初看起来与“政治”无涉,但是奥克肖特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史”以及关于历史的知识,对于塑造当下我们的观念到底有着怎样的一套运作机理,由此可以看出,奥克肖特对“政治”的理解,都是基于“观念”的本源来展开的。

上述所及,除了沃林外,斯特劳斯、沃格林大抵都是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这里或许值得澄清一点的是,所谓“保守主义”只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标签,因为对于不同文化、不同语境,甚至不同历史时段,“保守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多变的,有时候“保守主义”或许会是十分激进的内容,这一切要视每个国家的传统演变过程而定,不可以教条的眼光看待。不过大抵来说,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家都会用传统来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思想的误区,虽然这种批判常被视为盲目复古,但是现实的情况常常证明,许多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的激进主义虽然会以一种进步论的姿态显现,但是也同样会以一种“保守”的姿态出现,足可说明“保守主义”一词的复杂性。

泛泛地谈“保守”,大抵会往前追溯资源,但是各路思想家追溯的各有不同,比如弗朗索瓦·基佐这位自由派的史学家,他在名作《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里是将自由传统作为古代社会的遗存,而专制是现代的产物。但是像伯恩斯主编的这套《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程志敏译,三联书店,2009年10



月)则试图摆脱“进步论”那种将中世纪视为黑暗年代的简单逻辑,使得中世纪的一些语境化的思想内容重新恢复出来,让我们除了“火刑柱”、“异端法庭”外,能看到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真实运作逻辑。政治的残酷与幸福不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完全消除残酷或完全拥有幸福,而是要知道如何避免更大的残酷,追求尽可能多的幸福。

如果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莱迪·史珂拉聆听此言,或许会欣然赞许这一看法。国内最近刚刚推出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左高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虽然已经译介过《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这本她的晚期著作,但是国内对于她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可谓是“死水微澜”。从政治立场上,她当然属于自由派行列,但是从思想倾向看,她则持一种蒙田式的怀疑论立场,无论是她对乌托邦思想的厌恶,还是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的拒绝,都让她与中国90年代的“反激进思潮”颇为契合,想必朱学勤先生读到史珂拉,必然会引为同调。但是也有人会指责史珂拉的思想“消极有余,积极不足”,无法应对一些具体的政治实践要求,史珂拉本人当然对此是有所了解,但是身处20世纪的她,饱受卢梭式的革命思潮冲击,必然对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政治”产生深深的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要

把史珂拉还原到20世纪的革命语境中,方可看到其真正的意义所在。不过史珂拉所生活的美国毕竟是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保守派”学者,在“怀疑论”与“反激进”的路上却十分彻底,甚至到了“教条”的地步,也让我们看到,同一观念在不同语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也是迥然不同的。另外值得补充的是,史珂拉虽不是著作等身,但也著述颇丰,如《寻求乌托邦:政治信仰的衰落》、《平庸的邪恶》都是其扛鼎之作,值得进一步引介。

比起史珂拉的温和、保守,另外一位自由派女将就没那么“温婉可人”了,莎迪娅·B·德鲁的《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张新刚、张源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可算是十分“麻辣劲爆”。如果单看她的《列奥·斯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或许会觉得她的意识形态立场粗暴,将斯特劳斯的思想与现实政治作了一个太过简化的联系。不过她在《列奥·斯特劳

斯的政治观念》一书中却展现出学者的专业化素养，她将斯特劳斯定位为一个尼采式的精英论者，认为斯特劳斯所勾画的“哲学家”与“庸众”之间的差异，看上去是一种克服现代性的努力，其实背后的事实是，斯特劳斯不是所谓的古典哲人，他才是典型的“现代人”。当然阅读此书，还得要找到那本由的斯特劳斯门生 Catherine H. Zuckert 与 Michael Zuckert 夫妇俩合写的《关于列奥·斯特劳斯的真理》(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合观才能看到正反双方交锋的聚焦点。

既然谈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苏格兰启蒙传统，而关于这一路思潮，除了经济学界外，近年来国内少有谈及，但是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推出了一系列的译介，如托马斯·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李涤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哈奇森的《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赵红梅、戴茂堂、李家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和《论美与德性的根源》(高乐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都是苏格兰启蒙学派主要人物的著作，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却反映出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人性预设与知识论预设，套用沃格林的说法，政治制度不过是观念的“表征”而已。

介绍至此，读者或可发现，近年国内对于英美欧陆的政治思想的介绍不可谓不多，但是对于邻近的东洋政治思想界，却少有关关注，除了前两年左翼思想家子安宣邦的系列著作已翻译出版之外，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4月)也在今年被引进来。虽然从历史上看，日本与中国分享着许多相同的思想资源，但是在近代之后，日本却走上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日本思想界一直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道路，最后也导致了近代的军国化，而二战后，在外力的强迫下进行了民主化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思想就是铁板一块，其发展动态无疑值得中国思想界去密切关注。

图2为阿克肖特 图3为史珂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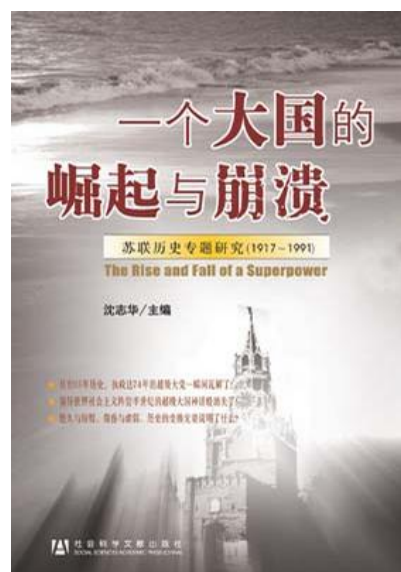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同时买了几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书，崔瑞德和牟复礼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菲利普·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5卷《私人生活史》(李群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9年5月)、侯井天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三种书分别定价116元、340元、98元，竟然都是第二次印刷，如果属实(2009年9月书店里出现杨奎松先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版权页上印着2010年2月第二次印刷)，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回想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学术著作几乎都是一两千册的印数，惨不忍睹。刚刚在打折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中外约章汇要 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将各种重要的中外条约、协定一网打尽，原价17.5元，印数1000册，过了将近20年降价为8元。

沈志华先生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我见到的时候已经是第四次印刷。尽管对思想青年的增加已有心理准备，这个数字还是让我半信半疑。后来看到一个标签，注明系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恍然大悟。不知这是否导致公款购书，但依我之见，公款购书胜过“三公消费”，前提是书目比较靠谱。如果公款购买红宝书，那还不如“三公消费”。



15 种图书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 2010 年上半年书目：《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读毛泽东札记》、《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转型 30 年（1978-2008）》、《老子十八讲》、《解放战争》、《中国思想史》、《传统与现代》、《真水无香》、《科学的历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雍正传》、《袁崇焕传》、《苦难辉煌》。“独立阅读”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推荐书目不乏交叉之处，吾道不孤。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系集体创作，质量参差不齐。在《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一章里，作者马龙闪先生认为党内外的极左思潮干扰了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列宁与极左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不知作者何以得出这种结论？列宁是极左思潮的伟大领袖，马克思主义“党国化”的关键人物，这已是思想界的共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纠缠，这不是研究，而是怀旧。作者对严厉监控党内同志表示反对，同时又称严厉监控资产阶级敌对势力“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这依然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人民民主独裁”（毛泽东语）的思维，对于反思“大国崩溃”没有帮助。



如果有兴趣了解“大国崩溃”的过程，可以阅读郭永胜先生执笔的《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1965 年 12 月 5 日苏联宪法日，一小撮“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散步。我更愿意把“持不同政见运动”称作“公民不服从运动”，这些公民们散步的口号是“遵守宪法”，非常主旋律，非常政治正确，持不同政见的不是他们，而是侵犯公民集会言论自由、悍然违宪的国家安全机构。在漫长并且无聊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公民们只有通过不服从运动让生活增添一点乐趣。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 190 条和新增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严打思想颠覆，1967 年克格勃招募了 24952 名新情报员。但这种维稳行为只是饮鸩止渴，后来的历史证明，颠覆国家政权的恰恰是国家安全机构，他们把公民推向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所有维稳行为，最后都从反向推动了“动乱”。根据书后的作者简介，郭永胜著

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我多方寻找，不见踪影。

夏日炎炎，没有耐心读学术著作，可以读点小说，奥索尔金的《我的姐姐》（钱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4 月）和德鲁日尼科夫的《针尖上的天使》（王立刚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5 月）都可以防暑降温。

奥索尔金，读过《哲学船事件》（花城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的朋友或许记得这个名字，他是 1922 年被苏俄遣送出境的“哲学船”船员。在《哲学船事件》里，收有 1922 年 5 月 19 日列宁就驱逐作家和教授问题致函捷尔任斯基的信件，列宁把一些俄罗斯思想家称作“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间谍和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组织”，主张“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要不断地有计划地抓，并把他们驱逐出境”。最后，列宁强调：“请把这封信给政治局委员们秘密传阅，不要复制，再还回给您和我”。让他失望的是，这封信后来收入了《列宁全集》，他与极左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斗争的光辉形象，更像是影帝的特技，可以远观，不可当真。

《我的姐姐》是奥索尔金对姐姐的追忆，与血雨腥风没有关系。如果奥索尔金没有离开苏联，在血雨腥风里追忆斜风细雨，一定会被视为资产阶级敌对势力。译者钱诚先生表示，搁置译笔已经十几年，重新拿起译笔，是因为看到“姐姐”之美。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定价仅 12 元，出版社没有做大字体、拉大行距，很久没有见到如此价廉物美的书了。

奥索尔金出生于“万恶的旧社会”，德鲁日尼科夫出生时已是伟大的苏联时期。殊途同归，德鲁日尼科夫后来也背井离乡。《针尖上的天使》写于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时作者尚在国内，书稿拍成微缩胶卷装在万宝路香烟盒里，才得以在国外问世。

这部小说从一个党报总编的突然昏厥写起，讲述了知识人尤其是媒体人如何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里挣扎。关于德鲁日尼科夫，我们所知甚少。2010年5月12日《中华读书报》慷慨撰文介绍了这位作者：小时候，阿姨带他去红场散步，小声说：“那边就是列宁爷爷躺的地方”，有个民警严厉地对她说：“禁止用手指着陵墓！”——他吓坏了。这篇文章还提到另一个细节：1985年，克格勃给了德鲁日尼科夫两种选择：集中营或精神病院，他哪一个也没选，两年后被驱逐出境。

以上都在谈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最后介绍的一本书，与它的老对手有关。尹宣先生翻译的《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终于出版，可惜译者已经去世，无法看到此书。尹宣翻译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詹姆斯·麦迪逊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身边的朋友非常称道。此次《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虽然已经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的译本，我还是立即拿下。译者在序言里特别强调翻译期间请两位大学生朗读《古文观止》和《红楼梦》，以保证语感，这种做法很新鲜。

易中天先生曾以《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为资料写作《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1年），不知他是否会以《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为资料再有著述。我最期待的不是“说三国”，而是“说宪政”。

图2 为普希金广场上反对普京的抗议者



CHILDREN'S BOOK 童书

特约撰稿人 燕舞（北京，yanwu1924@263.net）

“这就是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祖、巴巴拉拉、巴巴利波、巴巴伯、巴巴贝尔、巴巴布莱特、巴巴布拉伯！记住了吗？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祖、巴巴拉拉、巴巴利波、巴巴伯、巴巴贝尔、巴巴布莱特、巴巴布拉伯！”22年前，慕尼黑联盟将动画片《巴巴爸爸》无偿提供给央视《七巧板》栏目播出，这段绕口令式的开场白引得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孩童竞相模仿。

即使不能凭借完整复述这段开场白而获得在同龄人中的优越感，《巴巴爸爸》的中国主流观众一定会准确无误地忆起片中的经典台词——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

其实，广为一代中国儿童和青少年喜爱的巴巴爸爸的形象，是由长期居住在巴黎的美国漫画家德鲁斯·泰勒（Talus Taylor）和他的法国妻子安娜特·缇森（Annette Tison）共同创作的。该系列图书的第一部《巴巴爸爸的诞生》早在1970年就出版了，甫一问世就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获得广泛好评。1975年，联邦德国将“巴巴爸爸”系列改编成动画片并于1981年在美国首播，迅即风靡全球（近两年的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的入场指南背面印的都是“巴巴爸爸”的形象）。

在“巴巴爸爸”诞生40周年和同名3D动画片正在紧张制作之际，接力出版社于年初和6月分两批推出了一套10本的“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安娜特·缇森、德鲁斯·泰勒著，谢逢蓓译，接力出版社）。加之6月20日就是今年的“父亲节”，重温40岁的“巴巴爸爸”和品评终于出齐的“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就格外温馨。

诚如泰勒先生在“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年初登陆中国时所说的那样——当初那些看着《巴巴爸爸》动画片而爱上“巴巴爸爸”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是带着孩子看“巴巴爸爸”的爸爸妈妈们了——这些年轻的中国父母选择这套经典的“晚安书”做为亲子读物，具有相当的阅读便利。即使是初次阅读，也不用担心搞不清楚书中这个大家庭的人物关系，因为每册的封二和封三都印着九位家庭成员的招牌形象：

粉红色的巴巴爸爸憨态可掬地把左手搭在黑色的巴巴妈妈的肩上，还向翻开书的每一位读者挥舞着右手致意；巴巴妈妈戴着他送的花环，幸福地捧着一束鲜花，这应该也是巴巴爸爸送的。

三个女儿中，紫色的巴巴贝尔戴着有蝴蝶结的大帽子和项链，左手挺着腰，右手顶着帽檐，一看就挺臭美的；黄色的巴

巴利波戴着斯文的眼镜，手捧大部头正读得津津有味；绿色的巴巴拉拉则正拨弄着琴弦，她和巴巴利波一样文艺，不知她俩是否会嘲笑爱俏的巴巴贝尔，是否还会提醒自己的姐妹注重漂亮和时尚外表的同时更应追求深厚的文化内涵？

四个儿子中，红色的巴巴布拉伯右手举着哑铃，很像喜欢四处炫耀阳刚之美的“肌肉男”；黄色的巴巴祖左手抚摸着家里的宠物狗“洛丽塔”，右手举着宠物南美鹦鹉；蓝色的巴巴布莱特双手举着单筒的高倍望远镜，那样聚精会神，很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天文奇观；黑色的巴巴伯很有艺术青年范儿，发型很潮，还对着画架做画，一不小心就把身上弄得五颜六色——如此邋里邋遢，会不会让巴巴妈妈很伤脑筋呢？

七个孩子，基本上对应着赤、橙、黄、绿、青（不过对应这个颜色的巴巴伯却是个黑姑娘，大概是跟了妈妈的缘故）、蓝、紫七种明亮的光谱色，也隐喻着孩子们的自由天性和独一无二的个性，以及漫画家对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尊重。

唯独巴巴爸爸的粉红色让我一开始有些不解。查了些资料才知道，40余年前，漫画家泰勒和其妻缇森常去巴黎第十四区著名的 Le Zeyer 咖啡厅，当妻子在和朋友们在那里喝咖啡时，泰勒常在一角随手作画。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妈妈领着一个孩子，孩子手举粉红色棉花糖。这种没有规则形状的棉花糖看起来像“爸爸的胡须”（它正与法语中“Barbapapa”一词谐音），而且法国的棉花糖大多是粉红色的。有感于此，泰勒设计和绘制了粉红色的巴巴爸爸。



40年来，“巴巴爸爸”系列图书能风行世界诸多国家，除了多种色彩的巧妙运用，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是满足了儿童对变形和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每到紧急关头，只要念一句“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巴巴爸爸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任意变形。

不过，我觉得“巴巴爸爸经典系列”的最大亮点还在于它对亲情、环保和自由、多元等现代价值的宣扬与推崇。在《巴巴爸爸去度假》这册中，七个孩子因故吵起来后“再也不想睡在一起了，都要搭一个自己的帐篷”，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颜色最好看，其他的颜色难看极了”，这也是姊妹众多的大家庭的烦恼。当巴巴宝宝们各自为战地盖屋、刷墙并大打出手甚至

“每个人身上都涂满了颜色”后，在巴巴爸爸和巴巴妈妈的耐心教育下，他们终于“明白他们做了傻事”，也再一次深深体会到“大家开开心心在一起多好啊！”

当《巴巴爸爸》22年前播出时，正是中国大规模实行“计划生育”后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生及成长的高峰，也许他们正是在兄弟姐妹一大群的“巴巴爸爸”家族中找到了与生俱逝的大家庭之乐吧。当这些“80后”已初为人母初为人父后，他们的子女是更为孤独的一代，人声鼎沸的“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应该会给他们带来不少大家庭之乐吧。据说，连泰勒和缇森夫妇如今在巴黎的工作室就是家庭作坊式的，他们的子女也介入到了推广巴巴爸爸的工作中。

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九口之家的大戏就就更热闹了。在《巴巴爸爸的马戏团》（接力出版社，2010年6月）中，当马戏团嫌弃巴巴爸爸家族所在的村子太小而转往镇上演出时，为了不让村里的孩子们失望，巴巴爸爸号召大家：“我们来组织一场演出吧！”于是，“有的开始做演出服装，有的开始准备演出道具，有的开始排练演出节目，他们一起贴起了海报。”

就这样，孩子们的独特个性和才华都得到了自由挥洒。虽然巴巴布拉伯平日可能显得太过活泼和淘气了些，但此时此刻，他发挥自己特长演起了杂技，逗得小伙伴们破涕为笑。平时专注于外表的巴巴贝尔这时也发挥了独特作用，村里来看表演的小伙伴们“每个人爱玩的游戏不一样，可每个人都喜欢巴巴贝尔的冰激凌。”

而当晚的压轴节目、古装话剧《巴巴骑士的传说》，其编剧、“书呆子”巴巴利波更是发挥了自己饱读诗书舞文弄墨的特长。

对个性的尊重和对多样性的凸显，让因材施教、人尽其材等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得到有效传递。在《巴巴爸爸的学校》（接力出版社，2010年1月）中，那些调皮得连大人都管不好的孩子，在巴巴爸爸新开的学校里却都能找到与

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对应的科目和老师。当跟着巴巴妈妈学做陶器的孩子们突然打起架来时，巴巴妈妈发愁了，可巴巴波拉伯“却很高兴”地发现“这些孩子都特别适合玩橄榄球。”

由于欧美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早于中国若干年，所以“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对环保和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关注让当下中国读者觉得恰逢其时——这再次反证这套书高度的前瞻性，甚至《巴巴爸爸建新家》（接力出版社，2010年1月）这册的主题就是中国公众并不陌生的“反暴力拆迁”。

在《巴巴爸爸回到地球》（接力出版社，2010年1月）中，“巴巴爸爸避难所”凭借一家之力仍无力抵抗来自任意排污、恶意狩猎等人类罪行对大自然的破坏与伤害。人类自作自受的恶果在泰勒笔下栩栩如生地得以表现：每个人都戴着氧气面罩，都灰头土脸地行走着。这时，“地球变得越来越灰暗”，“人们后悔了，开始想念那些美丽的花儿和可爱的动物。”

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有时也是因为粗心而造成的。当巴巴爸爸一家去火星旅行时，巴巴波拉伯由于担心火星上吃不饱，把他在地球上培育的菜豆带到火星上，不料由于基因突变，导致一场“菜豆大战”。因此，当巴巴贝尔离开火星前准备把波波树带回地球时，她的计划被巴巴爸爸及时制止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带，难道你忘记菜豆大战了吗？”

一本简简单单的《巴巴爸爸的火星旅行》（接力出版社，2010年6月）最让我刮目相看，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尊重原生态、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等深刻理念，就这样不动声色地通过一则少儿故事传达出来。而且，这个“科普”过程也前后照应逻辑严密。

而当西方最重视的圣诞节来临时，漫画家泰勒趁着轻松祥和的气氛给我们又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环保故事：圣诞老人送给巴巴祖的是一群热带鸟儿，它们不习惯这里的严寒气候，尽管巴巴爸爸一家想方设法为鸟儿们供暖，但它们最终还是不能适应。最后，巴巴祖只有忍痛割爱，放飞了这些热带鸟儿——他懂得了妈妈的教诲：“还是让鸟儿们回他们自己家吧，在这里，他们是不会快乐的。”

是呀，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应该让每一个生命都处于真正应该属于他们的独特位置。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我要让巴巴爸爸变出一只神鸟，给小侄女送去一套“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啦！



FILM 电影

观察员 言一（香港，richard7briner@gmail.com）

从我手上连续三年的香港华语纪录片节的小册子来看，似乎可以佐证我自己的一个观察：近两年大陆纪录片几乎是以一种凶猛的态势在成长。之所以是成长，而不是增长，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影片数量上的递增，更重要的是影片水准、曝光度、传播范围、放映方式等方面的良性发展。以香港华语纪录片节所选影片为例：在08年台湾产的纪录片占据了近90%的比例，09年跌落为50%，及至今年，更是仅有一部短片入选。鉴于对于台湾纪录片的了解不多，我无法就此断言台湾纪录片正经历某种低潮，但我在其中看到的同样有趣的一点却是香港纪录片的连续缺席。

若就独立电影而言，香港每年相关的电影节和短片竞赛不在少数；但纪录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却似乎不在香港民间电

影人,尤其是青年电影人的视野当中。我暗自揣测:这是否跟香港的商业文化甚至于电影工业的文化有关,跟香港高校内的电影教育有关。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香港高校内电影专业的学生动手能力是极强的,常常是从大一就开始涉足拍片或是其他相关制作——例如浸会大学的电影科学学生就几乎每人都拍过一条纪录片。只是,就像香港演艺学院所提供的表演教育一样,香港高校电影专业所提供的电影教育培训也越发地(在近年内)倾向于一种职业培训。换句话说,这一教育培训之下的学生,可能在拍摄、剪辑、特效等方面都极为熟练且不无创意,但对于电影本身的某些更为基础的理解却十分缺乏。拍电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很少问自己为什么要拍某部电影,某个题材,而只是将电影作为了一种展现自己的媒介。如果说独立剧情片尚可以作为一种练习,作为自己进入电影工业的跳板的话,那么纪录片便显得相对无足轻重了。因为,在香港,你很少能看到纪录片进入通常的商业院线。既难以抵达公众,又无法收回成本。纪录片,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双输的结局。也正是因此,去年张经纬的《音乐人生》才会被视为一个奇迹。



纪录片的这种双输,在大陆同样无法避免。只是大陆对于电影拍摄资源的严格控制和电影发行方面的管制,反而使得公众与成本,不再是纪录片拍摄时所考虑的重点。对于许多拍片人而言,最为核心的,是他们对于影片本身的一种 **commitment**,是那种非拍不可的念头。影片的拍摄完成,对于他们而言就已经足够。值得注意的是,也同样是这样一种 **commitment** 使得他们在作品中注入了太多的个人体验或感情,以至于对电影的理解有某种自我封闭的倾向,亦无法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相互批评的平台。不过,随着近几年大环境的些许宽松,某些城市空间的成长,给予了大陆独立电影人更多抵达公众的渠道,亦让他们开始考虑自己作品的受众问题与外界的批评。

若是从大陆纪录片的题材来切入,大陆电影管制与大陆独立电影之间的共生关系更加明显。就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陆纪录片对各种苦难的聚焦所反映出的大陆社会现状不必我多言。我无意否定这些聚焦苦难的纪录片的价值——相反对于其中的不少我认为是弥足珍贵的。只是,这样的一种聚焦在我看来依然带有某种自闭性质的危险。换言之,我更愿意看到更为多样化的纪录片作品,不仅仅局限于纪录片的独立电影。另一方面,大陆的独立电影之所以多为纪录片,其反映出的正是大陆电影工业的萧条与破败。这么多年来,大陆一直未能建立一个专业的电影工业体系,年轻人无法从中学习,体验商业制作的种种,从而只

能走向独立,走向对于艺术电影的聚焦,对实验电影的关注。而如果从电影史的角度看,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商业电影中许多成熟的拍摄手法,制作技巧——比如早期好莱坞,是完全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在纪录片的拍摄方面,有一个争议由来已久:纪录片,能否作为史料而存在。在此,我无意展开一场关于所谓“元史学”的讨论;我试图表达的是:对于纪录片而言,一种历史的纬度是重要,甚至是必须的。赵亮的《上访》在我看来最为出彩的地方就在于:他很好运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抓住了一对母子,拍下了这对母子上访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母亲在经历种种苦难之后的坚持,与女儿长大后的日益转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对比是鲜明却不剧烈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一种缓慢的步调在发生,而女儿踏出的每一步里,我们如果足够仔细,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更能看到大陆社会演变的轨迹。对于赵亮自己而言,他说他只是用一种民间的方式来补充历史。

从1996年算起,到2009年,《上访》的拍摄跨越了13个年头。这一方面让赵亮有了充足的机会去捕捉这十多年里关于上访的人和事,也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去结构,去剪辑这部片子。于是,我们才看到在导演版(5小时)的《上访》里,影片被赵亮分作了三个部分:《上访村》,《母女》和《北京南站》。《上访村》仿佛对于上访的一个综述,《母女》则成为了动人的事例分析,《北京南站》在奥运前的完工在赵亮看来似乎是某种象征,而其中从前上访旅店老板沦为上访民众中的一员的情节大约算的上我年内目前看过的电影中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赵亮素来以其镜头的诗意和节制而著称。这一特色,在《上访》中得到了最大的凸现。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对于影片中的那些上访民众,那对母女的尊重。但最最让我震撼的依然是影

片中的那种缓慢与严谨。我问自己：你能像赵亮一样在某个事情上如此缓慢的经营上十年么？我预感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我愿意，甚至渴望。

相比之下，徐辛长达 6 小时的《克拉玛依》则显得诚意不足。这一点，我在观影时就已经有所疑问，在问答环节得以证实。有观众提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去拍克拉玛依这个题材？徐辛回答说：当时有两个备选提案，一是拍唐山大地震，一是拍克拉玛依。唐山大地震已经有人拍了，而我自己又是个父亲，所以就觉得还是拍克拉玛依吧。在这里，我并非是拒绝或不认同选题方面的一种偶然性。事实上，赵亮对于上访这一题材的选择亦是出于一种偶然。但在拍摄的背后和影片本身当中，你都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肩负起一种记载，关乎历史的责任。而在徐辛的回答和影片中，我感受不到这样一种承担，甚至觉得他对于克拉玛依的选择就像是当下高校内对于学术课题的随意挑选——只是选一个自己还算有兴趣的课题，但不是非做不可。事实上，拍唐山和汶川的纪录片都远不止一部。

继续以学术作为比喻的话：如果说赵亮的《上访》是十年磨一剑出来的学术专著，那么徐辛的《克拉玛依》则尚处于文献综述阶段。在这部长达 6 小时的影片里，你能看到的除了一开始对于克拉玛依城外墓地的拍摄，就只剩下了采访的堆叠。这样的堆叠，如果真的延长到 12 小时，我相信会是一种视觉的灾难（导演徐辛说一度打算剪成 12 小时的版本）。我个人并不否定那些穿插于采访之间的旧的新闻录像与民间录像所具有的批判与反讽力量；只是在我看来，这些呈现依然显得单薄，留于表面。它或许可以激起所有人的愤怒，令观众流下眼泪，但这样的情绪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我升华与自我消费（就像人们消费汶川大地震那样）。从电影伦理的角度上，我对徐辛的拍摄手法亦颇有微词。尽管，我同意某些直接的拍摄在所难免，触痛

家属 14 年前的旧伤疤势在必行，但有必要非用这种摄影机前的提问与讲述的方式进行么？没有别的办法了么？家属当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只能从他们的言辞述说里得知。这样的讲述与对他们生活的实际拍摄难道相悖？（当然我知道这其中有一定操作上的难度）在 6 个多小时的放映结束后，我除了对死难者和死难有了详尽的了解，对于克拉玛依这座城依然知之甚少。我不知道那些死难者的家属在从前的克拉玛依城里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亦不知道现在的那座城里，所



呈现的又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作为一座多民族多信仰杂居的城市，作为一座行政结构上颇为复杂和暧昧的城市，我想值得挖掘的东西非常多。我们是不应该忘记苦难，但也不应当止于苦难。苦难，应当是我们重新审视一切的起点。

我不知道这种习惯性的对于材料的简单堆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 Frederick Wiseman 直接电影理论的影响。在我看来，某些艺术片的手法在纪录片中值得借鉴；而某些情况下，Wiseman 所谓的直接电影也确实风味独特。譬如最近看到的《喉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为电视新闻媒体中曾经的一员，郭熙志得以有机会拍下电视新闻采访制作中的种种细节。尽管这些细节以一种近乎无序而散乱的方式在 3 小时内逐一呈现，但对于熟悉或了解大陆媒体运作的观众而言却无疑可以在脑海中自行组织构架，会心一笑。在郭熙志的作品里，电视媒体人以一种普通城市人的形象被呈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机构里的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拥抱与撕咬。这些，是导演郭熙志所希望呈现的。而在这样的呈现背后，更是有郭熙志对于自己 20 年媒体生涯的反省：管制下的对于生命的一种消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反省，郭熙志不经意间置于影片末尾的一组镜头，在我看来却成就了一种绝妙的隐喻。那是一组对于清晨电视台工作间的扫拍。你能看到某些格子空着，某些格子挂着衣服，有

的人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娱乐，有的人还躺在工作间格子里的行军床上。整组镜头充满了告别的意味。但真正巧合的还是在，在这组镜头之前，郭熙志刚好剪入了一段电视台同仁的遗体告别片段。两相联系之下，呈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死后，容身的空间不过一副棺材，一个骨灰盒；人生前呢，亦不过是活在一个方方正正的工作间办公格子里。无论生前死后，人所栖居的空间都是如此狭小。而正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耗尽了他的一生。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既残酷又贴切的反讽。

某种意义上而言，残酷是郭熙志这部《喉舌》的最大特点。因为它太过真实，太过细碎。一不小心，就拍下了人在黑暗中的影子。但另一方面，郭熙志的作品和徐辛作品存在着相似的问题：一是伦理方面的欠周到或是欠考虑——当面对此一提问的时候，两位导演的回答都是被拍摄人知晓且愿意。可实际上，从影片中依然能看到被拍摄人的顾虑和几许不情愿、不自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人而言，往往欠缺对于影像的想象能力。换句话说，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很难想象镜头下的自己的。一种极为可能的状况是：他们在看过被拍摄的自己之后会后悔之前的拍摄。此外，在面对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也缺乏对被拍摄者的保护意识，以至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心有余悸且不无无奈地感叹：还好影片的放映渠道和次数都不算太多。第二个共有的问题则在于剪辑方面的过于单一和想象力不够，大多止于原材料的简单呈现。对于这一批评，导演郭熙志自己在后来的交谈中也表示同意，并且表明自己会在下一步影片中做更多剪辑风格上的尝试。基于对他下一部影片主题的了解，我个人倒是很期待他对《喉舌》一片中影像素材的重新挖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亦愿意以一种更为积极的视角去看待和支持郭熙志与徐辛的作品，以及大陆纪录片近两年的迅猛发展：至少，这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尝试；至少，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更多可用于再创作的素材。

图 2 为《喉舌》剧照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GERMANY 德意志

德国书市近览

特约撰稿人 扬克 (德国·图宾根, asukashinjirei@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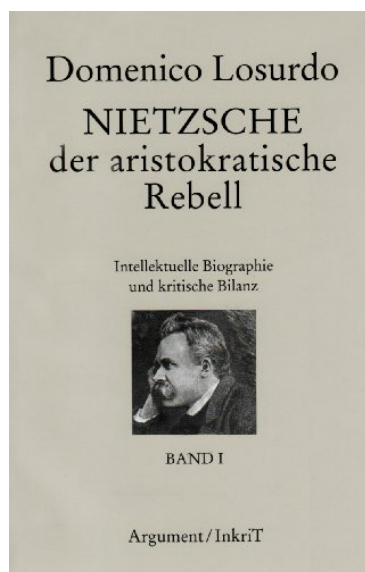
写作这份阅读报告时，南非世界杯激战正酣。非洲因为地缘关系和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旧债一直受欧洲人关注，图宾根那家始建于 1596 年的 Osiander 书店前阵子就在办一个非洲主题书籍的特展。专就南非而论，除了它特殊的历史，除了激战正酣的世界杯，对于普通德国人而言，它还是葡萄美酒和侦探小说的产地，这两样据说是南非最出名的出口品。德国人喜读侦探小说，南非的侦探小说不光惊险刺激锻炼脑子，还是了解这个近二十年前以曼德拉领导的种族和解运动著称于世的国家的历史与近况的有趣途径。Deon Meyer、Roger Smith 等是南非侦探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早已翻成德文，且多次再版。在他们的小说中可以看到种族隔离制度的阴影、非洲大规模的跨国偷渡、非法人体器官买卖，Deon Meyer 还在新著《十三小时》(Dreizehn Stunden, Stefanie Schäfer 译, Rütten & Loening, 2010 年 3 月)中通过对警察系统的描写折射出南非仍不透明的政治体制。就在 4 月初，主张南非白人独立建国的极右翼组织“非洲抵抗运动”领袖被杀，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十多年来的努力投下一抹阴影。多文化和谐共处的彩虹并没那么轻易降临，侦探小说中的罪与罚反映的是依旧充满冲突的现实。

高居Osiander书店进门一侧畅销书榜上的常常就是侦探小说和其他通俗读物。最近一本畅销书是德国前总理Helmut Schmidt与他的老友、专研纳粹历史的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Fritz Stern的对话录《我们的世纪》(*Unser Jahrhundert: Ein Gespräch*, C.H. Beck, 2010年2月)。Helmut Schmidt这位在1974至1982年主政德国的政治家今已九十高龄,晚年却获得越来越高的道德声望,2008年出版的著作《退休》(*Außer Dienst: Eine Bilanz*, Pantheon Verlag, 2010年3月第二版)连续两年位居畅销榜,去年与《时代周报》记者Giovanni DiLorenzo共同完成的《香烟对话》(*Auf eine Zigarette mit Helmut Schmidt*, 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 2009年2月)也传诵一时,想必《我们的世纪》凭借Helmut Schmidt丰富的政治阅历和Fritz Stern的历史学素养能为回顾二十世纪提供一种别具洞察力的眼光。一位德国朋友评价Schmidt是一位具有克里斯玛型魅力的政治家,另一位还提到他十分推崇康德与孔子,认为他们都致力于一种“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这一点恰巧与新儒家牟宗三一系将康德与孟子至王阳明一脉的儒家传统相勾连不谋而合。可惜牟宗三这位真正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回应的当代中国哲人在国内反不受重视。



纯文学书籍在德国也很少登上畅销榜,在书店中往往单独摆放。最近在德国文坛备受瞩目是前东德女作家 Christa Wolf 阔别十四年的长篇小说《天使之城抑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大衣》(*Stadt der Engel oder The Overcoat of Dr. Freud*, Suhrkamp Verlag, 2010年6月)。这位前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党员、斯塔西曾经的线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两德统一的反对者,其文学成就在德国并未被抹杀。90年代初因斯塔西档案解密,留下污点的 Wolf 不胜媒体烦扰远赴美国加利福尼亚,以这段美国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写下这本新著,但书中满是投向历史深处的回忆。《法兰克福汇报》如此描述此书:“在太平洋的海景与日落背后掩藏的是她对民主德国不幸的眷爱。”社会主义作为一套制度在德国已经消失,但作为一套价值观仍在许多人心生根深蒂固,也在德国的公共讨论与社会民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纯就小说而论,国内早有文学评论者指出,德国晚近的文学作品就两个主题:纳粹和东德。近年来靠《朗读者》蜚声国际的石林克如此,前年德国文学界最大奖“德国书业奖”获奖著作《塔楼》(*Der Turm: Geschichte aus einem versunkenen Land*, Suhrkamp Verlag, 2010年3月平装版)亦如此,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缪勒更如此: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早已成了德国人生存中的烙印。人们自然可以批评德国文学因此显得过于凝滞沉重,失去小说技巧与形式所要求的轻盈,不如卡尔维诺、库切、帕慕克乃至不如美国小资文学好玩好看,但两相对比,在我们追求轻之趣味的背后是否是太急于抛掉自己一手留下的历史重负?否则人世上古史皆神话,怎么就有刘小枫这样的学者明明是当代史、军事史、国际关系的门外汉,竟自比希罗多德轻佻地对过去一甲子的历史涂脂抹粉、加以神化?

德国通俗类与文学类的新出版物层出不穷,既有专业水准又适合一般学术爱好者的人文社科类著作却少见新作,毕竟这样的书也要经年累月的功夫。国内时不时就有一本西方学术经典被围观,确实热闹,但要明白那是欧美过去半个世纪乃至一百年的智识成果。在此处所见的有趣著作还是去年出版的一部尼采传记,这部上下两册逾千页的著作其实也非新书,而是意大利学者 Domenico Losurdo 2002年出版,如今译成了德文。德国与意大利在通常印象中简直是欧洲文化的两个极端,前者严谨,后者散漫,德国人是源自北方阴郁森林的条顿族性格,意大利人是南部阳光海岸的地中海性格,德国是新教肇源地,意大利却是天主教的壁垒。不过两国毗邻,政治、经济、艺术与学术实相互浸染、联系很深。单就尼采这个典型的德意志天才而言,其作品的批判研究版(通称KSA版)即由两位意大利学者完成。Losurdo 此书名为《尼采:精英的反叛——一部智识传记与批判性回顾》(*Nietzsche, der aristokratische Rebell: Intellektuelle Biographie und kritische Bilanz*, Erdmutter Brielmayer 译, Argument Verlag, 2009年4月),甫一问世即被评家认为堪比巴塞尔大学学者 Curt Paul Janz 那部经典的三卷本《尼采传》(*Friedrich Nietzsche. Biographie*, Hanser Verlag, 1978年)。国内出版的尼采传记亦有数种,较新的当是德国畅销哲学家 Rüdiger Safranski 的《尼采的思想传记》(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此书被收入所谓的尼采注疏集,编者曾大加吹捧,但在笔者看来,除了语言动人,真是言之无物,读时如同耳朵进



水堵得慌，读完又自然而然流个干净。尼采思想诡谲，又留下大量遗稿和材料，要将其一生理出个头绪，必须以强悍的史料处理能力为前提。Losurdo 与 Janz 的作品在这方面都不逊色，惟前者侧重于对尼采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更言之有据的评价。此问题学界向有极为对立的认识，一是卢卡奇著名的观点：尼采的非理性思想是纳粹的前身，一是包括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及 KSA 版编者之一 Giorgio Colli 在内之人试图将尼采的种族主义言论、对奴隶制的推崇视为一种“无辜的修辞”。Losurdo 力图在详加辨析史料的基础上同时避免这两种极端观点，他一方面重读了尼采之妹 Elisabeth 编辑的《权力意志》这本将其思想直接引介给希特勒、公认歪曲原作者的所谓尼采遗著，将之与尼采原稿对比，发现 Elisabeth 的计谋不是将乃兄种族主义化，反而是将许多太过刺激、残忍的反犹言论净化，以呈现一个好欧洲人的形象，同时检阅希特勒在日记、讲话中对尼采的引用，确认他在哪些方面受尼采影响，另一方面 Losurdo 也认为将尼采思想直接与纳粹挂钩过于仓促，政治运动有诸多复杂的社会经济成因，“德国特殊道路论”式的思想连坐法将忽视太多细密的历史层次。但他明确地将尼采思想称为一种“纵向种族主义”，有别于纳粹视不同民族高低有别的“横向种族主义”，尼采无疑捍卫精神精英的等级制观点。倒正是这种精神精英论颇受国内许多忘了自己出身贫寒的反平等、反人权的保守主义者青睐。

保守主义者们倚借的西方思想资源众多，霍布斯显然是最受糟践之一，他的威权国家论简直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学术升级版。图宾根名教授 Otfried Höffe 最近在 C.H. Beck 出版社的“思想家系列”出版了一本《霍布斯导读》(Thomas Hobbes, C.H. Beck, 2010 年 3 月)，由他一年前所开设的霍布斯讲授课和研讨班讲课稿修订而成。Höffe 是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权威，同时在政治哲学方面尤为关注全球正义、公民伦理，其著作在国内也有译介，但国内政治学界多是抱着三国式国际视野、轻视欧盟政治理念的实权崇拜式理论家，他的政治思想自然不受重视。Höffe 为何会在临近退休的晚年转而研究霍布斯颇让人不解，《时代周报》一篇书评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诞生于英国内战时期，他的国家学说一定程度上源于当时内战残酷景象的震撼，但 Höffe 的解释不太强调历史语境，着重于理论内部的重构，因而其在当下讨论中有何意义就成为问题。对此 Höffe 在导论中也略有解释，他开篇即说国家哲学在长久被忽视乃至弱化之后重新焕发活力，霍布斯显然是这个领域的代表，文末也坦陈自己对霍布斯的兴趣由来已久，而且霍布斯是一个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批判者，这自然引起在当代伦理学讨论中复兴亚氏思想的 Höffe 注意。但与国内学者仅仅关注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将利维坦从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剥离不同，Höffe 对这位“百科全书式作者”兴趣显然是全面的，但凡自然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以至人类学各方面的思想均有介绍，而这些在《利维坦》中实构成其政治理论的块块基石。可惜这样的晓畅导读怕会被国内崇尚高深玄谈的先生们鄙夷为对大思想家的稀释。



图 1 为 Helmut Schmidt 与其妻 Loki，图 3 为 Otfried Höffe

JAPAN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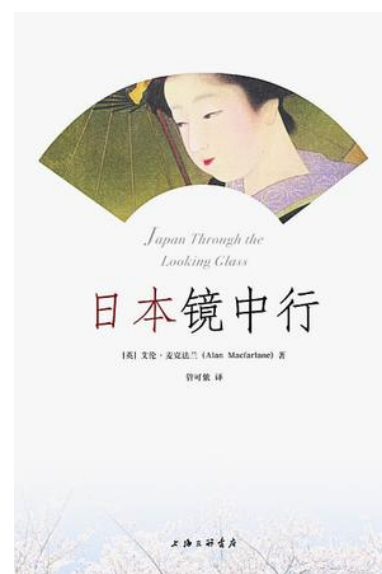
出版视野中的“日本热”第三波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尽管一个国家在某个学术领域或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研究的最高水平多取决于某个权威学者或集大成理论家个人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但倘若就国家整体的学术水准而言,一般来说,肯定会受制于彼时的出版水平。如果以“木桶原理”打个比方的话,那个时期的传媒出版视野,便是箍成木桶的那块最短的木板;而恰恰是这块“短板”的高度,决定了桶内所盛的水的容量。

国内的日本问题研究,虽然作为一个学术分野,至少在规模上已堪称“蔚然大观”,不仅学术生产体制足够庞大,学术产品也已相当丰富。至于说尚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和“重量级”学术产品,这无疑有学术之外的原因,在此姑且不论。单就目前已达到的规模和水准而言,其背后显然有出版的推动。这种推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波退潮,一波再起,有种类类似“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浪涌效应”:每一波都不仅覆盖了上一波所波及的范围,且冲击更加深广。

就笔者粗浅的观察,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国中的涉日图书出版历经了三次浪潮:80年代初中期为第一波。随着“开眼看世界”的冲动和“文化热”高烧,以商务印书馆的“日本丛书”为代表,一些日美学者的经典著作(如远山茂树的《日本近现代史》和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等)首次“登陆”中国,王芸生的八卷本煌煌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也由三联书店推出;80年代末至2000年前后,为第二波。凭借“文化热”的余温,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及戴季陶民国时代的旧著《日本论》等日本学名著陆续出版,并长期盘踞图书排行榜的醒目位置,成为各家出版社争相包装再版的长销书(Long Seller);从2005年“反日”运动前后至今,为第三波。至此,“文化热”已彻底退潮,代之以中日两国各自对自身及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位、调整。这一波的特点大致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广角、深耕:不再拘泥于对单一的历史问题或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个别关注,而是广泛扫描,已鲜有未发掘的“处女地”,且不乏跨学科的成功“越界”之作;同时,对某个学术领域的关注,也不再只局限于那些名头最响的作家和著作,而是向纵深开掘。以纯文学为例,既有对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村上龙等“老炮”的持续性包装,也有对诸如远藤周作、藤泽周平、隆庆一郎等虽然也是重量级作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精致”,但对中国的知识社会来说名字却较为陌生的“新面孔”的开发。姑且不论成色和品质,



至少就扫描的视野而言,确已日臻“全光谱”。远的不提,仅今年春天以来,坊间便骤然多了不少“日货”(或“谈日货”),且颇不乏精品。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的《日本镜中行》(管可秣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3月)和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的《面具下的日本人》(林铮顼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4月)可以说代表了美国以外的西方社会的日本学学术水平。作为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前者延续了自《菊与刀》以来人类学者关注日本问题的“学术传统”,作者连不通日语的障碍都与本尼迪克特如出一辙。“当爱丽丝进入奇境和穿越镜子的时候,她遇见了无数奇人……”作为西方学者,作者像童话中的爱丽丝一样,在漫游镜中世界之前,对“镜中日本”充满了各种想象,结果自然是有多少种预设,便遭遇了多少个挑战。但惟其有挑战,才激起人类学者的好奇,于是学者夫妇深入日本腹地,做长达15年的田野调研,拿出了一套破解“日本镜像”的密码。形式上不免令人联想到罗兰·巴特的名著《符号帝国》,但方法是人类学的,而不是后现代的符号学。

《面具下的日本人》是一本问世于80年代的著作,在我国也并非头一次付梓,大致在上述第二波时期,曾以一个颇商业的书名被包装出版过(《日本文



化中的性角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但书本身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所谈的也不全是性，涉及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学者，布鲁玛显然比麦克法兰更了解日本，对某些东洋文化现象，不仅从表面上诠释，而且对其发生机制问题，往往能从文化心理学的深层做一针见血式的剖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就事论事，以文化论文化，杯葛了 80 年代在日本国内甚嚣尘上、国际上也颇有同调者的所谓“日本人特殊论”。这在今天，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试图了解日本并尝试与之沟通的国际社会，都不失为一种弥足珍贵的“祛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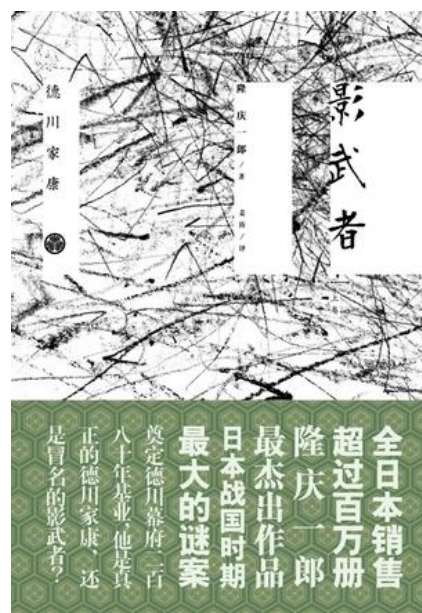
与上述两种西方的日本学著作相比，出自日本文化学者山本七平之手的《何为日本人》（崔世广、王炜、唐永亮 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年 5 月）是一部厚重之作。以诸如“何谓（为）日本”、“何谓（为）日本人”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做书名的书籍，大概全世界只有日本才会有。仅笔者手头就有不下三本同名著作（梅棹忠夫的《何谓日本》、加藤周一的《何谓日本人》及堺屋太一的《何谓日本》），且均有中文版，作者均系日本顶尖的学者、作家。只有敏感如日本知识分子的人，到了海外，会关注“他们如何看待日本”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本身，足以说明日本对自身“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焦虑到了何种程度。不过话说回来，焦虑归焦虑，作为一个民族，总得有人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基本问题讲清楚，这个民族才能从容自立、自处于世界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板砖一样的《何为日本人》绝非可有可无之作。作者山本七平，是出版家出身的文化学者，七八十年代曾出任日本政府的文化高官，见多识广，视野高远。其研究被媒体称为“山本文化学”，具有超越学界的广泛影响。正如书的副标题“探索日本人从神话时代到近代的行为原理”所阐述的那样，从民族的童年开始，直至被认为对现代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模式构成了决定性影响的德川幕府时期，作者以全新的史观和独特的分析框架解释了日本社会及日本人集体无意识中的种种潜规则和隐蔽的遗传密码，不失为对“何为日本人”问题的一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虽然连自己也说不清“文化身份”，但却不妨碍日本人被国际社会看成是最“有文化”的民族之一。概而言之，所谓“文化”，无非是衣食住行。而稻叶和也、中山繁信所著的《图说日本住居生活史》（刘缙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便是对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居住文化的一次精致的检讨。说“精致”，单口说无凭，但“有图有真相”：多达半部以上篇幅的精致钢笔画插图，形象地再现了日本人从史前的穴居生活到村落，到町家，到都城，直至现代城市社区的发展史；从榻榻米到鹿鸣馆时代的“和式洋馆”，到近代工业化时代矿工居住的长屋杂院，带着历史的风尘扑面而来，宛如一个建筑博物馆。对笔者来说，最是附录中收录的建筑名词解释，虽简明扼要，但却是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诸如“斗拱”、“迁子”、“贯”、“梁”、“透廊”等常见诸日本各种文化读本，却始终不知其所以然，不得不望而生义的和式建筑术语，居然以如此可人的“悦读”感觉得以瞬间破解，不得不赞叹日本图文书出版之亲切、细腻、高品质。

《影武者》和《黄昏清兵卫》的出版，兴许标志着国中出版界终于结束了对日本文学泛泛扫描的草创时期，从此步入深耕阶段。由于前者的作者隆庆一郎是日本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作为其历史小说代表作的《影武者》（姜涛 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 年 5 月）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时代剧色彩。加上作品是表现从“战国”末期到江户幕府初期，德川家康挑战丰臣秀吉的羽翼，从而走上统一日本、建立霸业之路的故事，其题材本身便是被重重谜团包裹、极富戏剧性张力的“大历史”的一幕，用戏剧化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真是再“贴”不过。

旅日作家李长声精心译的《黄昏清兵卫》（新星出版社，2010 年 4 月）是对已故小说家藤泽周平的致敬。国人对这位小说家所知甚少，但在强手如林的日本纯文学界，藤泽却是一位风格卓尔不群，遗世独立的俊逸之才。虽大器晚成，但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最难得的是，藤泽作为东洋文章“第一高手”（著名作家丸谷才一语），所有作品均呈现出相当高的水准，品质整齐，无一败笔，可谓字字珠玑。虽说是武士小说，但与《影武者》相比，其笔下的下级武士、浪人的生活更贴近今天都市社会终日郁闷惶惑的上班族的心态。所以在整个国家酷似一个大公司（所谓“日本株式会社”）的日本社会，受众之广可想而知。其小说被名导演山田洋次等搬上银幕，经木村拓哉、宫泽理惠等明星演绎后，更令人难以释怀。

日本《文艺春秋》新刊（2010 年 6 月号）发表纪念藤泽的文章，在一帧作家生前长期伏案工作的简朴书桌的照片旁边，注着一行源自作家本人随笔《书斋的事及其它》中的文字：“我有时会梦想，东西不增，反而一点点减少。就这样，把活着的痕迹逐渐消灭，然后蓦地就像消失一样生涯戛然而止的话，大概是最幸福的。”寥寥数笔所表达的生死观，是典型的“和式”



的，令人想到小津安二郎墓碑上的那个“无”字。

BOOKREVIEW 书评

纵欲乎？禁欲乎？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是第一位把“资本主义”这个词作为专有名词传遍世界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中国学人对他不算很陌生，他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902-08）、《资本主义的将来》（*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1932）、《德意志的社会主义》（*Deutscher Sozialismus*, 1934）、《社会主义



与社会运动》（*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1906）等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被翻译成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著作和学说在中国沉寂了半个世纪后，《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s und Kapitalismus*, 1922）的中译本问世，不久又被再版；他的另一著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 1906）中译本先后为两个出版社推出，证实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民谚蕴涵的真理。

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研究成果博大精深。他的资本主义精神来源论，与韦伯的清教“禁欲论”观点相异，人称是“解放说”的代表者。在宗教史研究领域，他与韦伯的见解完全对立，他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正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立的。因为资本主义

是现实的、世俗的，假如人们失去现实生活中的快乐与幸福，只会憎恨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进步。而且，人们积极参与了宗教活动后，会对经济活动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宗教改革运动只是强化了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促进了人们的内心体验的精神生活。桑巴特的视角转向犹太教与天主教的教义，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1911）一书里，他明确否定韦伯的新教伦理起源说，认为新教禁欲伦理精神是来自犹太教，这种精神在犹太教中更为明显，所以犹太民族才是最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群体。总之，他把犹太教作为清教的先驱，认为犹太教教义中包含着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即是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多元的，基督教（旧教）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也有很大影响。旧教教义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诞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罗马教廷的财政政策、租税制度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罗马教廷的这种政策是受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论影响。阿奎那为了调和法律与福音的矛盾，提出的宗教的法律伦理：这种法律伦理是为了使得人生普遍趋于合理，所以应该由这种神圣永恒的教义来支配世界、自然、宇宙，来制约人的情感与欲望。对上帝敬畏的人，才能使得人生合理。这种伦理观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促进作用，也为亚当·斯密继承。



桑巴特的论点遭到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 1844—1931)与韦伯的反驳。布伦塔诺特地写了《犹太民族与资本主义》一文，批评桑巴特随意解释史料，指出犹太民族本来并不是桑巴特所说的“商业民族”，而是“农耕民族”，所以也不是本来就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民族，不过是哪里资本主义繁荣，他们就迁居到那里，哪里资本主义衰退，他们就离开那地方而已。韦伯也在《古代犹太教》（*Das antike Judentum*）指出，犹太教教义中存在“对内道德”、“对外道德”双重伦理标准，在经济领域从事投机等非理性的事业正是这种对立的二元伦理标准的结果。犹太民族经济领域中的“技巧”只是他们在几个世纪实践中习得的结果，与犹太教教义没有关系。那是“贱民资本主义”，并非理性的资本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制造业大企业的创始人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即使出现制造业的犹太人企业家，那也只是晚近的事情。虔

诚的犹太民族恪守传统信仰，对一切革新所持的厌恶态度，与任何其他自然形成的民族相比毫不逊色。

《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走得更远了，对禁欲是否是真正孕育、促进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原动力提出了疑问。虽然他也曾经在宗教史范畴里论证过禁欲作用——孕育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至少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必须节约成本、节俭开支。但是，在此书中，他强调从宗教禁欲下解放出来的、世俗的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消费也是必要的——是其启动的动力之一。

桑巴特介绍了 15、16 世纪欧洲宫廷奢侈的生活方式特点：奢侈和女人。他想指出的是这种宫廷生活方式不仅是财富和成功的炫耀，而且成为世俗成功者实现其理想生活价值的示范，是上流社会身份的标志。同一时期中产阶级不择手段对财富的追求，就是因为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合理”的典范。反过来，新生的富裕的资产阶级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所接纳。”（页 16）世俗生活中取得财富成功的资产阶级发挥金钱的威力成为新贵族实际上想要取得旧贵族那种身份、地位上的认同——社会地位的“合法”标志。（页 13）他之所以把性的欲望、女人作为这种奢侈生活的一部分，在于统治阶级开始赤裸裸对性享乐的追求，也表明“禁欲”宗教伦理已成昔日黄花。“肉体解放”除了同时促进“自由爱情”与“金钱性交易”之外，而且“一切与时尚、奢侈、华丽、挥霍相关的怪念头首先都是由情妇们在实践中尝试，使其在某些方面变得平和之后，它们才最终为受尊重的妇女接受。”（页 81）女人虚荣的奢侈消费反过来再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是奢侈的样板。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奢侈性消费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工业并不是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页 34）这两种现象即使今天在后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随处可见。也正是这一原因，现代工业尚未建立的或刚建立不久就迅速扩张的城市往往是超负荷的人口、性产业畸形发达、失业、贫困、犯罪等等社会病理丛生的据点。

桑巴特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对物质至上的资本主义的现状乃至未来并不乐观。何况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页 233）与凡勃伦《有闲阶级的理论》（T.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样

他也把“炫耀性消费”作为非理性的产物。他也看到了性享受、奢侈虽然促进消费，带来了生产的扩大，其本身不会成为持久的精神动力，也有难以克服的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奢侈是斩杀富人的“刽子手”。由于所有的快乐被推向极端，富人失去享受快乐的能力：“感官不感到满足，它们已经迟钝。我们不再遇到令人兴奋的变化，而是面对怪诞的使人生厌的铺张浪费；这就造成了时尚、衣着、风俗、举止、言语在没有恰当原因的情况下持续不断变化。富人很快就对新的快乐感到麻木。他们房中的陈设像舞台设备一样可以随意改变；穿着成了真正的任务；吃饭则是为了炫耀。在我看来，奢侈对于他们就如同贫穷对于穷人一样，是一种苦恼。啊！为奢侈而牺牲任何事物，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灾难就是疯狂的消费，他们总是花得比预计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费形式出现，以致没有哪份财产不被其逐渐消耗掉。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恣意挥霍！人们浪费自己的收入，挥霍尽财产；每个人都试图让人吃惊的铺张排场，在邻居中出人头地。”（页90）

此外，后来很多研究者们都指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与韦伯的同一概念也有很大出入。韦伯概念中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经营者（资本家），也包括受雇用的工薪阶层。认为两者出于同一社会形态，具有共同心态、追求。而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主体只限于资本家。他认为受雇用的工薪阶层具有他们独自的心态、追求，所以，另一方面，他也关心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有诸多专门关于社会主义的著述，也就不以为奇了。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8元；《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19元；王明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5元。

图1为1895年桑巴特在德国Breslau参加社会民主党（SPD）代表大会，居中者为桑巴特

实验一种更通俗的文体

观察员 朱白 （广州，zhubai@tom.com）



韩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中短篇小说见长，那时他在读者心目中是另类汉语小说的代表，也是一个反叛者（除了“断裂”等一系列的文学行为，当然还主要是指他的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创作）；再早一点他是汉语诗歌“第三代”的代表，在与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之争中充当着先锋者甚至导师作用（这从后来一大批的口语诗歌作者的作品和自述中不难看出韩东作为诗人曾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如果非要给一位作家的写作生涯划分出来整脚的几个阶段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的韩东，则成为了汉语长篇小说的实验者和积极的实践者。

从《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到这部刚刚从裤兜里掏出来的《知青变形记》，可以说近几年是作家韩东的长篇小说专题年。据说他还在写诗和短篇小说，但那已经不是工作状态的写，长篇已经成为专职，其他只能是兼职，甚至是业余爱好。我以为有识之士应该看出这种外在的创作体例的变化，给作家本人的创作内容带来的内在影响，也就是说短篇变成长篇这种表面的形式变化，与创作内容等内在精神之间的互动，是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之后的呈现。

跟《扎根》的粗壮扎实、《我和你》的滥情不可控制、《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严肃抒情等等比起来，可以说《知青变形记》更加踏实和整齐，也许韩东在尝试着用更大众的语调和结构来抒发他的那些

原本生僻的情怀。韩东写知青，却不仅仅是知青故事，从个人经历上来说，韩东也不应该是知青历史的体验者，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知情者，但历史是多变、巧合和开放的，以虚构为特长的小说家为什么就不能写出自己心中的“史料”呢？韩东将一个离奇而荒诞的人生遭遇嫁接到知青那段时期，主人公罗晓飞是一个被磨平个性的人，你看不出作为主人公他有任何不同于他人的地方，中庸就对了，或者说，作家有意设置这么一个没有过多鲜明个性的主人公，就是想将个体的悲剧命运扩散成你我所有人不可逆转的人生困境。在我看来《知青变形记》跟韩东以往小说中的那些核心观念没有两样，荒诞而又无法变更的

人生之困，还是这部显然更通俗易懂的小说的主题。

韩东的尝试，应该是当代小说家要做的必然尝试，他愿意放下过多自我的姿态，用一种宽广去拥抱数量巨大的大众群体。有人说，放低姿态、妥协意念意味着从众和彻底的成为大众文化的牺牲品，而在我看来，实在是看不出这部既好看又悬念迭生的小说，有多少难为情的，或者因此失去多少耐看的品质。也就是说，好看从来都不是耐看的消毒液，晦涩最大可能的只是艺术性的托辞借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获奖作品《青春》，不也是部轻松好读的迷人作品吗，它并没有因为好读而失去任何艺术性是不是，所以请那些仍旧愿意坚持凌空蹈虚、以写晦涩难懂为个人风格的作家们醒醒吧，所谓排斥大众最多只能是一个自我的风格，是手段，这并不能成为任何结论的证据。

作为一名资深的作家，韩东从来从不忌讳谈论自己的学习过程，他经常把村上春树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边，他愿意在“先进”的同行那里弯曲下来去学习。我眼拙，没有看出来这部《知青变形记》受到村上春树的任何影响，大概大师之间的借鉴也是化骨绵掌之类的无形之中吧。但是韩东有意将故事写得更加富有悬念和夸张，这一点谁都看出来，主人公罗晓飞跌宕起伏的人生中，被作家安排成紧凑而张力十足的悬念剧，哪怕对悲剧的结局早已经心知，但还是忍不住要看看作家是怎么安排他们一件件展开又一件件走到自己命运终点。罗晓飞的荒诞人生，是作为个体充分没有“自由”的一次有效证明，他被安排当上知青，再被安排跟绍娜谈不明不白的恋爱，然后被诬蔑干下无人性的强奸母牛一案，为免逃一死，他再次被安排接替无辜冤死的范为国继续他人的人生……在这条被安排的人生道路上，罗晓飞随后更是踏上这条原本就无多少自我意识和选择的道路，被动送死，被动异想天开，被动求饶，被动真正变形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农民，这荒诞的人生有多少是自己意料之中和自我选择的呢？“唉，他们总是这样，把我推来搡去的，也不打声招呼，使我陷入无法自主的境地。当年，把我和邵娜分开、让我和继芳在一起他们是这样干的……”多么无奈而又卑微的台词，可罗晓飞也许并不是一个奇遇，即便是他那富于戏剧性的遭遇中，扒掉必要的夸张外衣，他就是我们每一个生活中人。作家并不是要对“知青”发言，更不是真的要为知青写史，而是将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命运再一次扩散成人类的整体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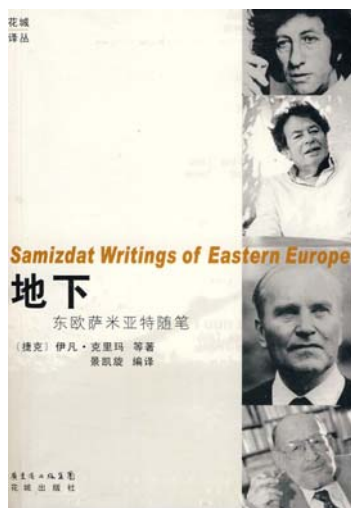
韩东在这部小说中，精心使用着自己熟悉的语言，更是精准地给一部悬念不断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布以精巧的局，并设置成最有益于读者阅读的结构，人物的悲剧命运和自身的遭遇也是在作家笔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生长、开花结果。荒诞诞生于平实生活，悲剧更是扎根于日常生活。作为曾经的开创性诗人和先锋小说家，韩东此时用一种成熟的手段将自己手中的故事翻炒成烂熟而不失口感风味的境界，这既是放低姿态的一次努力，也应该是作家对自身变更作出的积极尝试。

韩东：《知青变形记》，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28元。

图1为北大荒知青

地下写作者的精神探险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1941年，德军悍然轰炸贝尔格莱德，一群“地下工作者”潜入地下，坚持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地上的朋友守口如瓶，声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于是，地下工作者继续潜伏，一边传宗接代，一边生产武器；地上的朋友成为革命元勋，一边受人爱戴，一边贩卖武器。直至有一天，地下工作者误打误撞，重见天日，以为还是二战时期，大开杀戒。

这是电影《地下》的情节，不是历史、胜似历史。对于那个已经胜利闭幕的南斯拉夫，读者想必耳熟能详：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领袖总是光荣正确的。与电影里那些不明真相的地下工作者不同，景凯旋先生编译的《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聚集了一群“别有用心”的地下写作者，他们来自当时的东欧、现在的中欧——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萨米亚特”是音译，可以意译为非法出版物、地下出版物。把出版物分成合法和非法、地下和地上，无法说明作家们从事非法活动，只能证明这个政府在违宪。众所周知，

不论何种政体，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会有出版自由的条款。绝大多数政府会遵守这一条款，极少数政府把宪法当做摆设，对出版物进行事先审查，审查通过才是合法的、地上的，没有通过的就是非法的、地下的——已经烟消云散的几个东欧兄弟国家，就曾属于这极少数。一些作家既不愿意接受外在的审查，也不愿意自我审查，他们自己印刷出版物，以“非法”的方式争取公民权利，这就是在东欧和苏联风靡一时的萨米亚特现象。

在中国，这个词并非首次登场。在捷克作家克里玛《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里，崔卫平女士把它译为“桑米兹德”。沈志华先生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详细介绍了苏联的“萨米兹达特”，即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相比之下，将萨米亚特（或桑米兹德、萨米兹达特）翻译成独立出版物，最为妥当。

近十年，东欧文学越来越多地被译成中文。除了此前一枝独秀的昆德拉，哈维尔、克里玛、赫拉巴尔、马内阿都开始被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知。但是，了解依然有限。在《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里，除了克里玛，其余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初次相逢。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书》和《红木柄小刀》已在台湾出版多年，在大陆却迄今未曾出版。桑塔格、布罗茨基都对他称赞有加，可惜大陆读者只能捕风捉影，无缘一睹真身。此次《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收录了契斯的六篇文章，可以让大陆读者对他有近距离接触。契斯主张“反讽的抒情”，这对泛滥的悲情叙事和甜得发腻的抒情是必要的校正。

扬·帕托切克，胡塞尔的弟子，七七宪章发言人，在一次漫长的审讯后“被自杀”。哈维尔的名篇《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作，这篇文章分析了一个水果蔬菜商店的经理，为什么要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安放一条他不会去思考也不会相信的标语？《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收录了帕托切克的《何谓“七七宪章”》，他指出所谓“习惯成自然”并不成立，宪章的签署是为了表明一个原则：“政治须听从法律；而法律无须听从政治。”

在东欧，人们习惯于顺从，并且把责任归咎于制度。制度制造了一个天鹅绒监狱。不去思考、不去反抗，按部就班，你的生命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开始思考，但打死也不说出思考的秘密，你会和柔软的牢笼相安无事，代价是精神分裂。如果你不仅思考，还要公开自己的想法，并且与朋友进行交流，就会视为“别有用心”。但是，思考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人从未独立思考过，他会视思考为畏途；一旦他独立思考过，并且体验过分享思想的快乐，再让他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就比时光倒流还要困难了。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的作者们就是那些残存的独立思想者，他们的思考不是为了注解典籍，而是和他们身处的现实经验息息相关。东欧的地下写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国家里，写作者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才能保持他们的独立性？

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东欧模式的难以为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与东欧的主旋律保持距离是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是身处其中，坚守职业道德的写作者反而会遭到种种质疑：一方面，他们处在道德劣势，会有强大的声音质问他们为什么总是写一些孤芳自赏的小圈子文字；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获得利益回报，写作不但没法获得承认，甚至会带来围困之灾。只有极少数人，在那时那刻就清晰地认识到，恰恰是一个保持独立品质的“小圈子”使得他们可以互相取暖，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写作，这种精神探险带来的回报不是世俗的满足感，而是充满风险的幸福。

萨米亚特是进行精神探险的木筏，随时可能触礁，却让写作者们在一个必然性垄断一切的世界里拥有了无数可能性。东欧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些地上、合法的、与时俱进的写作者被彻底遗忘，那些地下的、非法的、不识时务的写作者，至今还在一个又一个国度与读者相遇。

景凯旋编译：《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5月，26元。

“素人”教授洪子诚的“怯懦”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说来惭愧，知道洪子诚教授只是几年前而已。那时，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接触当代文学，由此才知道了洪子诚教授以及他那本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本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无需赘言，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学术价值并不能领会，其话语方式以及平淡的语言反让我感到陌生，及至后来再读了一些他的文章后，我才渐渐习惯了洪子诚教授的话语方式和语言，这让我第一次想起课堂和老师，没有了敬畏感与压迫感，却能感受到一种向上与向善的力量与勇气。为此，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我总是琢磨这种力量与勇气从何而来。

若与“著作等身”“声名显赫”的教授们相比,“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没有受到什么惩处,没有得过什么奖赏”的洪子诚教授可谓是如今学术界少有的“素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洪子诚教授曾抱怨太长,“主要是出于显示‘学术分量’的考虑,并能获得较多的稿酬的考虑。”此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将其曾经的著作与文章几乎全部收入,厚厚薄薄一共七本半(其中一本是合著),这与他的同辈晚学,乃至徒子徒孙相比,都似乎略显“单薄”。与太多“刀枪不入”“言之凿凿”的著述相比,洪子诚教授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胆小困惑”以及时不时流露出的“不自信”,似乎更是少了一份大家风范。然而,洪子诚教授却是如今众多研究现当代文学学者中我唯一愿意尊为“先生”的人。

福柯曾说:“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在于它怎么说,换言之,话语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语使用者的意向有关。”洪子诚教授似乎便如此,其话语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他的内容,更来自于他的话语方式。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说话的姿态与方式,让他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与理性,让他得以跳出同代人的局限,用朴素干净有节制的文字将欲理还乱的当代文学剖析得技经肯綮而又游刃有余,不置臧否却豁然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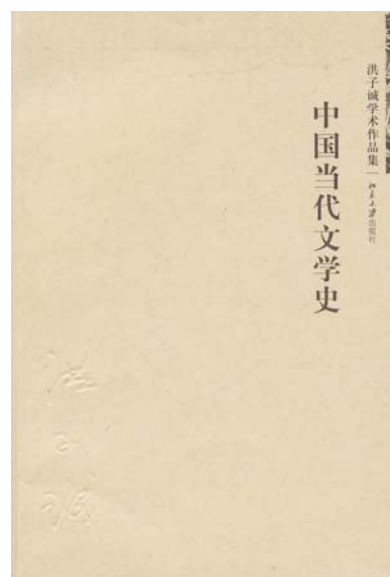
在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避免用一种“二元”的简单方法建构文学史,避免用“政治/文学、正统/异端、压制/驯服、独立/依附等历史叙述模式”建构历史似乎是众多学者努力的目标,但遗憾的是,似乎唯独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摆脱了上述种种叙述模式,“将对历史评述的道德问题,转移为不那么道德化的学术问题”。对于当代文学的发生,他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断裂”的当代文学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文学体制,乃至“左翼文学”;而对于新时期“幸存者”的言说,又始终保持一份警醒,避免加上一层天然的“道德审美”因素;虽然自青年时期便对诗歌抱有热忱之心,但他却能清醒认识到如今诗歌的边缘化与尴尬处境,并为 90 年代后“一些诗人那样强烈甚至畸形的‘文学史意识’、夸张神化诗歌的浪漫主义幻觉纳闷不已。对此,洪子诚教授解释道: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立场、站队、表态成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内容,构成我们紧张的畸形心态的根源。因而,在走出“文革”之后,我有一种类乎“本能”的对“站队”、“立场表态”的抗拒。我尽量回避需要表明“立场”的场合,也不会把文学史研究作为表达鲜明道德立场的载体。自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性格怯懦一面的表现。

因而读洪子诚教授的文章,面对的仿若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而只是自己的朋友,他会用温和的眼光看着你,然后会毫不隐瞒自己“怯懦”的一面:他会坦诚自己选择当代文学史,是“不断明白做不了什么事之后的结果”,而诗歌研究是自己“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之一;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他会承认面对日本学者的提问,自己竟然说不出有喜欢的当代作家,甚至承认自己可能没有兴趣和耐心再去面对“当代”大量的诗歌与小说文本,“当代文学研究也已难有作为”;作为上了一辈子课的教授,他还会承认自己至今面对讲台依然惴惴不安,讲稿非要一字一句写好否则就乱成一团,而文章写好后还要向自己的学生再三确认是否还可以……

或许,正是这份认真而诚实的“怯懦”,让洪子诚教授显得似乎有些“不识时务”的天真,甚至是有些“迂”:在本应该含糊的敏感地方,他的论述却异常地直接而尖锐,如其对毛泽东文学思想与 50-70 年代文学规范形成的论述,从意识形态角度揭示出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本质,从而确立了“当代文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在本应“立场鲜明”的地方,他的论述又变得含糊不清却又让人心悦诚服,如其对浩然小说、天安门诗歌、“复出”作家、知青作家等几乎所有作家的评述,在同情加理解的基础上,细致而精辟地进行辨析,温和而又不失锐气地进行褒贬,而自始至终贯穿其著述的是其平实、理性、清醒而有节制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隐含的一份“担当”的勇气与一份“适度”的理想。

我常常好奇,究竟是这种“怯懦”的性格让他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因而从学术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启蒙立场”出发进行自己的当代史论述的呢?还是与之相反——因为充分意识到了历史的复杂性,所以始终保持一份理性、警醒与谦卑,从而得用一种“怯懦”的态度进入历史,努力返回到历史情境中,“返回现场”,去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亦或是两者互为因果?

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洪子诚教授让我见到了一种“怯懦”的话语方式和一种未受污染的文字。《复归的素人》作者徐干生在其文章《共同语言》中说道:“自从四五千年前,人类创造言语文字以来,第一次,历史在这方面发生危机:我们彼此沟通心灵的传递物,突然崩溃了。”“我们中间,有些人还很年轻,此刻却不得不借助于一些空洞、伪善、僵死的哲学来



表达心灵。”这位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痛苦地发现，他年轻时代那种“文明、优雅、美丽、富有教养、生气勃勃”的汉语已经死去，“文革”时使用的汉语“是一种僵化、粗鄙、野蛮、丑陋、噩梦一般的语言，除了仇恨和暴力，便是自虐和屈辱”。

对于这条被污染的肮脏的语言与精神河流，徐干生在文章中悲怆说道，我们明明知道永远洗不了澡，却不得不仍在这条河里洗下去。而对于在这条河流中泡大的、习惯了“启蒙”与“被启蒙”、习惯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习惯了仇恨与暴力的后辈们来说，更是值得悲哀。由是观之，洪子诚教授的“怯懦”不仅是一个奇迹，更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智慧：人不仅需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渺小，还需要一种理性的宽容与警醒，以及诚实。

或许是为了能回到少年时代所熟悉的那种优雅的语言，晚年的徐干生不再写早年写的新诗，反而写起旧体诗词，并称自己为“复归的素人”。对于“素人”，其儿子徐贲在其父亲这本著作的前言中定义为“一个自由自在的平常人”。若以此为标准，“怯懦”的洪子诚教授亦可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素人”。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至5月，306元。

OBITUARY 逝者·吴冠中

横站于东西方夹缝间的艺术家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2010年6月25日，著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冠中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吴冠中是中国美术界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泰斗级艺术家，在世时便曾于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等国内外一流美术馆举办过多次个展；荣获法国文化部最高艺术勋位，并被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其作品在国际拍卖活动中不断刷新纪录，按总成交额计算，谨以微小差距居于齐白石后的第二位，随着画家的去世，超过齐白石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北渠村的一个普通农家。一方面是像那个时代众多青年一样，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同时也不无对未来出路的现实考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浙江大学代办的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读完一年，按彼时的规定，参加大学预科生的暑期集中军训，吴冠中与国立杭州艺专预科学生、后成为旅法著名画家的朱德群编在同一连队、同一班，俩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一个周末，吴冠中随朱德群参观艺专，看到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当即决定弃工从艺：“十七岁的我拜倒在她的脚下，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了浙大高工的电机科。”¹

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创办并执掌的杭州国立艺专（即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与北平国立艺专（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并立为民国时代南北两大艺术教育重镇，师资雄厚，人才济济，教学中西合璧，吴冠中在这里受到了包括印象派在内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启蒙。抗战爆发后，杭州校区被毁，学校被迫辗转迁移，从长沙到沅陵，从贵阳而昆明。躲警报之余，临摹《南画大成》、画人体模特，艺术并未完全成为战争的牺牲。艺专毕业后，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同时自



¹ 吴冠中自传《我负丹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修法文，为赴法学艺做准备。

1946年暑期，教育部在全国设九大考区，公开选拔战后第一批留学生，其中只有两个留法绘画名额，竞争空前激烈，吴冠中幸而考中。翌年夏，赴法留学，入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师从苏弗尔皮教授（J. M. Souverbie）。这位巴黎画派的重要成员，把艺术分为两路：小路艺术娱人，大路艺术撼人；其看对象或作品亦分两类：美（Besu）与漂亮（Joli）。如果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呵”，便是贬词，是警惕。²老师对艺术的“酷评”标准，显然也影响了后来吴冠中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尺度。

战后的巴黎艺坛，自由之风吹拂，本来就倾向现代派的吴冠中如鱼得水。来法国前，吴冠中原本是不打算回国的，“因为国内搞美术没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为洪水猛兽”。但一方面是思乡心切（彼时已结婚生子，夫人朱碧琴与长子在江苏老家），感觉梁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另一方面，梵高的一句话，让画家陷入深深的思索：“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因此，当苏弗尔皮教授预备为弟子延长公费时，吴冠中向老师吐露了内心的想法，得到了后者的理解与支持。1950年暑期，吴冠中回到新中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吴冠中得以任教中美，系老同学董希文³的推荐。院长徐悲鸿一味主张现实主义，与林风眠兼容的，甚至有些偏爱西方现代艺术的学术观点水火不容，故旧杭州艺专系的学生也与徐系的学生观念相悖。新教师上任后，徐悲鸿作为校长出面请客，但“除必不可少的礼貌话外，徐先生和我没有共同语言，虽然我们是宜兴同乡，彼此乡音均较重”⁴。吴冠中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让学生们传看一两本，结合名作，解读艺术观念和源流，效果甚好。令他惊讶的是，学生们居然从未听说过波提切利、莫迪里阿尼、塞尚、梵高等西方名家。而当有同学问老师有无列宾的画册时，则轮到吴冠中感到汗颜：不仅没画册，甚至从未听说过列宾的名字。课后问董希文，董说是俄罗斯十九世纪大画家，是今日国内最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吴冠中回家后查法文美术史，好容易发现了列宾的名字，但只有寥寥几行文字介绍。

吴冠中在中美教书的第二年，赶上文艺整风运动，徐悲鸿在全校大会上讲话：“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到；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吴冠中感到非常孤立。很快，便接到调令，去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在清华，住在原先朱自清等名教授住过的北院六号，吴冠中感到很舒服。建筑设计要讲究形式，也不怕被批为“形式主义”。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音乐系为基础组建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艺术学院）成立，吴冠中应邀去该院工作，任副教授兼油画教研室主任，就此“归队”美术界，直至八年后艺术学院建制取消，并入中央工艺美院（1999年工艺美院又并入清华，成为清华美术学院）。

吴冠中从青年时代起热爱鲁迅，对鲁迅的阅读与理解贯穿了一生。他在1999年为《文汇报》“笔会”专栏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但居然横站了五十年……”但正因为费力而决绝地保持着“横站”的遗世独立姿态，艺术家打通了西画与国画、美术（或曰“纯艺术”，Fine Art）与工艺之间的藩篱，成为在诸多领域中独树一帜的格外醒目的存在，而不在乎是否会被“艺术主流”边缘化。

早在杭州艺专预科时期，学生不分科，统属绘画科，以西画为主，兼习国画。因为国画的老师是潘天寿，备受学生崇敬。吴冠中也受此影响，一度转入国画系。“但我那感情似野马的青年时期又未能安分于水墨淡雅之乡，我狂热地追求色彩，终于又改回了西画系，从此梦寐以求的是塞尚、高更、马蒂斯、毕加索……”⁵“我一向着眼于中、西方审美之共性。我爱传统绘画之美，并曾大量临摹，深切地爱过，仍爱着。我也真正爱西方绘画之美，东也爱，西也爱，爱不专一，实缘真情，非水性杨花也。”⁶因为在艺术家的眼里，“达芬奇的素描山水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颇为相似；波提切利的作品突出线造型、平面感、衣带飘摇感，大异于拉斐尔、提香等浑圆丰厚的立体氛围，独具东方情致。郁特利罗的作品中可感到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及‘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中国实情，加之他表现手法中强调平面分割的对照及线之效果，我最早喜爱其作品也许缘于吻合了我的中国品味，而中国传统的或民间的绘画中也同样可发现西方所探索的因素。”⁷正是基于如此独特的视角，吴冠中才能操觚水粉、油彩、彩墨、水墨、版画等几乎所有的绘画媒体，不懈地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创新的探索，在土土洋洋与洋土土、抽象与变形之间东奔西突，左右逢源。所以很难用一个笼统的概念来定义其艺术。如非如此的话，也许只能勉强用“造型艺术”来概而括之。

² 同上，第13页。

³ 董希文（1914-1973），浙江绍兴人，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开国大典》的作者。

⁴ 《我负丹青》，第25页。

⁵ 吴冠中《横站生涯五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⁶ 同上，第87页。

⁷ 同上，第86-87页。

但虽说如此，在国中现状的艺术体制下，吴冠中的的确确始终不代表“主流”，甚至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是被“边缘化”的对象。1999年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吴冠中艺术展”，占了三个大厅。不仅规模空前，而且以文化部的名义为一个在世画家举办个展尚属首例。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国家对艺术家价值的肯定。吴冠中似乎也颇为感动，从展品中遴选了十幅巨作捐给国家。但展览一结束，便有人策划了三篇批判文章，在《文艺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浓烈的意识形态味道，恍如文革大字报再现，一扫个展的余韵。

不仅如此，单就作为画家的资质而言，国内美术界对吴冠中也有臧否两论。譬如，说吴的书法“不行”等等。传统书画界历来有所谓“诗、书、画一体”说，当代艺坛也不乏这方面的“通人”或自诩“通人”者。对此，吴冠中并不避讳，而是坦言自己的不足：“三十年代我随潘天寿学画，潘老师说：‘有天分，下功夫，学画二十年可见成就，书法则须三十年。’潘老师的话我总是相信的，但当时对书法与绘画的比较则尚无体会，只根据他的指导临颜真卿、黄道周，及魏碑、石鼓文。然而，对书法的兴趣远不如绘画，对画的优劣感到一目了然，自以为很懂了，可是对书法却缺乏独立审评的能力……其后我专攻西洋画，连水墨工具都抛弃了，更谈不上再练书法。”⁸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然书法上的缺憾是一个事实，但画坛宗师的泰斗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晚年，吴冠中除勤奋创作外，还以敢言著称。画家以切身之体验，痛陈体制弊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仅诸如“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笔墨等于零”、“艺术活动跟妓院差不多”的发言令许多官员和同行不舒服，所谓“以奖代养”、“撤销美协、画院”等建言也触及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作为解决方案，未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但毋庸讳言，艺术家的激愤之言，很大程度上是对束缚、乃至阉割了艺术家创作力的艺术体制之患的不幸言中。

虽然直至1979年，吴冠中才拥有了一间11平方米的画室，可艺术家一生勤奋创作，著述（画作和著作）等身。除了给孩子留下几幅纪念性画作外，绝大多数都捐给了社会。其中相当多的作品，作为经济泡沫的一部分，还处于“充气”状态，价格日益飙升，但已与作者无关。作者轻掩画卷，已走进历史。

知我罪我，是耶非耶，升值贬值，官司荣辱，都不重要了。用艺术家自己的话说：“时代的变迁，个人的经历和年龄铸造了今天的我，无从后悔，无可自得，自己无法对自己作出客观的评价，倒是可作为别人的借鉴，蓑草乃新苗之肥！”⁹

图1为吴冠中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专

美术界的鲁迅

观察员 成庆 （上海，veron.cq@gmail.com）

近年来陆续逝世的文化老人名单，日前又添上一位艺术界名家。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于25日夜23时57分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1岁。这位在民国时期接受中西艺术教育的大画家，是那个时代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硕果之一，一个时代，正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地远离我们。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一代画家的历史角色与艺术价值，就不得不从他们所经历的时代背景去梳理和发掘。例如吴冠中先生当年所就读的杭州艺专，林凤眠、潘天寿以及吴大羽等等名师云集，培养出了几代画坛英杰。而在民国时期的画坛，其实存在两个主要的倾向，一个要固守中国画的传统，另一个则是要学习西方艺术，个中激进者，甚至认为中国美术传统已告衰落，可以弃之不理。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华裔画家赵无极，当年在艺专学习时，潘天寿要求他临摹中国古画，他因为讨厌而逃课，甚至公然跳窗而逃。因为他认为传统画已经走上末途，只是不断的重复，不再具有生命力，而要让中国美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必须学习西方美术。

从当年看，吴冠中显然属于当年“西化派”潮流中的一份子，但有趣的是，他后来虽受益于西方美术技法，但是其后来绘画的主题却始终不离故土与民间。这两大主题，对于他所推崇的鲁迅所在时代的左翼文化人而言，自然再熟悉不过了：“民族”和“大众”的文化。他当年受到梵高之语的激励，离开法国，回到局势并不明朗的大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此时的吴冠中，甚至还将这次归国自比为当年鲁迅的“弃

⁸ 吴冠中《横站生涯五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139页。

⁹ 同上，第56页。

医从文”。

吴冠中虽经法国艺术的科班训练，但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画家，在情趣上显然并不像校友赵无极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情调”，他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当时的心境：“一个穷僻农村里的孩子，爬到了这个西洋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这些快活发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灯红酒绿的狂舞对我太生疏。”这样的情绪显然真实而不加掩饰，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他要反复强调，艺术要回到“大众”，回到人民中去。

但是，同主旋律画家不一样的是，吴冠中的所谓“回到人民”，并不是回到“歌颂文化”，反倒是带有高度个人化与批判性，他钦慕鲁迅的桀敖不驯，乃是出于他自己对“独立个性”的坚持。不过他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立场，却并未让他融入“歌颂式”的主旋律艺术体制之中。这让他显得十分孤立，因为“民族化”与“大众化”这两条艺术准则，虽然是当年左翼文化的金科玉律，最后却不幸沦为了“宣传文化”，而吴冠中却要以艺术界的“鲁迅”自居，要以“横站”的态度去坚持这一被扭曲多年的艺术立场。颇为吊诡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开展这么多年后，吴冠中这个略显古旧的艺术立场，却在“官本位”与“商业化”的艺术生产体制双管合流之下，因为他的独立性，反倒折射出激烈的批判意味。

他在90年代以来，对整个艺术生产体制不断地进行讨伐与抨击，认为要解散美协与画院，这些机构有如“妓院”，已经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奴隶。这些辛辣语言不禁也让艺术圈外的公众为之一震，赢得一片赞同之声。

仔细想来，吴冠中个人对艺术的看法，无非是心灵上自由发展，绘画上贴近生活，表达真实情感等等，无需多作置喙；在主题上，他受到当年的时代精神所影响，以民族文化与大众生活作为其艺术表达的核心主题，但是却一路看到这样的艺术理想逐渐沉沦、歪曲和变形，因此作为画家的他，只能在公众舆论中不断发声，以“横站”的态度去主动挑战官僚化的文化生产体制，成为了艺术界少有的“异议分子”。

如此看来，吴冠中先生今日所争，并不是艺术理念之分，而是在于“艺术”与“非艺术”之区别，艺术官僚体制将艺术视为“权力敬奉”的祭品，艺术商人将艺术看作是“利润增殖”的商品，这两种逻辑显然都让吴冠中感到气愤与不平，但是其实他自己或许也已清楚了解，这些问题已远非艺术本身所能解决。

吴冠中先生曾说：“我负丹青，丹青负我！”今天看来，前句姑且视为自谦之词，而后一句，恐怕才是他告别人世前最大的遗憾吧。

INTERVIEW 访谈

知识分子要对这个社会的犬儒负责任——余世存访谈

特约撰稿人 灵子 （北京， liufang0815@gmail.com）

余世存讲话的时候，不喜欢直视听者的眼睛。仿佛陷入玄空世界里，一面讲，一面沉思。一个问题大致讲完，才抬起头望望你，目光里还有独处时的冷峻。

他常常用的一句评价是“太糟糕了”。在他口中，当代知识分子的犬儒风气太糟糕了，当代民众缺乏独立思考的从众意识太糟糕了，如此民众又把所有对生活权利的幻想寄托在如此知识分子身上，实在就更糟糕了。

他反反复复强调知识分子们应该耐住性子做几年冷板凳，只要肯下笨功夫，一两年内必有小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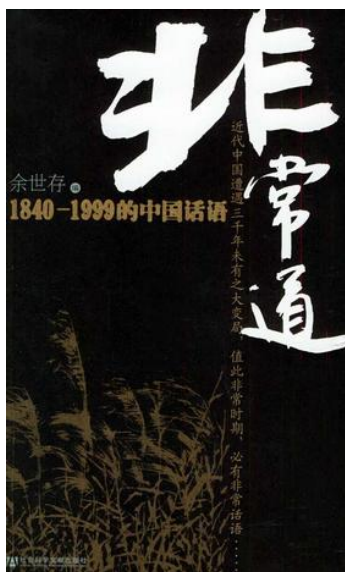
这大抵在他前几年避世的生活中得到了印证。因为受不了首都文化圈频繁的觥筹交错，他去四季如春的大理买了个小院，静心读诸子百家。期间他写了一本《老子传》，“我觉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了。”

可惜大理很快卷入商业浪潮，当发现那里也开始每日都有饭局时，余世存回到北京。只是，他已做好重选地方再离开的准备，甚至习惯见人就问问对方的家乡，问问那儿气候怎么样。“我还是喜欢能种种花养养菜的生活，哪怕在北京郊区也可以。唯一的条件是气候要好，且不能太潮湿，不然那么多书受不了。”

去大理之前，他曾向许多年轻朋友建议静心读书，回来后发现几乎无人耐得住寂寞。倒是三月份他去看望前中宣部部长

朱厚泽先生时，重病中的老人叮嘱他：“你不要再来了，赶紧做自己的事，读书，好好想问题。”

我们是灵台无计逃神矢



出生于 1969 年湖北随州的余世存一度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这多半源于他经过对中国社会转型历史的梳理，归纳出独到的“类人孩”理论。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完成现代化的民族，它的文明单位和个体都处于一种“类人孩”状态，在参与历史的时候，会像孩子一样不够理性成熟，不够负责任。“我们到了现代社会，但更需要告别人的童年，更需要走进成年社会去。”

新世纪之后，有前辈向他提出：为什么只写思想界圈子内流通的文章，而不写一些社会大众都能领会的作品？他诚心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迅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重述历史。

2005 年，他的《非常道：1840-1999 的中国话语》，以《世说新语》的体例梳理近现代中国的精彩言论，一举成为畅销书并长销书。他称这是为捍卫自己心中的历史正义，“即叙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能对今天起作用。”

两年后，延续前一本书思路，他又出版《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着重“常言”二字。今年新书《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国人的命运与抗争》面世，“希望把历史人物的精气神尽量还原一下，让现代人有所借鉴。”

“一个中国一流的男人在衰世里不得用世报国，只能将一生的光阴耗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之中。”在《中国男》中，余世存对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发出感慨。

单单摘出其中一句话解读为作者自况，似乎并不妥当。然而龚自珍确是余世存最心仪的人物之一，这篇《衰人第一龚自珍》也作为全书开篇，给其后四十个各怀性情的中国男人形象做出标榜。

“我们并不是怀才不遇，而是灵台无计逃神矢。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两件事，我们的事也就是如此，用主流的词汇，叫守夜人、守望者。我们并不怨天尤人。”余世存曾这样说，恰可与上句感慨互相佐证。

他这辈子做的“一两件事”，除去在历史方面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另一件是自 2001 年开始，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十年里，获奖者从李慎之、北岛、高尔泰到中文推友，无不彰显着为汉语世界所贡献出的独立思考和力量。

在 2010 年汉语贡献奖报告《时空之美》中，余世存写道：“今天我们有自由主义而无自由，我们有私人主义而无个人……这种个人化的社会如何建立？取决于我们社会个体的自觉，即有自己的身心时空意识，并为周围、亲友、社会确定并扩大时空。这种自觉是一种人生之美的事业，这种事业卑之无甚高论。但如老子感叹的，易行易知，只是人们很少走这条路罢了。”

中国的浮躁期未免太长了

问：我们从费孝通谈起吧。今年是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你曾在去世时写过文章，从今天的社会状况再看，你觉得最应该继承的是费孝通的什么精神？

余世存：现在说费孝通，首先应该看他自己的言行。比如他说《乡土中国》能管五十年，当年说得很牛气，现在也证明是有道理的。他虽然后来是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学者，但实际上个性非常强。我觉得这个要突出。

我本来很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十几年应该能用个性主义来消解集体意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十几年一直在压抑人的个性，几代人的生活、工作和消费都是非理性的，完全被社会无意识牵着鼻子走了。在人文社科领域再没有出现像费孝通这样有个性或者说有个人观念的学者，这是很可惜的。

另一点，晚年他跟朱学勤的对话里曾经提到，他对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评价不是很高。他是过来人，我们应该重视他的这种观念。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对民国知识分子抱有一种想当然的理解，过于美化他们，这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像费孝通这样过来人的话。

年轻人可能对中国的文化界，包括当代的知识分子，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不对的。比如摩罗出一本书，很多人就大失所望，其实你就过好你的生活，没必要说你的生活是依赖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来帮你争取。以前大家对余杰、摩罗寄予厚望，后来他们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大家又都去关注韩寒，好像举国上下都只剩一个韩寒，那对于韩寒的要求也太高了，也很不公平。

再一个，费孝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还是比较平和的心态。这点特别值得大家重视。知识分子包括一般社会人太容易一惊一乍了，道听途说一点《黄帝内经》或者《论语》的东西就觉得很了不起。现在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这两代人哄抬起一个这么巨大的养生健身产业就很不对，你们还都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这么非理性呢？

问：你之前文章里还提到他晚年时以“志在富民”的想法来规范早年的抱负。

余世存：对，这个也应该提。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太强不好，我最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很多知识分子以为他可以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去寻找一条独特的道路，用这个借口说我跟大家是不一样的，所以逃脱很多正常社会应有的责任和权利。比如说，北大的老师们自己的房子被房地产商搞得一塌糊涂，他们不去维权，反而说我在帮民众做事。历史上但凡走一条超越普通人并且教训普通人的道路，最后都证明是失败的，无论是中国的墨家学派还是西方的圣方济会运动、托尔斯泰运动都是如此。

我觉得还是该尊重人类那些基本的东西。费孝通在早年的社会调查中对这些有所体会，所以后来并没有好高骛远夸夸其谈，而是在做一些实事。普通人可能还是要追求日常生活中物质上的满足，那你就设身处地从这个角度帮人家就行了，没必要指责他们素质太低、给他们自由他们就乱了等等。

问：很多知识分子会感慨，自己在写作中纵横捭阖，但面对现实常常有一种无力感。

余世存：这是最糟糕的，这说明思维存在问题，你的实际生活没能解决，就是你问得不彻底。大部分人，包括我身边的许多朋友，在文章里说得大义凛然，但是自己的生活其实很苍白。比如说那么多人去骂辛亥革命、骂戊戌变法，认为他们太激进，实际上这些人自己在生活中连改良和改革的路都没有找到，怎么有理由去指责历史上这么大的变革？很多人不问自己知识和思考的正当性，你在夸夸而谈的时候，你的立足点究竟在哪儿？

问：这个很像现在国内许多作家、电影导演，他们会关注底层的边缘群体，但是几乎没有人能真正面向自己所在的阶层，剖析城市生活，这方面一直没有好作品出来。

余世存：对啊，你看二战以来西方的学院、知识分子做了多少工作？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历史，从多个角度对二战以来加速启动的新一轮现代化浪潮中裹挟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尔库塞的西马，都对现代性对人的异化做了他们的考察和分析，这都是对他们的同胞提供了很好的正当性的知识服务。而我们在这点就有所缺失。

问：这种缺失的原因在哪里？

余世存：浮躁。九十年代初，杨念群、汪丁丁一直致力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走出来的，又仿效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学者之间没有达成规范或者伦理共识。说实话，很多人完全是胡言乱语。学人文的对任何问题都敢信口开河，缺乏基本的思维训练和规范。他们完全把自己的知识、文章变成了一种消费商品，跟社会的市民阶层一样，生产和消费的产品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来越浮躁。

问：这也许是必然经历的过程？



余世存：当然西方也经历一个浮躁的过程，但我们的这个过程未免太长了。用费孝通对知识分子的失望的话来讲，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交的答卷一再都是不及格的。现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寻求答案，需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救助，你提供不了，所以弱势群体只好去自杀、只好去杀孩子，只好暴民横行。这说明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一代人像是学术上的“暴发户”

问：刚才提到，你本来预计这十几年里个人意识消解集体意识，但实际正相反。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余世存：我的三段论推理是，中国每十年都有十年的任务，八十年代是用人道主义消解集权主义，九十年代是自由主义对抗专制主义，新的十年是个人主义消解集体无意识。基本上前两个是成立的，所以我在前两个的基础上推出了第三个，但没想到推错了。

原因还是跟中国这次大规模的都市化有关系——当然，也不能老怪社会，还是要怪八九这代人不够争气。本来这一代应该要出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但是很可惜，他们也融进了这个社会。右派在自由主义的学理跟中国社会的结合方面也做的非常不好，他把西方类似于后现代这一派自由主义的最新阐述直接拿过来了，这不好，应该在九十年代以来更多宣扬英美 17、18 世纪自由主义的理念，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进程跟中国的发展更契合。结果他们直接应用了罗尔斯、伯林这些人的理论，一下子把这个社会搞得非常犬儒。知识分子对此是要负责任的。包括匆忙宣布要“告别革命”，把人民群众的自然正义给剥夺了，非常糟糕。我认为李慎之走后，知识界就缺少具有道义形象的精神领袖，因为这些人自动放弃了天然的权利和自然正义。那么 OK，大家都犬儒吧。

问：但怎么会一代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余世存：这一代人，具体来讲，应该就是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包括甘阳这一批，无论新左还是自由派。我后来想这个原因在于他们在学术的继承上感觉也像一个暴发户。他们跟胡适那代人不同，那代人学养丰富，无论西方背景还是国学背景都很强大，所以不会那么浮躁。当代人继承的财富是不够的，之前还是知青，一直不在学术训练当中。跟篱笆打交道这么多年，还没洗好脚就上岸了，就进入到学院、书斋，他们太新奇了。新奇就容易不断换偶像，每年都会引进一个大师，一会儿萨特，一会儿哈贝马斯，一会儿福柯，这导致他们当中很难有真正的思想大家或学问大家。

当然，可能还是这个民族注定要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包括我最近也在反思，为什么十年前我会这么乐观的预言，其实我那时候这么想就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在这么多年来确实还是难以用个性对抗一个国家国力转型的大背景。中国经历了 150 多年来下陷的过程，现在终于在往上爬坡，任何一个个人的力量都不足以与这个文明共同体向上的力量抗衡。所以，开句玩笑，中国根本不需要有人去获诺贝尔奖，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十三亿人的生活需要为主，这种生活需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

问：所以你认为这代人的缺失归咎于文革这个外部环境？不过换个角度说，大苦难有时也可以历练出伟大的知识分子，历练出配得起这些苦难的人。



余世存：对啊，你看罗马尼亚跑到德国去的女作家赫塔·穆勒，也就是五十多岁，写的东西确实好。她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方式，能够给世界提供一套完整的自己国家的生活图景。中国知识分子就做不到，包括我看过很多知青的回忆录，看得特别难受。他们吃了那么多苦，但是他们笔下的叙述方式太……他们精神完全退化了，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把这段历史介绍给现代人。这是一个高要求，低要求是起码把这段历史平实、完整地写出来，也没有，有的还是停留在学生作文阶段。其实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贴近历史就可以了，不要更多反思。我们很多人还还原得不够，他们是选择性失忆。这一点上高尔泰太了不起了，以散文的方式就可以写的这么到位。

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无论市民阶层还是知识分子阶层，都有点聪明过度了。我经常劝周围的年轻人，应该笨一点。别总是搞得那么聪明，装作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思维，只要你一思考什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其实只要坐得住冷板凳，把中国四大经典任何一个经典里选定一项，研究个三五年，研究成果公布后肯定是很好的长销书。

能够给这个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人太少

问：你一直对这类中国传统典籍感兴趣？尤其最近还写了《老子传》，为什么对易道文化感兴趣？

余世存：我觉得对这个社会起作用的不光是西方的数理逻辑、因果逻辑，还有东方的所谓神秘主义。比如说你按照金融学的规律，中国的股市早就崩盘好几次了，要是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中国政府早在多少年前就会破产了，可现在它越来越富了。所以这个规律不起作用，这个社会太大太复杂，有它预定的和谐，很多人没找到这种东西。其实最近几年我试图剥离整理的就是中国的易道思维，它没法用形式逻辑推出来，但它是管用的。

我一直觉得要重建中国知识规范的话，确实不能完全让西方的知识系统在中国起支配作用，就像佛教的因明逻辑也取代不了中国的易道思维。也许未来社会里这些东西都应该并行而不悖。中国人还在中西思维争论里面，比如中医和西医争论，这么多年都还在这个思维里面，这是很可笑的，大家都太情绪化。

问：所以你要写《老子传》？

余世存：这其实是我读书的副产品，去年看到德国作家黑塞居然写了释迦摩尼的传记，而且写得那么飘，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写中国的这类东西。

用费孝通的话说，我觉得《老子传》至少能管二十年，二十年内没人能超越。我希望能让人朴素平实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理解春秋时代，不要把孔孟老庄这些人看得多么不可思议。中国知识分子搞启蒙这么多年，就没有告诉读书人和民众，中国自己的圣贤真实的生存状态和思维状态是怎样的，总是把他们看得高深莫测。到现在为止，中国先秦诸子，没有一本像样的人本主义的传记，要么都是骗小孩的民间传说，老子的赶山鞭啊，在母亲怀里八十年啊之类；要么就是思想评传，从道德经论语里面分析他们有什么思想，是唯心还是唯物，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贵族……完全不能还原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问：这个似乎就是中国讲史的传统，永远从宏大的角度叙述，看总体成就，不看个人命运，不单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习惯。

余世存：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你首先要想自己是一个公民，做知识普及的时候，还是要有公心。你不能觉得自己只是属于小圈子里面的，比如论语研究的小圈子，他们注了一遍论语，那我用自己的方式去注一遍。这样弄得读者一进书店就晕头转向，钱穆的，杨伯峻的，李泽厚的，李零的，于丹的，南怀瑾的……知识分子启蒙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四分五裂的状况，且每年新注论语之类还是成千上万。相比之下，西方人在公元 397 年就开了迦太基会议，一帮人商量定好新约圣经正典内容，其他都宣布为伪经。以后圣经就成为权威的版本，也是信徒们知识的来源。

问：你怎么看知识分子在历史传承和梳理方面的责任？

余世存：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当下生活总是需要你对自己的过去有把握。中国人几乎每隔十年会有一次历史热，八十年代有一次，九十年代黄仁宇、陈寅恪、唐德刚他们被引进来，新的十年又有一次，这是人类生活的必然。如果说十年看做一代的话，每代人在自己成长过程中需要寻找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生活坐标，他从哪儿来，他与来处人的比较。

这点西方人做的比较好，比如兰德公司、柯林斯出版公司，几乎每隔若干年就会找自己的编辑、作家，重新编辑一战史、二战史，因为学术界总有最新成果，有新的材料发现，把这些东西揉进去，读者也会更新一遍，这就是知识的更新过程。不是说房龙写了《人类的故事》之后你就不用写了，还有这几十年人类生活的变迁呢？总是需要当代人再讲一遍。

问：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你觉得谁做到了这个使命？

余世存：我觉得吴思的工作、我的工作都算是学术通俗化的一部分，我们提供的不是学术产品，而是公共知识产品。但非常可惜，能够给这个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人太少。

问：学术通俗化的标准在哪里？有些作品未免通俗过头了。

余世存：还是应该有自己立得住的史观，不能媚俗，不能以太玩笑的态度。我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东西，包括海外华人写的历史。他们的问题是太计较自己的发现，比如他们发现一点新材料，就认定孙中山就是个黑社会老大，一下子完全失去了历史感。你发现的这个材料有什么意义呢，即使你愿意以此告诉你的同胞孙中山确实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但同时也有很多材料显示孙中山伟大的一面嘛。

问：研究者从个人角度的解读也无可厚非吧，似乎说不上是非对错。

余世存：是，但这类东西很难说是公共知识产品，只能说提供了一条材料。公共知识产品必须要你自己的思考，要是理性的、逻辑一贯的、有一个大致的框架在的。不能说自己还活不明白，就想要告诉别人历史是怎么回事。当然这个也没问题，因为用老毛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看得多了，自然会比较，哪些人还是不够。

社会也需要当年明月这一类作品，但他只是做了第一步，培养了大家读史的趣味，之后要看有没有人继续做，有没有让大家更解渴的东西出现。这样才能大浪淘沙，不断往前推进。

问：当代人对于历史认知存在许多你所说的“想当然”。

余世存：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记得凤凰台的一个编辑很惊讶地跟我说，余老师，我去图书馆查资料，没想到武昌起义的时候报纸上的报道只是一小块啊。我说那你怎么想呢，你还以为整版呢？

这种幻想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落实一个人、一种知识传授，你要尽量清理你的想当然。普通人为什么没有根底，社会的风潮一吹就跟着转起来？也是对生活想当然了。这么多学者做学问，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谈论有时候还是站在这种幻想的立场上，我觉得很可笑。比如一个研究历史一辈子的老人，到美国去看蒋介石日记看了那么多年，回来告诉你的国民蒋介石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既有大功也有大过。你还在说这种话有什么意义啊？你就不能跟你的国民说，一个大国的领袖，这么多年坚持写日记，还写得清清楚楚，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吗？我们常常对历史和现实都失去了洞察，完全沉浸在虚幻的生存当中。要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一看就很能理解项羽的叹息，好像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兄弟一样。如果不能还原这个，你就是对自己和读者不负责任。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在这个时代都活得很虚幻。

问：每个人都在活自己的，跟之前之后都没什么联系。

余世存：对对对。我推荐一本书，顾则徐《朱德别传》，那是我认为历史学家写史写的比较好的。这是真正洞察了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党派之间，人与机构之间如何打交道。你怎么能想象一个二三十岁的人都在带兵打仗的中共领袖的状态和心理？国人现在都理解不了，好像他们就是历史人物，是比我们高一头的伟人。你的话语框架和理解至少要符合人性的常识，包括对现代社会政府政策的分析也是如此。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当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还是分析不出来究竟这个政策是哪些人做出来的，这样弄得国民都很茫然，还以为这是政府着眼于全局制定的好政策，这是很可笑的，西方社会已经很明确，任何政策后面都是利益的推动，农产品的政策、油价上涨的政策，究竟是哪几波利益集团在推动，为什么白领阶层、有车阶层就进入不了决策圈？

问：这是专家们搞不清楚，还是不允许搞清楚？

余世存：搞得清楚，是他们不愿意下功夫。我经常说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写文章，就像是学生做作业，如果连六十分都做不到的话，实在对不住读者。别说老百姓看不明白，就是中南海的人分析这些文章也都毫无价值。非典的时候，王岐山临危受命，也想问问你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招数。结果后来找到的几个人说我们没招，还是你们弄吧，那人家就觉得，你们整天还嚷嚷什么啊。所以他只好采取传统的运动式的办法，封城、严格出入、隔离，没有现代管理的经验。这些事情其实很多，很有意思。

“汉语贡献奖”也许能选的人越来越少

问：另一个话题，这些年你一直致力于汉语贡献奖的组织，也多次提到当代汉语力量丧失的状况，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世存：其实这个我想的还不够多，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素养还是不足。这个说到底语言的极致，用西方存在主义的话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你自己的家你装修的怎么样，都是跟你的精神个性相关的。当代汉语大同小异，受制于官方语言影响太重，跟中国人的生命力量的疲软、犬儒相关，失去了语言的原创力。

毛时代和邓时代，意识形态色彩很强，但总有一个目标摆在那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知道我跟这个目标的距离应该是怎样的张力，会不会被它吸附，然后选择自己的方式。现在官方语言自己也面目可憎，非常乏味，大家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没有参照了。

问：汉语贡献奖已经做了十年，会一直做下去？

余世存：是。但现在很希望交给年轻的朋友，自己做了十年，不能把我的色彩搞得太重了。而且每年做得太累，每次一个获奖论文，十年光这个就有二三十万字，而且都是义务的。

问：十年下来感觉有什么变化？

余世存：基本是一以贯之，只是现在更规范了，更清楚自己对当代汉语的质地、内容形式的把握，包括对得主的把握。我还是希望得奖人能有自己的核心观念，不能说研究一辈子的学问，你的观点一谈还是自由民主宪政、平等，这不是你的观念，这是人类知识共通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归纳，有你个性的语言。即使你代表左翼政治，或者宪政政治，但你的著书立说是否给这个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含义？比如潘恩的《常识》在谈正义，罗尔斯的《正义论》又丰富了它的含义，我们再谈自由主义的时候能不能也去丰富它？

问：但目前看来获奖者还是以偏右的为主？

余世存：因为有几个综合标准嘛，其中之一是必须边缘。比如一直有人提秦晖，但秦晖毕竟还是在体制内，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问题，也许秦老师退休之后思想会更自由一点，言辞会更有思想冲击力，到时也许会得这个奖，但目前一时还没法给他。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自觉。左翼的很多学人这一点还是太浮，当然这两年又有了新的变化，比如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新左翼，钱理群、艾未未这些人，他们的作为都符合他们的追求，现在就是看知识产品方面能否做到一定水准，假如能做到当然也可以获奖。

问：评选会有困难吗？比如会不会某一年觉得没有合适的人选？

余世存：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过确实做这么一件事也不是很容易，当初都没想到自己能做十年。那时就是觉得很好玩，自己三十岁左右，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游戏心态，结果越做越认真，越做越严肃。而且说实话，可能会越来越难，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努力不够，也许能选的人越来越少。当然，矮子里拔将军还是有的，哈哈。（完）

香港独立出版，挣扎之下的理想主义——袁兆昌访谈

特约撰稿人 严飞 （美国·旧金山，fei.yan@green.oxon.org）

袁兆昌，香港“点出版公司”创始人，为香港上一代文化人洛枫、汤祯兆、叶辉策划出品了“文化行者系列”，同时兼为香港《字花》杂志的编辑，立志于推动本土写作文化，是香港热爱出版事业的独立出版人的代表。个人代表著作：《超凡学生》、《弓在马桶上的忆述者》、《结帐》、《出没男孩》、《大近视——袁兆昌的文化蒙太奇》。

“我们这城市，会不会也铺设起一条满是图书的大街呢？如果把图书砌在地面上，那么，大街上每天都有书展了。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就会有更多可以散步的地方了吧。”

——西西，《我城》，p.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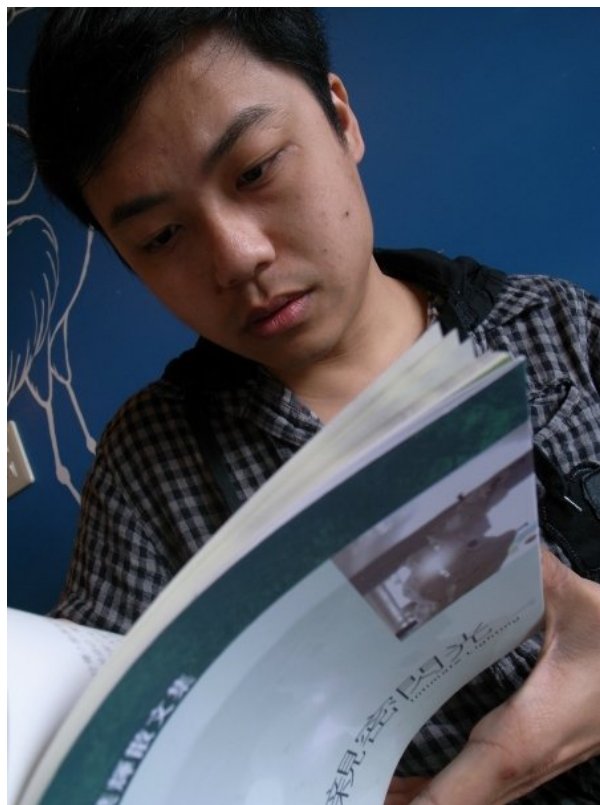
香港独立出版之路

严飞：在香港做出版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想到做出版？

袁兆昌：我想我跟很多同年龄人最大的分别是，他们都有自己固定的职业和成长轨迹。比如说本土年轻一代的作家谢晓红、韩丽珠，她们一直从事着写作，顺利地进入了大学学习，大学毕业之后也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在文学事业上的地位。当传媒去跟她们做访谈的时候，知道她们是香港女作家，明白她们的价值所在。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比较复杂，在年纪小的时候有很多落败的挫折，走了不少弯路后才进入大学学习。上大学之前创作了《超凡学生》。这部作品于我而言，是为我投入文学创作的种籽；它的意义，不止于读者反应或销情，而且是个人志向的重新确定，追寻普世价值的路标，探问年轻人于教育制度里出路如何，摸索社会明细于个人成长的影响力，等等等等。

但是当我跨过 30 岁的时候，我感觉我遭遇到了一个瓶颈，很难在写作上再有突破，像韩丽珠那样走下去，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书写的方向可以到哪里。自己一旦有了这种自觉后，就想着重新回归读者的身份，但是又不止于读者。我想到我可以做出版，去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作者、有兴趣的题材、有兴趣的旧作，重新包装、复刻再版。我可以以出版为自己的事业，做一些可以影响下一代的事情。



严：于是您就在 2008 年 4 月 23 日“世界阅读日”那天，成立了点出版有限公司，旗下又创立了文化工坊，专推本土文化人的知性散文、文化评论、诗集书评，具有浓郁的本土人文气息。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计算的地区，按照陈冠中的话说，香港社会的普遍心态，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到头来，大学教书的迷股票，媒体做报纸的搞网络，政府当官的帮忙催谷楼市，却唯独缺少了沉得下

心来的读书人。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为什么会想到以主打人文书籍为出版方向？

袁：诚如你所言，确实香港人普遍有一种“搵快钱”的即食心态，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所以充斥着香港图书市场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工具书、教辅书、财经方面的书籍。而出版这些图书的出版社，无论是在书的选题、内容、排版、样式还是装帧、设计、插图，乃至书的型貌上，最先需要考虑和算计的就是市场。我的理解是，所有可以计算这个市场的出版社，都不会是像我们这种类型的，更加强调内容质量、设计理念及本土特色。所以当初我们出版“文化行者系列”，跟叶辉先生出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想要做到跟香港别的出版社不同，而别的出版社已经经过了市场的检验，有一套成熟的出版模式。以叶辉的《书到用时》这本书为例，我们采用了口袋书的小巧装帧设计，宣传“掌可握”的阅读模式，并且为了进一步迎合香港年轻人的口味，还专门请来了 90 后新生一代的插画师在每篇文章的正文前配上桃红色的人物插画。我觉得这本书的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好处就在于书的重量、它的纸张、它的排列、它的设计跟我们所追求的标准比较接近，跟我们一般香港出版的书都很不同。我们是要追求这样一种书，我们尝试着跟这个市场去打官司，尝试重新演绎文化书籍的出版模式，更新大众对文化知识的印象，并且让大众能在掌心里吸收知识，结果呢，结果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严：市场反响非常好？是否产生了一些新的效应和回响？

袁：我希望有这个效应，但是实际运作下来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原本冀望采取口袋书这种出版形式，有很多喜欢流行文学的青年人会愿意买我们的书。因为我们觉得，手心才是盛载知识的良好容器。这样就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多读书，多读有意义的书，毕竟香港是个读书成本远远大于不读书收益的城市，但是在市场、在读者方面来看，似乎缺少足够的回应，最热烈的回应就是你曾经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带有批评性质的书评了。从市场的反响来看，我们发现读者也还是同一群人，读者的数量并没有大范围的增加，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喜欢叶辉的读者，他们依旧是购买此书的主力。我想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严：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原因，我更加喜欢像你们新近出版的叶辉新书《卧底主义》这种较为传统的印张和设计模式，以文字为主，简约质感。另外我发现，口袋书刚出版的时候，由于宣传的上档效应，新书会被摆放在书店较为显眼的位置，容易被读者注意。但是从长久来看，这种策略并不可取，比如说一年以后这些口袋书就不太容易能够在书店里找到，它们小巧的特点反而很容易促使他们被淹没在一堆书籍当中，寻不到踪迹了。

至于说到市场的回应，我觉得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座不读书的城市，这里太喧闹、太商业、太吵杂、太物欲横流，对于人文阅读自然更加淡漠了。您对出版事业很有热情，付出了很多，但是您做出来的东西，却得到的回应很少，会不会觉得有些悲凉？

袁：可以说对于这种没有回应的情况，我早已经习惯了。这个悲哀在于，当你很受欢迎的时候，或者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时候，会引起一些热烈的讨论，媒体和大众都会赞赏你的勇气，给予掌声。但是到你无力支撑，不得不关闭一家书店、关闭一家出版社的时候，媒体虽然也会留意，但是只是在报纸杂志上一个很小的角落里的只言片语，无法发表出一种有深刻意义的回应。

严：为什么香港的媒体不能够发表一些非常有深度的回应？

袁：我想有一部分是报纸空间的问题，有一部分是读者需要的问题。香港的读者都很忙碌，一般看报纸的时候更加关心一个故事的桥段，而非一大段对于某种社会问题的剖析。在内地、在台湾的普遍现象也是这样：读者们关心的只是一个故事，



而不是一些价值上需要做出判断的评论。毕竟，一家小书店或者一家独立出版社的关门结业，在香港实在是太过于司空见惯，以至于大众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媒体去书写评论的事件。

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媒体缺乏足够的文化承担，因为在香港报业看来，文化承担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无法在市场中赢得生存。在市场、体制和读者认同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化承担只好一层层递减，最后变成了零，甚至负数。

袁：是这样的。

保留和传承香港性

严：有一种说法认为 1989 后和 90 年代出生的这一批香港人所成长的环境，正处于一个“香港性”正在消亡的大时代，香港身份是否就会如李照兴所言，在 2046 年前慢慢消磨殆尽了？

袁：香港性会消失吗？我觉得不会。这个也是我之所以选择独立出版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希望通过出版去选择一些我喜欢的作家，出版他们的著作或者复刻再印他们的经典作品。我想去用出版这个行动去保留这些价值、去保留香港性，然后传播给大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购买我们出版社的书，多少人只是在书店里打书钉，吹免费的冷气，但是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这些读者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用心。我有一点野心，就是在香港的出版界建立起我们的地位。这个地位具体是指制作方

面的品质——我们不要香港的书是一翻就烂的那种，或者是一翻就很光亮伤害眼睛的那种，我不想出这种书。我有一种执着，这个执着就是追求专业。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在制作方面出一种合乎人性的、合乎人情味的读物。我们会采用优质的纸张，体贴眼睛、保护视力；我们也会采用非常专



业的编辑，通过出版传递我们的价值和理念。我的感觉是现在越来越多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太过于受网络的影响，会全盘接受网络上的资讯，而越来越少去想精神和价值这些问题。而在我办出版的过程中，我会主动跟年轻一代的香港人进行接触，告诉他们这位作者是我们喜欢的作者，他的作品是值得我们阅读和思考的。对于新一代的香港人，我想他们可以建立一些精神模仿的对象。

严：精神模仿的对象有哪些呢？

袁：以前我们有很多，但是现在呢，香港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没有一个精神依归。我们不能怪他们缺

乏这方面的认识，只有怪我们的社会是落后的。我们远离了我们精神学习的对象，他们被建构成为了历史，而我们生活的现在，却被我们人为的与这些历史割裂了开来。精神对象只属于过去，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学习，但是文字是文字，不是精神，这种断裂的关系是新一代必须要面对的状况。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偏向悲哀的。这个悲哀不是说我们没有知识，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香港性已经越来越少有人去体现，越来越少有人去书写，也越来越少有人去从阅读中发现香港性。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环境、空气在恶化，服务业在倒退、本土空间一再萎缩、政府管制越发失去独立性，人和人之间同舟共济、包容互谅的温情也在潜移默化中不复存在。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这一代人不能不去改变它，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和热爱的城市，这是西西笔下所描绘的“我城”。

严：像您前面所讲的，出版是您的兴趣所在，另外一方面您也刚刚强调了您试图通过出版保留和传扬香港性的理念。我很好奇，您会不会觉得做出版是一种文化上的责任，觉得自己不做就不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袁：在我来说没有，不是说我不负责任，但是可以说这个责任不用我来负。文化是一种传承，但是这种传承不需要你去把它当成一种职业，这个不是你的职业。我觉得责任于我而言，是一种认真做事的动力。我想出版一本好书，并希望这本好书可以打动一些读者，影响一些读者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我愿意从事出版的动力所在。但是我的动力并不是我的责任所在，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关系，我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完、做好，甚至如果可以，也带动起一些同样热爱出版的朋友，但是这个目前来看似乎还只是想象。

严：说到传承，香港年轻人做独立出版似乎一直有一个传承性。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西西和一群喜爱文学的朋友所创办的素叶出版社，再到今天的进一步、点出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传承的？

袁：我想我最想做到的是在点出版的旗帜下开很多的子公司。开公司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叶辉先生的书，我就将它放在文化工坊；我喜欢西西的书，我将它放在点出版；如果喜欢旅游的书，我将它放在另一家公司。换句话说，每一家子公司都对应一个特定的出版领域，关注该领域的题材。一个形象的比喻，点出版是妈妈，文化工坊是儿子。我想点出版的目的是生产更多的“女儿”和“儿子”，以“点”带“面”，去发展他们的出版事业。

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认识的朋友在这些不同的公司发挥他们不同的能力，从他们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去影响更多的读者。如此，独立出版社就不再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一人出版社”的形态，比如说已经逝世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他当年就是在“一人主义”经营哲学之下办出版，凡事只能亲历亲为，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钉装、甚至一人搬运。相反，我所理想的形态更加类似于“同人出版社”，以朋友间的友谊与相同的志趣为纽带，同时通过开办很多子公司这种商业的手法去达到文化场上一种需要。虽然可能没到这一步，我们就倒了，但是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理想。

出版理想与现实困境的纠葛

严：在出版的过程中，您会依照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作家？您既选择了叶辉、汤祯兆这些非常有市场保证的当红文化人，譬如说叶辉，他在香港就有着“民间学者宗师”、“文化界北野武”之美誉，但同时也选择了一些默默无闻的青年人，甚至是中学生。这种反差是非常巨大的。说道您和中学生的接触，一方面是因为您的《超凡学生》系列深得他们的喜爱，另一方面是因为教授写作班，常常会接触到这一群体。这种多元的涉足是否也使您具备了在出版界不同的视角。

袁：我想我是一个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出版的出版人。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我喜欢一个作家，很希望和他建立一个出版合作的关系，向更多的人介绍他的作品，我想我的方向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不多，我在写作班授课的时候跟很多中学生建立起一些关系。在我看来，这些关系不是我是老师他是学生，而是我发现他有才华，我发现他们我们没有的想像力，他们我们没有的知识背景，他们的创造力也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爱绘画而不爱打字，但却也把书写当成一种美学，这种差异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的创作是可以到达一个发表的水平，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商量合作出版的计划。

我常想如果将他们放在出版的过程里，他们的角色是怎麼样的，我要分配他们的角色，有些人喜欢去绘画，有些人喜欢看书，我跟他们联系，跟他们沟通关于我们出版的一些情况，我甚至经常邀请他们作为我们的特邀编辑或者插图师。

严：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这批年轻人的作品虽然达到了发表的水平，却没有合适的媒体或者途径帮助他们发表，您的出版社或者您的一些想法使他们具有这样一些机会。

袁：我不觉得是我给他们一个机会，而是他们可以在一个平面去发挥自己的想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这层意义上说，我反倒觉得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实现自己的出版理想。出版一本书之前，我们并没有什么数据化的市场依据，也无法预测会有什么样的读者有兴趣看我们的作品。但我一直坚信，认真出版，就是好书，有好书，就有读者。我们只能一直去冲，一直向我们的理想去构思。

严：那您的理想是什么？

袁：理想就是出版一些自己喜欢的题材和作品，这就够了。

严：我想做出版大概是每一个爱书人毕生最大的理想，然而理想容易实现，实现之后又如何维继之，在香港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终极难题。你在创立和实际运作出版社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现实的压力或者阻力？

袁：困难一定会有，而且我相信很多和我们类似的独立出版社都会遇到。譬如说市场份额问题，第一线的集团式出版大概已经占据香港市场书籍流量的一半多，加上其它中型出版社的销售份额，独立出版所占有的比例就相当窄小。这里面有资金和相对应的宣传方法的先天不足。集团式经营出版的优势，不仅是在资金调动上少一点顾虑，还有对主流市场机制的熟悉与配合，于市场上有一定权力地位，对开拓媒体及零售通路早已驾轻就熟，书一出，马上相对应的发行、采购、零售等一整套系统化的配套流程就可以立即启动起来，独立出版社却做不到这一点，不仅难以打入大型连锁书店，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和各个二楼书店逐一沟通，洽谈如何分销。

与此同时，受众的普遍阅读口味与意向也会影响到图书的销量。不过，独立出版社在独立与自由运作的意义下，在内容质量及特色上，往往比大型出版社更见突出。我想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要没有倒闭的情况出现，就会一直去冲。

独立出版社与书店

严：具体说来，独立出版社与香港集团连锁书店以及二楼书店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袁：这个关系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而是一个地缘的关系。因为我们香港出版行业出了一个非常笨的问题，这个笨问题是指运书。书很重，谁来运？尤其是文学书、文化社科类书籍，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兴趣会帮你去运，因为这些书背后的潜台词是，它们只能堆放在书店里而鲜有人问津。既然难以售卖，那为什么又要花精力和人力去搬运呢？特别是运输到那些没有电梯的二楼书店。我们知道，由于租金的关系，现在香港的二楼书店其实已经很少有可以继续据守二楼的，通常都是四楼、五楼甚至更高的楼层。但是对于辛苦出版它们的独立出版社来说，他们会想像自己策划出版的书会被摆放在书店的哪里，是犄角旮旯，还是黄金位置，有哪些读者在读，最感兴趣翻阅的章节又是什么。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独立出版社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走进大书店。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家集团经营式的代理商，由他们负责采购、发行到各个大型书店进行门市陈列和零售，以扩大接触面。现在你可以在中环的商务三联书店里看到我们的书。因为这些书籍被代理商打入了大型书店的网络里，所以当二楼书店看见这个情况之后，也就会很有兴趣向这个代理商进行批发和采购，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却意味着众多的二楼书店也会出现我们的出版物。二楼书店也是一个商业的机构，他们也是看销量的，有读者、受欢迎的图书，二楼书店都会主动地引进。所以我们跟二楼书店的关系没有这么偏僻。

关于二楼书店的运作，可以说只有新闻署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可以在书店里面再僻出一块空间做成一间出版社的办公室。

我们香港的一大特色就是空间上的拥挤，而将一个空间分隔成两种用途，同时做两件事情，就会节省很多成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署是成功的。我也想做到这方面的尝试。我的一个理想就是再开办一家小书店，主营自己出版社的图书，并定期开办讲座、读书会一类的活动。这样一来不仅出版社的名气会得到提升，收入也会提高很多，而开支也会相应的下降。现在我们委托的这家代理商，有很多人说他们是吸血鬼，因为他们会收取大量的代理费。比如说假设一本书的价格是 90 港币，他们就会收取一半的中间费用，即 45 港币。而剩下的 45 港币，再剔除掉出版所分摊的成本，可以赚取的利润是相当微薄的。所以说这些代理商会赚很多的钱，而我们独立出版社不可能赚大钱。

严：但是你们又不得不和他们合作，这些代理商可以把你们的书摆放在大型连锁书店的显要位置。这样就会有比较好的曝光率，特别是对于很多媒体而言，他们会更加关注这些重点推荐的书籍。其结果，就会带来比较理想的销售份额。

袁：所以说维系和这些代理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会为了迎合市场，去出版那些淘金秘籍类指南书以附应整个躁动的大环境。我们想让读者和市场知道，我们这家新的出版社是勇敢的，我们有我们所坚持的。我们没有后悔不向市场去做妥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市场，只要读书人的理想和高雅。好像你看到的叶辉《卧底主义》这本书，我们就找来了韩丽珠做特约编辑，由她来全权处理整本书的格调和定位，以吸引读者的关注。

从香港比照内地

严：最近几年，内地出版业发展很快，与香港的交流互动也愈来愈频繁。因为您本身是做出版的，对于内地的出版界，您又有什么样的评价？



袁：其实我在 2005 年的时候在内地由作家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就是《超凡学生》的内地版本。这次经历让我觉得内地的出版社很有风度，很有包容心。当然他们也会因为压力的原因删改你作品的某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勇敢的，愿意去接触香港的作家，去主动了解香港这个地方。

我觉得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香港开始逐渐去影响内地，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很多内地的出版社，现在很看重香港的一些编辑理念、设计风格，于是就乐意花高价将香港的人才挖到内地，而这批香港人也顺带着将香港出版业最优质、最好的一部分带到了内地。上海的现代传媒现在红火的不得了，就是挖了很多香港人过去。另一方面，最近一两年梁文道、马家辉、林奕华等人的书在内地的销量非常好，有很大的读者群，这种出版上的成功也带动起内地出版社对香港文化的关注。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有点搞不清楚的是，到底是内地的资源、内地的人才、内地的人口条件促成现在这个状况，还是内地真的有这种能力去收集最好的人才、收集最好的读者，这个我搞不清楚。

严：那你没有想过像其他的文化人一样登录内地，北上发展。

袁：没有这个机会，是真的，未必有这个空间。因为逐一在内地拓展空间的，都是伴随着《号外》长大，在《号外》上发表作品的那一代人，是上一代的人，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严：但是你们这一代也会慢慢成为社会的中坚。

袁：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些关于思想方面的冲击。你可以说，1989 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我虽然懂得哭，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不知道背后那一大段的历史、它的原因、它的经历，所以在思想上对我们的冲击十分有限。现在当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有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时，我们看见中国的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世界的地

位也很不同了。所以 1989 年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种情感上的记忆，而非一种思想上的冲击。现实的环境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经历上一代人所经历的事情，也无法很深刻的去完全体会到这种冲击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严：但是作为一名有理想的出版人，肯定是想取得更大的成功，特别是当面对内地如此巨大的市场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将你们出版的作品打入内地书店，或者甚至和内地的出版社进行合作，共同挖掘新的作者、新的题材。

袁：确实，香港和内地出版界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在香港一本书如果可以售卖出一千、两千本，就已经属于畅销书了；在内地，像韩寒、郭敬明、饶雪漫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销售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本。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众阅读兴趣也在相应提升，人们也愿意去书店买书，因此比之香港，内地的市场是非常让我们羡慕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并不想将内地仅仅看成一个市场，单纯从财富的角度去算计潜在的收益。我最关心的是他们需要吗？他们需要这些书吗？如果内地需要，那我们就去做，因为两者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出版兴趣上的共识。譬如我们现在正在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商谈如何在内地引进我们的“文化行者系列”，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一套三本书——叶辉的《书到用时》、汤祯兆的《全身文化人》、洛枫的《请勿超越黄线：香港文学的年代印记》都将于今年在内地上市。当然，这只是一种推广模式，就是直接引进我们在香港业已出版、并取得好评的成熟作品，以拓展一个更为多元和丰富的香港文化到内地。因为这些书是引进版，所以版权上我们不会分的很多。譬如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我在内地出版《超凡学生》的时候，所赚取的版税是低于在香港写三篇文章的稿费的。但是由于印量众多，所以可以想象你的作品会有八千甚至上万的读者在阅读，这一点是香港无法做到的。至于共同合作，这肯定是我未来的理想和努力方向之一。

严：除了和内地的出版社合作之外，您也有意识、主动地去和内地的杂志社进行一些合作，比如说引进了《城客》这样的杂志。

袁：这是偶然发生的一个计划。我在内地待的时间不算太多，每次都是以自由行的身份去两三天后就回来。我有一次去广州探望我的朋友，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类似于香港二楼书店的楼上书店里，正好读到了《城客》的创刊号。我们出版人刚开始学出版的时候，总会装模作样地看看杂志的版权页，看看主编是谁，联络人是谁。然后我就找到了他们 CEO，跟他们说我们香港也想接触这种形式的杂志，正巧他们也需要去香港宣传。于是我们就取得了一个初步的版权。我们引进的规模虽然没有那么大，只有一百、两百本，并且最近他们也已经找到了一家大的代理公司。但是无所谓，我发现我对所有做的事情并不过于计较结果，也不计较是否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我知道我曾经做过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和更多的人分享我的喜欢，这就够了。

严：除了内地之外，是否有想过再拓展到其他地区，比如台湾？点出版今年就参加了台北 2010 国际书展，并取得了相当的好评，展示出了香港独立出版的力量。

袁：我们去追求出版事业，肯定不会仅仅只局限于一个地方，还需去面向国际，辐射周边。说道台湾，我感觉台湾的出版界很有活力，出版的书籍种类很丰富，翻译作品也很多，实际上他们的求知欲、求知的态度跟我们有很大分别。台湾人曾经经历过一段“报禁”、“书禁”的黑暗时期，阅读的自由被政府限制，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文革。对于这批人来说，生活里有过很大的缺失。这种缺失在今天反而反弹了起来，很多当时没有办法出版的读物，今天得以出版，并很受大众的欢迎。反观内地，文革受限，但是今天中国关于文革出版物依旧控制得很严，文革依旧是阅读的禁区。

香港没有这种缺失，什么书都可以出版，没有政府的限制。但是却无法在中国这个广阔的空间里诉说。由于政府的压力，香港的很多声音都无法完全的进入内地，或者进入的时候被扭曲和重写。所以对于我们做独立出版者而言，这是一种悲凉。我们明明知道做一件事情的价值所在，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自由的发挥。



另一方面，我最近跟很多台湾的出版人去交谈、交流，发现他们看我们香港的独立出版不是从专业的角度去看，而是从模仿他们这个方向去看。这点也是一种悲凉，因为明明不是嘛。譬如说我拿着《卧底主义》去台湾宣传的时候，台湾的出版人就告诉我说，觉得这本书真像他们台湾出版的书，真像他们的出版物。换句话说，我们的书在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所以我们虽然也想着辐射周边，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的环境，不得不促使我们更加看重香港的市场，因为这里是我们的起源地，所以我们首要要做好的，还是香港。

图 1、3 为袁兆昌

附录：

“独立阅读”

2007年07月—2010年6月编者按及目录

2007年7月 第1卷第1期

编者按

(无)

目录 (原无)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书评

羽良：社会理论的任务

2007年8月 第1卷第2期

编者按：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7月号问世之后，获得的鼓励超出编者的想象。在这里，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感谢，尤其感谢那些提出具体建议或者提出更高期待的朋友。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就不一一引述读者诸君的称赞了。

诸位的关注，使得编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本期在“推荐”、“阅读报告”和“书评”之外，增加“话题”、“来论”、“互动”和“来信”四个栏目。“话题”主要围绕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进行探讨，“来论”从读者来稿中选摘值得注意的章节，“互动”对“中国独立阅读报告”豆瓣小组讨论的一些议题进行整理，“来信”是读者和编者的沟通。

我们对本期阅读报告的不满之处有两点：第一，涉及的中文原创著作太少；第二，涉及的可读而又耐读的著作太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观察员虽然各尽所能，依然视野有限。我们向读者推荐书籍，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互相照亮对方。

目录 (原无)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书评

严 飞：香港故事的跨世代光谱

话题

莫之许：甘阳的观念游戏

来论

路 迪：清湛圆融的“礼乐风景”（节选）——读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

互动

大学图书馆应不应该对社会开放？

来信

2007 年 9 月 第 1 卷第 3 期

编者按：

诸位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八个字长得像绕口令一样，需要有特别的肺活量才能一口气说完，因此，从本期开始，标题缩减为“独立阅读”。由四位观察员撰写的“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将继续保留，作为“独立阅读”的一部分而存在。

这里需要重申的是，无论编者还是作者，都无意于也不可能垄断“独立”两个字。恰恰相反，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这两个字。陈寅恪先生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众所周知。这里，我们还想重读他的另一句没有成为名言的名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进而言之，我们亦可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优美之文字”，正是我们期待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当然，以上均属对未来的想像，“独立阅读”在近期所能做到的是从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做起，尝试建立一套独立的书评程序。

最后需要道歉的是，限于精力，译著未能如部分海外读者所愿一一标明原文，由此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专题

吴 强：抗争与民主：蒂利对法国、英国民主道路的解读

羽 良：“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书评

严 飞：中国打工妹：失语者的呼声

张昕：“竞争”与“稳定”的悖论

李冬君：关于《叶隐闻书》和武士道

刘 柠：《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成 庆：音乐就是自我殉道

话题

莫之许：最后的出版人

声色

汪 伟：安东尼奥尼在中国

2007 年 10 月 第 1 卷第 4 期

编者按：

贪玩之心，人皆有之，由于假期的缘故，这一期“独立阅读”耽搁了几天。有一些朋友发来信件，询问为何“失约”，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贪玩的错误，决定悔过自新，赶在假期即将结束之际送上这份微薄的假日礼物。

本期介绍的书，有不少与民国有关，也有一个专题围绕转型而设。近日央视正在黄金时间播放《复兴之路》，讲述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据说与《大国崛起》是姊妹篇。可惜从已经播放的部分来看，虽然也采访了史景迁等资深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叙述属于旧瓶装旧酒，远远不及几年前嘎然而止的《走向共和》。与影像相比，书籍或许是枯燥的。但在读书人看来，那些学术著作揭示的历史秘密，惊险曲折之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我们无意劝您远离影像，但是强烈建议诸位朋友用更多的时间亲近书籍。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专题：政治转型

吴 强：威权政权的前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延续？

张 昕：“赎买”的政治经济学

书评

严 飞：英国让香港怀念？

王晓渔：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

成 庆：卡萨尔斯：美是激情与道德

影像

汪 伟：金狮奖的题外话

2007 年 11 月 第 1 卷第 5 期

编者按：

有朋友来信关切地问及“独立阅读”的财政状况，这里可以向诸位汇报的是，“独立阅读”是零成本运作，所以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中止。感谢诸位作者，虽然并无稿酬，他们依然做出“无米之炊”。本期评论的图书除了来自中国大陆，还来自台湾、美国和日本等地，这是什么精神？借用大陆读者熟悉的语录，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还想特别感谢来自台北的 Dean 先生，他对“独立阅读”的文章提出非常专业的意见。这位朋友正是我们理想中的读者，“独立阅读”的读者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但我们最为在意的并非数字。如果“独立阅读”只有 10 位 Dean 这样的读者，我们依然会坚持下去。思想的交流，从来就不是用数字计算出来的。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沈展云：社科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书评

张 昕：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迷思

严 飞：巴黎，何以为巴黎

戴新伟：德国新生代文学：可以写诗的一代

马慧元：诗人霍尔

刘 柠：哈“不良”——时尚文化的原动力

成 庆：小提琴艺术的传薪人

译介

杰尔夫·戴尔：世纪播放列表

影像

汪 伟：阿富汗少女：Sharbat Gula

來論

Dean：吴强《威权政权的前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延续？》读后

2007 年 12 月 第 1 卷第 6 期

编者按：

迄今为止，“独立阅读”已经推出六期。我们做到了“阅读”，但“独立”与否要交由读者来判断。“独立阅读”所期待的不仅是独立书评，还有独立读者，后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书评的作者要是独立读者，书评的读者也要是独立读者。只有两方并进，书评才有可能拥有公信力。

本期译介《猜不透的迷——我们为何阅读？》提到“恰当的书在恰当的时间可以引发终身的阅读习惯”，马慧元小姐钩沉了百年前的《读书人》——这也让“独立阅读”感到并不寂寞，虽然它未必是“恰当的书”，也有可能很快被遗忘。张昕先生引述了“沉默中的囚徒”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话：“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在我们看来，这个“正常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拥有独立阅读习惯的国家。这会不会仅仅是个“乌托邦”？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愿意努力。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远 水：政治

王晓渔：文史

书评

张 昕：“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

严 飞：华西村的整合与分化

羽 良：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

马慧元：《读书人》拾屑——百年前的文学往事

沈展云：乌托邦死了！乌托邦万岁！

话题

成 庆：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

译介

莫托克·里奇：猜不透的迷——我们为何阅读？

影像

汪 伟：论摄影（二）

来信

言 一：“独立阅读”2007年 11月校勘

2008 年 1 月 第 2 卷第 1 期

编者按：

遥远的 2008 年就这样到来了，让人猝不及防。因为奥运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大跃进五十周年）等等，这是被赋予很多想象的一年，但想象能否变成现实，或者想象变成现实之后怎么办，这是我们无法预言的。

还有一些人永远见不到 2008 年，2007 年 12 月 5 日正午时分，余虹先生从 10 层高的楼上滑翔而下。崔卫平女士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太少了。”是的，这不仅发生在生者和逝者之间，也存在于生者和生者之间，不仅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也存在于朋友和朋友之间。如果朋友们能够通过互相阅读发现对方陌生的一面，如果陌生人能够通过互相阅读成为朋友，如果“独立阅读”能够促成“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如果这些不仅是如果，那有多么美好啊！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书评

张 昕：“资本的秘密”还是“资本的难题”？

刘 柠：“下流”，怎么了？

马慧元：纽约客八十年

费长房：又走了一个，唯一的一个

成 庆：大提琴是首青春的歌

译介

韩太云：中国龙+印度象=全球经济新霸权？

影像

汪 伟：论摄影（三）

2008 年 2 月 第 2 卷第 2 期

编者按：

这一期的“独立阅读”一如继往，但有三点小小的变化。第一，阅读的范围不仅限于文字，声音、影像也包括在内，所以“书评人”改称为“特约撰稿人”。文字、声音、影像是相通的，言一对音乐和电影的阅读展现了他在听觉、视觉以外的文字功力，马慧元笔下古典音乐的境遇仿佛诗歌。第二，呈现不同撰稿人的观点差异，对于当红的《未央歌》，两位观察员作了有保留的推荐，另外一位观察员则引用朋友的话把作者称作“西南联大的郭敬明”，终审的决定权由诸位朋友把握。第三，增加批评性阅读的篇幅，曾园的文章就是“典范”，可惜这种文章可遇而不可求。

都是自吹自擂，不多说了。春节即将来临，祝诸位过节不忘阅读、阅读不忘过节！

目录

独立阅读 2007 年度推荐

2007 年度推荐出版社

2007 年度推荐作者

2007 年度推荐图书

2007 年度推荐传媒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言 一：艺术

独立书评人

曾 园：书评及其它

曾 园：新版《洛丽塔》：一次翻译事故

曾 园：法云寺疑云

书评

严 飞：香港故事不易说

张 昕：意犹未尽的“不断再分配”

凌 越：昌耀：生活当然不朽

声音

马慧元：音乐笔记（一）

随笔

孙骁骥：阅读的快与慢：一家旧书店的三十九年

译介

卡林·罗马诺：“自大主义”的狂欢

凯南·马利克：《约翰·格雷的安魂弥撒》

2008 年 3 月 第 2 卷第 3 期

编者按：

“独立阅读”再次姗姗来迟，盼望诸位见谅。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容量在不断增加，1月是24页、2月是29页，3月是34页。我们特意找出第1卷第1期进行对比，本来以为怎么也有二、三十页，打开一看居然只有10页，单薄得难以置信，遥远得仿佛上个世纪。电子媒介的好处在于我们无须承担纸价上涨的压力，扩版的经济压力几乎为零，最多只是占用一点电脑空间。

但是“独立阅读”不是方便面，只要做到“加量不加价”就万事大吉。我们希望能够像香港青文书屋一样，成为网路上的精神绿地；但我们同时会认真弘扬“钉子户”精神，避免青文书屋的结局。再次向很多提供帮助的陌生朋友表示感谢，一位朋友专门发来信件愿无偿为“独立阅读”提供排版服务。

3月到了，“吹面不寒杨柳风”。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朱 白：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言 一：艺术

追念·罗志华

严 飞：是谁杀死了小书店老板

王晓渔：天堂应该是书店的样子

附 录：青文书屋出版书目

书介·赫伯特诗选

赫伯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书评

凌 越：寂寞者的观察

孙骁骥：印刷业已死？

声音

马慧元：音乐笔记（二）

影像

张 昕：古柯树叶背后的左翼政治

汪 伟：论摄影（四）

译介

彼得·伯克维茨：大学的使命

2008 年 4 月 第 2 卷第 4 期

编者按：

正值编发这期“独立阅读”的时候，惊闻在台湾颇受业内人士好评的《诚品好读》休刊。虽然我们未曾接触这份杂志，

但是此时，同行相“亲”，愿《诚品好读》早日复刊。由于“独立阅读”无力支付稿酬，这里刊发的文章不要求首发，如果您已经在其他媒体读过其中部分文章，请多多理解。

这里，需要向诸位读者隆重致歉，“独立阅读”有两处致命的错误：以前各期第 1 页特约撰稿人马慧元小姐的所在地被误注为“美国·温哥华”，希望这一错误不会被加拿大人民理解为海外反动势力妄图分割他们祖国的神圣领土；2008 年 3 月第 6 页将“傅衣凌”印成“复议凌”，如此明显的错误漏过校对，谈何“复议”？

恳请诸位原谅并且继续批评指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朱 白：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言 一：艺术

独立书评人

凌 越：说书评

凌 越：作家的自恋

凌 越：蝴蝶的艺术

凌 越：埃德蒙·威尔逊：美国文人

凌 越：当代文学批评：狼群或羔羊

书评

刘 柠：爱你因为爱自由

孙骁骥：现代主义：失之魏玛，收之欧美

严 飞：香港最后一个政治贵族

专题·转型与稳定

羽 良：转型的迷思

程 明：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声音

马慧元：钢琴家 Byron Janis

影像

汪 伟：论摄影（五）

2008 年 5 月 第 2 卷第 5 期

编者按：

四月不是残酷的，但是疯狂的。越是疯狂，越是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独立阅读”希望能够成为一张书桌，我们围坐四周，静静阅读。

在这个疯狂的季节，老一辈的先生次第远去，新一代的后生尚在发育。21 年前，海子说：“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他写的是“秋”，可是也适用于 21 年后的“春”。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朱 白：写作

罗四鸽：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言 一：艺术

追念·贾植芳、柏杨、查尔斯·蒂利

罗四鸽：先生远去，“人”字长存

王晓渔：政治犯的监狱比较学

羽 良：查尔斯·蒂利

书评

刘 柠：我跑，故我在

严 飞：陈之藩与胡适的故人旧事

马 庆：世俗时代的信仰

随笔

孙骁骥：伦敦书展：阿拉伯文学唱主角

影像

成 庆：小城里的歌声

张 昕：革命——没有电视转播

汪 伟：谎言重复一千遍还是谎言

讲演

吴 强：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晚期威权主义

译介

乔纳森·亚德利：《我的青年时代》：鲁宾斯坦迷人的前奏曲

2008 年 6 月 第 2 卷第 6 期

编者按：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4秒，是改变中国的一秒，这一秒带来的变化需要用多少年承担，至今无法估量。截至6月10日12时，已有69146人遇难。听说伟大的朗诵者可以把数字朗诵得让人落泪，但是现在，无需伟大的朗诵者，无需悲情的主持人，只要默读这些数字，就足以落泪。

69146人中，有没有“独立阅读”的读者，难以确定。可以确定的是，“独立阅读”的很多读者和作者依然身处余震之中。观察员言一从成都发来他的文字，绝望然而温暖。

春夏之交，我们都是幸存者。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写 作：朱 白

罗四鸽

经济：苏小和

思想：成庆

文史：沈展云

王晓渔

艺术：言一

书评

戴新伟：焚烧舞台的演员

严飞：“后香港”与“新新中国”

孙骁骥：报刊与帝国主义

刘柠：天下没有免费的自来水

成庆：后现代情境下的哲学与政治

王晓渔：一场文化的光荣革命

影像

汪伟：贾樟柯的烂尾楼

译介

伊恩·博斯特里奇：古典音乐的二十世纪悲剧：音乐与政治如何结合起来对德国和苏联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2008 年 7 月 第 2 卷第 7 期

编者按：

夏天是一个容易让人倦怠的季节，也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两位执行编辑私事缠身，独立阅读的篇幅因此缩减不少，很是让人担心这是否对我们的忠实读者有所辜负。不过文章的多寡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都市里的终日忙碌，无论是工作还是读书，总容易让人习惯于一种周而复始的生活方式而不自觉，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也希望各位读者，适当的时候能够远离书本，如此，读书才能在适当的时候显现出最为平和的一面。

“独立阅读”已经创办一周年了，我们没有其他礼物，只是对栏目作了优化组合，将阅读报告分为中国大陆和台港海外两部分。此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向诸位汇报，经过几个月的调试，“独立阅读”网站即将登场。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作：朱白

罗四鸬

经济：苏小和

思想：成庆

文史：王晓渔

艺术：言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香港：严飞

俄罗斯：张昕

英格兰：孙骁骥

书评

凌越：艺术鞭策诗歌

声音

马慧元：从一本《巴赫》说起

成 庆：铁幕后的大提琴诗人

译介

村上春树：跑步的作家：学习如何跨越距离

2008 年 8 月 第 2 卷第 8 期

编者按：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生活。8月，虽然奥运成为重中之重，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出游或者闭关，当然，阅读也是一个选项，与其他选项并无冲突。

这里需要向诸位汇报的好消息是，“独立阅读”(<http://chinairr.com.cn/>)网站已经正式开通，以前各期“独立阅读”，均可以在那里下载。您还可以注册自己的空间，与独立阅读的作者交流或者成为作者。

“独立阅读”见！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罗四鸽

经 济：苏小和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艺 术：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香 港：严 飞 香港独立漫画 25 年

英格兰：孙晓骥 BBC 内部的“主义之争”

追念·索尔仁尼琴

王晓渔：我们依然需要重温索尔仁尼琴

书评

汪 伟：裸奔是最古老的奥运项目

张无极：苏联的文学 G 点

戴新伟：承担一小块土地

羽 良：现代化、民粹主义与官僚威权

温故

戴新伟：藏在旧书店的大师傅

声音

马慧元：舒伯特的四手联弹

译介

阿莱克斯·罗斯：百万交响：中国音乐大跃进（一）

布里特·皮尔森：达尔文来拯救：部分学者相信进化科学能振兴文化研究

2008 年 9 月 第 2 卷第 9 期

编者按：

9月，独立阅读的出版日期依旧延迟，我们只能再次希望各位读者谅解。一份原定月初的出版物逐渐变成月末出版，这自然主要是因为编辑们的失职，但是大家或许也会予以谅解，毕竟我们的生活包括更多的内容，而不仅仅是阅读而已。

不过阅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在不断被侵蚀，上海的季风书园如今面临租约到期，无力续约的困境，如今文化也需要在市场中进行残酷的利益搏杀，可见当下时代精神的某些畸形面向。

需要另外汇报的是，本期独立报告中“思想哲学”与“艺术”空缺，是因为一位观察员出国访学，无法继续，而另一位观察员则是短期调整，下期即可恢复。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作：朱白

罗四鸽

经济：苏小和

文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日本：刘柠

英格兰：孙骁骥

书评

朱白：自由，多么坦白的渴求

朱白：送给自由一个绝望的注解

戴新伟：理解书虫

戴新伟：玫瑰椅上好用功

声音

马慧元：DVD：BACH 管风琴音乐集萃

译介

阿莱克斯·罗斯：百万交响：中国音乐大跃进（二）

2008年10月 第2卷第10期

编者按：

走过一年多的时间，独立阅读也和各位读者一起在不断成长。我们的作者之所以仍然愿意积极地为这份刊物写作，是因为心中还存有一份对精神生活的坚持，而这种坚持，不仅仅是依靠阅读换取什么，而是要让阅读改变我们看世界和看自己的角度。

如果有一天，当你回头看自己的阅读生涯时，还会记得这份微不足道的电子刊物，那将是我们的荣幸，或许这也是阅读的根本意义所在，它让我们的精神联系彼此。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作：朱白

罗四鸽

经济: 苏小和

文史: 王晓渔

艺术: 言一

音乐: 成庆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日本: 刘柠

英格兰: 孙晓骥

书评

凌越: 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王晓渔: 胡风会不会成为周扬?

随笔

严飞: 对香港最大的留恋

声音

马慧元: 哈罗尔的独奏会

译介

亚当·戈谱尼克: 又对了: 约翰·斯图加特·密尔的激情 (一)

2008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11 期

编者按:

又来迟了, 这次的延迟缘于作者们的火烫热情, 不断增补的文章让我们又一次违背了按时出刊的承诺。不过这样一份刊物的推迟, 与外界的风雨欲来相比, 只不过是时代里的一个“微型事件”而已。我们的行为多大程度能够影响这个时代, 甚至退后来说, 能够影响我们自身, 都是无法确认的。

当今日文化不再切乎内心, 物欲开始勾搭灵魂, 这份小小的电子刊物则老是想跳出这个时代, 或在过去, 或在未来, 回望或展观今日之我们, 试图了解这种处境到底意味何物, 摸索出一条可能的道路。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呢? 未必光明。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作: 朱白

经济: 苏小和

文史: 王晓渔

艺术: 言一

音乐: 成庆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日本: 刘柠

英格兰: 孙晓骥

书评

成庆: 巴黎高师的今昔之间

苏小和: 惊惶的海子——1989年, 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戴新伟: 我们过得还行

张无极: 谁是约翰·欧文?

严 飞：在寻找的努力中接近历史真相

汪 伟：“失掉的一代”

声音

曹嘉捷：再见，Horowitz!

译介

亚当·哥谱尼克：有对了：约翰·斯图加特·密尔的激情（二）

2008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12 期

编者按：

阅读的本质是什么？每本著作或者每篇文章都有其特有的知识领域和关切，对于人文世界而言，我们日复一日的积累这些领域的信息，大多其实并无法成为我们的研究范围，那么阅读本身是否就可以只是为了阅读，抑或，还有什么更多的深意？

作为编辑，每期阅读”独立阅读”各位作者的文章是幸福的，这并不只是在于他们总是让编辑发现一些所未见过的新奇，而在于通过这些性情文字，分明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灵魂，关切社会，磨砺心灵。或许，”独立阅读”最大的财富，是在于我们拥有的一个基本共识：阅读是一种心灵的沟通，而非仅是知识的传输皮带。

鉴于”独立阅读”月初出版，月底发行的”习惯”，这里先预祝各位新年快乐！

一晃已近 2009 年，时间总是过的太快，中国却总是变得太慢。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经 济：苏小和

文 史：王晓渔

音 乐：成 庆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刘 柠：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严 飞：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

孙骁骥：“奇趣”文学手册

书评

戴新伟：与书店有关的日子

张无极：邮差敲响时光之门

朱 白：眼下，正是看公仆干好事的时候

羽 良：寻找民主化的条件

随笔

苏小和：北岛的母语

2009 年 1 月第 3 卷第 1 期

编者按：

2009年，刊物姗姗来迟。幸运的是，毕竟还能应着农历新年的景，将改版后的第一期作为送给各位朋友的新春贺礼。

改版自然是想“继往开来”。在这期，我们尝试加入原创诗歌的内容，意在说明，如何描绘今天的历史处境与心灵特质，其实一直都是“独立阅读”努力的方向，但是这样的任务完成的是否令人满意，自然需要留待各位读者的评判与审视了。

最后我们要感谢的是三辉图书的应亚敏小姐，没有她的技术支持，我们的改版将是不可能的任务。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文史：王晓渔

艺术：言一

音乐：成庆

阅读报告·港台海外

香港 严飞：在新野蛮时代寻找文明

英格兰 孙骁骥：回归童年，上海龙华难民营

声音

言一：从唱片到现场：Indie 的钱\前程

成庆：罗大师罢演的背后

译介

福阿德 阿加米 陈丹丹译：亨廷顿的警告

诗歌

连晗生：皮格马利翁的烦恼

2009年2月 第3卷第2期

编者按：

画家萨宾娜接受的是现实主义画风的训练，技巧精熟，画出来的社会主义工厂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由于偶然的疏忽，一滴油彩滴到了已经完成的画面上。萨宾娜惊奇地发现，污染画面的油彩在严整的现实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一幅不和谐的景象。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生活在如此盛世，没有一些出自偶然的油彩，难免有人间天堂的错觉。为了补充偶然之不足，有必要在此提倡为澄清常识而进行的写作。

常识者，本来是寻常见识，也可以解作常人之所知所识。然而，如果不幸生在常识被有意掩盖和歪曲的神奇国度，常识不常，人们难免常有生无常的感觉。写作者值得为回到常识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谈不上启蒙，仅只是为了自我教育，免得不时被世事所震撼，影响健康。至于思考所得是见诸著作还是见诸报端，见诸博客还是课堂，或者更只是发表于二三友好之间的闲谈，倒是无关紧要，均无不可。

写作和阅读往往是为了克服孤独。常识是孤独的。让我们努力。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白 朱航满 罗四鸽

文 史：王晓渔

音 乐：成 庆

艺 术：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梁启超：文化启蒙的舆论骄子

孙骁骥：谁误读了布兰森

书评

戴新伟：小丑的提醒

马慧元：不快乐的作家

王晓渔：“史无前例”不是史无前例

逝者

夏佑至：约翰·厄普代克

诗歌

王 炜：怎样概括外观

凌 越：词语将我们完整地隐藏

译介

Adam Hochschild：古拉格的美国人

罗杰·斯克鲁顿：西方强大的秘密：宽恕与讽刺

2009 年 3 月 第 3 卷第 3 期

编者按：

赖声川的新作《如影随行》刚好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登上北京和上海的剧场舞台。宣传文案称：该剧将给观众带来好莱坞大片般的享受。诚然，时至今日，赖声川对于舞台场面调度，场景切换，以及灯光布景的设计已然炉火纯青；但就剧作本身的内核而言却与好莱坞大片相去甚远。若单从形式上看，反而更接近初期的默片。从而，“好莱坞”一词的凸现，其实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性特质。许多的流光溢彩盛大繁华更本质而言只是一场符号的狂欢，是恰如电影《催眠》中所述的被符号催眠下的纵情。

尽管梦境与现实之间或许并无绝对之界线，个体也有权选择沉浸在任何一边；但最为重要的事情却是在于梦境与现实作为二元甚至多元的存在。就此而言，独立阅读诸位同仁的努力，亦不过是为这个多维的世界提供一些可以照见不同纬度的镜子。

而本期，肥内在影像方面偏学术气质的文字正好展示出一种不同于大陆常见电影写作的书写之纬。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白 朱航满 罗四鸽

文 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龙应台的 36 封家书

孙骁骥：故乡的异乡人

书评

刘 柠：“高陶事件”旧话重提，盖棺之论尚待时日

马慧元：给神话消毒，还怪异真实

朱 白：卡佛的书

影像

肥 内：影像作为视见与被见的中介

译介

托马斯*阿斯豪尔：破产后的生活——哈贝马斯采访记

2009 年 4 月 第 3 卷第 4 期

编者按：

这一期“独立阅读”的迟到，责任全然在我这个轮值编辑。由于编辑工作需要几个完整的工作日，虽然文章早已到齐，编辑断断续续拖延了很长时间才算完成。在此向读者和作者道歉。

虽然这是 2009 年 4 月的“独立阅读”，但是编辑完成已是 2009 年 5 月 4 日，这个日子的纪念意义不消多说。我们默默地纪念，因为有些纪念是无需说出口的。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文 史：王晓渔

电 影：言 一

音 乐：成 庆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日 本：刘 柠

英格兰：孙骁骥

德意志：杨不风

书评

凌 越：勒克莱齐奥：永恒的漫游者

朱航满：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罗四鸽：塞林格与凯鲁亚克的两种“禅”

随笔

贾 葭：西洋海盗与中土山寨

影像

王晓渔：打毛线的屠杀者

孙骁骥：如何挠到公众的笑穴

译介

吉姆*霍特：你背诗么？

2009 年 5 月 第 3 卷第 5 期

编者按：

无论历史或是记忆，都不一定真实。但这样的非真实性却并不意味着虚无。相反，它是一种敞开，为纷繁的个人史与个人记忆留出了伸展腾挪的空间。从而，在纪念日来临之时，“个人”与“集体”两个纬度的交汇，成为了我们回忆与凝视的路径。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航满

思 想：成庆

文 史：王晓渔

音 乐：言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二十一年林夕

孙骁骥：“偏离轨道”的《纽约时报》

刘 柠：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书评

罗四鸽：康诺利的反叛与回归

朱 白：一部废话构筑的肥皂剧

王晓渔：小天使在看着你

羽 良：时空交错下的“张冠李戴”

万象

汪 伟：后门

苏小和：更加重要的概念被我们遗忘

随笔

成 庆：一个钢琴家的抗议

飞鸿

小 谷：来函

王晓渔：回函

2009 年 6 月 第 3 卷第 6 期

编者按：

1984 年，我还在读《伊索寓言》，并不知道奥威尔的《1984》已经出版了 35 年，假如奥威尔是把 35 年当作时代变换的刻度计，他或许没有想到，在 2009 年的某个国度，许多人还在神神叨叨的念着 1984 这个过去的年代数字。

我唯一想知道的是，35 年后，我们会不会继续念叨这些过去的数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可真是一个悲哀的结局。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 白

朱航满

思想：成 庆

文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戴新伟：一位香港编辑的交游考

刘 柠：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

马慧元：鲍斯威尔和他的世界

专题： 1Q84&1984

刘 柠：1Q84：村上春树的“超现实”世界

孙骁骥：“老大哥”仍在看着我们

书评

凌 越：偷窃历史还是拿来主义？

罗四鸽：服从的犯罪

巫 昂：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

王晓渔：5月35日：地球上的螺丝松了

张无极：王者的素典

万象

杨小刚：全德总罢课！

声音

成 庆：哲学与音乐的对话

译介

乔治·A·阿克洛夫：动物本能：人的心理如何驱动经济？

2009 年 7 月 第 3 卷第 7 期

编者按：

“独立阅读”已经坚持了两年时间，在此应该感谢读者、撰稿人和技术人员。办这份电子刊物的初衷是满足少数人交流读书心得的需要，既然公之于众，就不得不拟定若干简明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已经见之于刊名。独立是我们两年来努力追求的主要目标。

“独立阅读”诞生于网络时代，到目前为止，一切相关工作建立在自愿和免费的基础上，符合自娱自乐的初衷和底色。至于自我定位为“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也并非事先要求的结果，而是逐渐形成的性格，其间得失，读者可鉴。

阅读的目的是求知，写作的目的是交流。让我们继续。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 白

朱航满

思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香港，成为我的香港

孙骁骥：吃得民主，吃得自由

书评

成 庆：沃格林：探究灵魂的哲学家

孙传钊：隐现的问题——重读《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

刘伟伟：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论视角

羽 良：山寨国

声音

马慧元：克莱本钢琴比赛 DVD 杂记

独立阅读两周年

朱 白：内心安定，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王晓渔：趣味的雅集

成 庆：阅读的公共性

言 一：微物之光

苏小和：从独立阅读开始

严 飞：读书之叹

刘 柠：书评、书业与”独立阅读”

孙骁骥：去往公民社会的旅行

凌 越：我和“独立阅读”

陈丹丹：分享

罗四鸽：有一搭与没一搭

汪 伟：为交流而写作

2009年8月 第3卷第8期

编者按：

每次编完“独立阅读”，我总是在第一时间飞进书店，把那些感兴趣的书抱回家，一方面出于对作者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想检测一下作者们是否值得信任。如果上当，立即发信严厉谴责，还好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为了以更少的时间了解更多的阅读信息，本期开设了“书单”栏目，试图打入作者们的书房内部，现场直播他们的阅读状况。让人惊奇的是，有时会有两位、三位或者更多的作者，在阅读同样的书。有共识，也有差异。对于重出江湖的《废都》，“独立阅读”的作者们势如水火、针锋相对，但请放心，不会产生肢体冲突。

没有共识，无法交流；没有差异，不必交流。“独立阅读”愿意呈现阅读中的共识和差异。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曹开雄：沉默还是抗争

孙骁骥：勇士的年代

书单

羽 良 刘 柠

成 庆 汪 伟

贾 葭 戴新伟

孙骁骥 言 一

朱 白 王晓渔

书评

朱 白：科塔萨尔的伟大是评论家封的

凌 越：一种凸显勇气的晚期风格

罗四鸽：米勒的典型性中国之旅

孙传钊：生计与人生关键的选择

王晓渔：一场迅速平息的“暴乱”

译介

亚当·科奇：科学因何浪漫？

2009年9月 第3卷第9期

编者按：

关于过节，选择过什么节和怎样过节乃是重点所在。理论上，公民享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但事实上，摩登天空音乐节原定属于海外乐队的演出场次“毫无缘由”地悉数取消---许多乐迷也由此失去了前往过节的动力同欲望。据查，“节”原本意指告一段落，故而可以庆祝成果，可以展望未来。然此时此景，扪心自问：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变好，我们是否对未来有所期待？至少，相当数量的乐迷再不期待 Oasis，再不期待大量海外乐队参演的音乐节。

何以解忧？许是杜康，许是阅读。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影 像：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英格兰 孙骁骥：来自洛克比上空的余音

书单

成 庆 贾 葭

戴新伟 孙骁骥

严 飞 刁 莹

书评

贾 葭：河山何日得珠还

朱 白：小津的淡然和淡然的《小津》

凌 越：兰波，一艘漂浮在冥界的醉舟

罗四鸽：一点常识

戴新伟：读陈志勇两则

孙传钊：法兰克福学派的诺依曼

访谈

阮义忠：眼由心生

讣告

欧文·克里斯托尔

2009年10月 第3卷第10期

编者按：

做编辑的大抵都有两种毛病，一种是“家花没有野花香”，自家的文章总是觉得不够好，另一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自家孩子越看越喜欢。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人，但是至少在编本期时，我承认自己不由自主的成为第二种“有毛病”的编辑，真想对各位能读到本期的读者说一声：

独立阅读的读者们，你们有福了！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夏佑至

影 像：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一段未完成的革命史

严 飞：三年零八个月，往事并不如烟

书单

成 庆 贾 葭

羽 良 言 一

严 飞 刁 莹

书评

吴 强：欧洲的气候政治版图

孙传钊：洋人的“新左派”

夏佑至：“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专题 诺贝尔文学奖

康 慨：赫塔*米勒：熟悉的陌生人

康 慨：赫塔*米勒：生平与作品

戴新伟：猜中就是“众望所归”？

游记

罗四鸽：走进格萨尔

现场

马慧元：温哥华早期音乐节杂记

成 庆：令人费解的布鲁克纳

访谈

自由对我太重要——张树新访谈录

社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先世俗化---弗朗西斯*福山访谈录

记忆

女 崽：谁能告诉他们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

讣告

唐德刚

译介

Jacqueline Pfeffer Merrill：永恒徘徊的胚胎

2009 年 11 月 第 3 卷第 11 期

编者按：

10 月 21 日和 22 日，季风书园徐家汇店和陕西南路店各有一次讲座，讲者分别是独立阅读的撰稿人苏小和与刘柠。他们与听众分享了对中国经济史和东洋出版业的观察与思考。和电子杂志一样，讲座活动以交流为目的，倡导独立思考，旨在养成公民社会必不可缺的一点常识。讲座内容整理好之后会陆续刊出，与大家分享。

本期独立阅读连锅端出三篇同题书评，作者对《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各有己见，论说的角度和结论都不相同，请读者诸君关注。

我们心目中的公民社会应该有的常识之一，是宽待争论，容忍分歧。多尝试理解别人的立场和角度，不仅可以开阔眼界，也让我们有机会自我审视。和向来的偏见相反，争论不会分裂社会，反而有助于凝聚共识。

对待一本书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一切公共话题，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态度。

目录

来信与勘误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书评·焦点

沈宇哲：一本对台湾缺乏热情的书

贾 葭：你们知道浊水溪的长度吗？

王晓渔：你的美丽，我的忧愁

书评

成 庆：如何认真面对“政治”

朱 白：可以向神要一个苦难的原因吗？

刘 柠：中日东亚共同体的前世今生

马慧元：用一生来读历史

孙晓骥：约翰·伯格：有故事的人

羽 良：革命、精英与社会思想

行迹

罗四鸽：夹边沟

译介

洋人新左派（二）

伊斯兰的达尔文问题

演讲

苏小和：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2009 年 12 月 第 3 卷第 12 期

编者按：

整整 20 年前，1990 年 1 月，哈维尔发表了他出任捷克总统之后的第一次新年献辞，他这样说：“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

让这位曾经三次入狱的“七七宪章”发言人的梦想，陪我们一起度过漫漫寒冬。

目录

头条

蓝 蓝：阿克苏诗笺（组诗）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童 书：燕 舞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日 本：孙传钊：洋人新左派之舍韦纳芒

焦点·阿凡达

张无极：我们的天神何时下凡？

成 庆：阿凡达：大梦不愿觉

书单

羽 良 贾 葭 王晓渔

书评

夏佑至：民国律师业的“终极试验”

罗四鸽：不由得捏三把汗

王晓渔：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朱芳艺：在路上

凌 越：爱的实质高于信仰的规条

随笔

杨小刚：德国学生运动观察

范绅士：从蛇皮袋到黄鱼车：大陆地下书摊的春天和秋天

视觉

燕 舞：云南稻农的影像武器

译介

查尔斯·库兹曼：在德黑兰读韦伯

演讲

刘 柠：东洋出版的秘密

2010 年 1 月 第 4 卷第 1 期

编者按：

1893 年，郑观应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盛世危言》，时为甲午战争前，自强运动业已进行 30 余年，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刚刚于 1891 年访问长崎，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激烈反应，当时的晚清王朝不可谓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盛世”，郑观应此时发出“商战”之语，意在以“商”立国，富强救国论从此甚嚣尘上，影响至今。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意在“富强”，不过他的商战论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可见在他眼里，“政治改革”是工商发达的前提。

反观今日之“盛世”，经济一枝独秀，政治稳定压倒一切，一片和谐盛世景象，引发了世界对“中国模式”特殊论的激辩。

这般的“盛世”，将会何去何从？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影 世：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捕捉布莱尔的“影子”

聚焦·盛世

夏佑至：恐惧出盛世

贾 葭：心甘情愿地委身巨灵

羽 良：盛世，不自洽的和谐

圆：理想主义的 Ecstasy：盛世的宏大叙事与创伤后遗症

刘 柠：播撒龙种，收获跳蚤

成 庆：盛世下的意义危机

王晓渔：二十一世纪的“推背图”

灵 子：陈冠中专访——“盛世”不是预言，我写的是今天

随笔

夏佑至：年轻人为什么忧伤？

张秦峰：为城市及自由正名

音乐

马慧元：朱小玫是谁

译介

H·艾伦·奥尔：科学能否解释宗教？

约翰·拉赫兹：哲学还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吗？

2010 年 2-3 月 第 4 卷第 2-3 期

编者按：

青年时期的托马斯·曼爱好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瓦格纳的音乐，总喜欢以“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那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德国，认为现代社会弃绝了意义，掏空了存在，实在不是什么光明的发展方向。于是在一战爆发后，他写下名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观察》，认为德国人的精神本质在于文化，精神生活乃是最后旨归，而英美文明不过是机械理性的典型代表。不过就在纳粹上台前夕，他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个他念兹在兹的“德国精神”，被纳粹转换成“怪癖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能见到的粗鲁”，之后的他，开始流亡。

今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喜欢讲“中国站起来”，爱谈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超克”。不过，我们首先或许要作的，是去清理自己的精神，否则，这样的“站起来”难保不会重蹈德国那“粗鲁化的覆辙”。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这是谁的城市？——我城这三十五年

孙晓骥：英国新闻业的危机

书评

孙传钊：疑惑中的随手翻翻

张秦峰：鸡皮疙瘩、崇高与政治不适症

裴自余：盛世之下的我们，温吞吞

随笔

王晓渔：“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影像

灵 子：海豚湾：“偏颇”及其意义

行者

扬 克：回忆中的梅斯基尔希游记

言 一：天堂与荒漠

逝者

王晓渔：“你熟睡如橘”——悼张枣

译介

Sally Satel：生物伦理学的局限——专业尽于此，政治始于此

André Glucksmann：天鹅绒哲学革命

2010年4月 第4卷第4期

编者按：

欢迎来到4月。西风东渐，往往名至而实不归，唯独本月第一天的“愚人节”除外。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是假亦真，如果光是看电视，会觉得天天在过愚人节。

读书可以使人明智，也可能和看电视一样，使人加倍愚蠢，所以贵在存疑。胡适先生说过，“做学问，贵在不疑处有疑”。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年纪尚小，把“不疑”当成了“不宜”，以为胡先生鼓励读点禁书，心里十分佩服。还好，虽有误听但去之不远。因为禁书的目的正是不让人产生疑心，从而死心塌地地听话，心甘情愿地服从。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对国会所做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一个自由的世界中，人类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随着互联网促进了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人们对自由的认识也在扩展，所以105岁的周有光先生又提出了“第五自由”，也即“互联的自由”。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自由，但很容易感知什么是不自由。“互联的自由”也有自己的反面，那就是“墙”。“墙”代表了互联网时代的禁书传统。

在不疑处有疑，才能进入学问的门径；在“不宜”处有疑，才能长大成人。怀疑禁忌是年轻人的本能，所以，墙上越是贴有“少儿不宜”的标签，他们翻起来就越是起劲。这多多少少缓解了一点愚人节里的焦虑。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史：王晓渔

书评

王晓渔：宪政是“训”出来的吗？

成庆：儒家宪政还是社会民主？

凌越：第三双眼看印度

燕舞：周志文的童年往事

访谈

灵子：周有光：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

随笔

刘柠：日本报业观察两则

2010年5月 第4卷第5期

编者按：

40 年前的 3 月 15 日，邻国日本在大阪举办了亚洲首个世博会，距离之前的东京奥运会不过 6 年；更为有趣的是，大阪世博会的主题亦被定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仅过了 5 年，世博会便再次在冲绳举办，彼时日本经济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日本第三次举办世博，却已距大阪世博足足 35 年。

正如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在其为《博览会的政治学》所作的新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的这一组合，看上去与四十多年前东京奥运与大阪世博，以及二十多年前首尔奥运与大田世博的组合十分相似——奥运与世博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国家经济增长的象征。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极为一致的象征，以及这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都是颇值得以比较研究的视角来加以探寻的对象。而当我们视野退回到世博会诞生之初的英国和在初期大放异彩的法国，则更是为审视眼下的上海世博增添了宽广的历史纬度与拓出了足够的凝视空间。

于是，无论是吉见俊哉写于日本泡沫经济尾声的《博览会的政治学》亦或大卫·哈维成书于 2001 的《资本的空间》，都显得如此的生逢其时。(注：两书中文版均在 5 月中由台湾群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 白 朱航满

思想：成 庆

文史：王晓渔 贾 葭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从纳粹少年到英格兰足总杯传奇

书评

扬 克：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

王晓渔：一次惊艳的宪政实践

孙传钊：不屈的女杰

现场

成 庆：突然降临的“马勒”！

随笔

夏佑至：救援队与志愿者

刘 柠：“萝莉控”的非常美与非常罪

戴新伟：如此动人的细节

访谈

灵 子：朱天心专访——纯文学的恐龙在这里

灵 子：唐诺专访——只有文学无法躲闪

2010 年 6 月 第 4 卷第 6 期

编者按：

6 月 11 日，南非世界杯开锣。相比于上海世博的“盛会”，足球竞技场或许更为纯粹和真实，恰如当我们面对当今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般纷乱的现状时，更愿意去书籍中寻找那个更纯粹的，属于每个人内心的中国。

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随着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因不堪重负而纵身一跃，洛克菲勒的名言越发成为中国的现实：美国红蔷薇之所以有艳丽的色泽和宜人的芬芳，只是因为牺牲了早期生长在它周围的许多花蕾。

“万众一心”的中国红蔷薇背后，有太多东西被人们廉价地忽略，比如工人的尊严和生命，比如卢安克的自由选择权。这位为了追求“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而志愿来到广西农村支教的德国人，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卑微与渺小。

卢安克翻译施泰纳所著的《儿童的教育与改革》一书中，有这样的话：“为了能弄清一个人的将来，我们需要研究他的掩藏的本质。可是我们现时代的人不愿意这样做，现代的人只管表面出现的问题，却没有耐心，也没有信心和把握去研究隐藏的问题。”

但愿，阅读能帮助你我找回面对这个国家的“耐心”和“信心”。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 白

朱航满

罗四鸽

思想：成 庆

文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也斯的香港

孙骁骥：谁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埋单？

书评

成 庆：夭折的上帝与有待“救赎”的人心

贾 葭：洞悉真相的围观群众

现场

成 庆：合金般的德国之声——谈法兰克福广播乐团上海音乐会

观察

夏佑至：富士康与中国模式

艺术

刘 柠：英国的波普艺术

王晓渔：没有民间，只有“被民间”

访谈

灵 子：刘亮程：我们改变不了人心现状，能改变的只是生活

（整理：孙韶洁）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网易 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